

#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 首届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期刊评奖获奖刊物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1996 · 3

(总第 136 期)

· 月刊 ·

# 目

## 学术研究

(郭沫若题)

社长 主编

梁渭雄 张硕城

常务副主编

刘斯翰

副主编

郑英隆 林有能

编辑部主任

林有能 (兼)

资深编辑

陶原珂 (主任)

冯达才 (主任)

谭湛明

编务主任

黄荣显

### ·学苑聚焦·

为构建新时期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献策

——广东新时期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 本刊记者 冯达才 (5)

### ·关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讨论·

以立为本，虚功实做，扎扎实实推进新时期道德建设

…………… 于幼军 (8)

### ·经济·

“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 刘伟 (15)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几个重要问题 … 郭克莎 (20)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 …………… 李 种 (25)

变革时期广东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 温思美 罗必良 李大胜 (28)

### ·哲学·

慧能的佛性思想及其演变 …………… 冯 翼 (33)

描述伦理学及其理论价值 …………… 江雪莲 (38)

### ·历史·

试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守成派 …………… 方光华 (41)

“路博将军”及其同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

…………… 邱 捷 (46)

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 张富强 (50)

1996年第3期

# 录

中华古典地方行政机构体制的设置及演进规律  
..... 奇 秀 (53)

## ·文学·语言·

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 ..... 党圣元 (57)  
玄学·玄谈·玄言诗 ..... 李文初 (62)  
试论汉语方言岛 ..... 庄初升 (66)

## ·澳门研究·

Tamão 与西草湾 ..... 赵立人 (70)  
澳珠经济关系及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  
——第九届澳门社会科学年会暨第八届粤澳关系研讨会综述  
..... (澳门) 黄汉强 (73)

## ·学术动态·

美国刊物上的中国改革开放 ..... 梅仁毅 (76)  
注重基础与现代化转向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述评 ..... 陶原珂 (83)

## ·广东学术新著·

全新的探索  
——《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评介  
..... 豫 夫 (85)  
探索现象学的非理性之路  
——评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 ..... 魏敦友 (87)

## ACADEMIC RESEARCH

### 主办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 编辑

《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黄华路四号之二

电话: 3815300—246

3846307、3846177

邮政编码: 510050

### 出版

《学术研究》杂志社

### 排印

佳达电子公司

### 发行

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46-64

###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 399 信箱

### 刊号

ISSN1000-7326

CN44-1070

### 广告经营许可证

粤工商广字 010349 号

总第 136 期

---

<i>A Summary of the Points from "The Theoretical Symposium of Guangdong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in the New Period"</i> .....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Feng Dacai (5)
<i>Promoting Solidly the Construction of Ethics in the New Period: Doing a Substantial Work Mainly for Establishment</i> .....	Yu Youjun (8)
<i>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8th Five - year Plan Period</i> .....	Liu Wei (15)
<i>Several Important Problems in Promoting the Change of Economic Increase Method</i> .....	Guo Kesha (20)
<i>On Adjust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i> .....	Li Chong (25)
<i>An Analasy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crease of Guangdong Agricultural Econoimy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i> .....	Wen Simei, Luo Biling and Li Dasheng (28)
<i>Hui Neng's (638 - 713) Thought of Buddhisity and Its Evolution</i> .....	Feng Xun (33)
<i>Descriptive Ethics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i> .....	Jiang Xuelian (38)
<i>On the Branch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sisted in a Formed Pattern in Modern China</i> .....	Fang Guanghua (41)
<i>"General Lubo" and His Interview with Mr. Sun Zhongshan and Chen Jiongming</i> .....	Qiu Jie (46)
<i>Modernization of Guangzhou Commercial Culture and Its Features</i> .....	Zhang Fuqiang (50)
<i>The Establishment of Ancient Chinese System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and Its Development Pattern</i> .....	Qi Xiu (53)
<i>On the Basic Determination of the Conception of Literary Value</i> .....	Dang Shengyuan (57)
<i>Profund Theory, Profound Talking, and Profound Poetry</i> .....	Li Wenchu (62)
<i>A Trial Description of Chinese Dialect Islands</i> .....	Zhuang Chusheng (66)
<i>Jamao and Xicao Bay in Macao</i> .....	Zhao Liren (70)
<i>The Relation of Macao with the Pearl - River Delta Area and the Research Mission of Social Sciences in Macao</i> .....	Huang Hangiang (73)
<i>Chinese Reform and Open Reflected in American Publications</i> .....	Mei Renyi (76)
<i>Laying Stress on Basic Research and Directing to Modernization</i> —— a summary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Cantonese" .....	(a correspondent of the Journal) Tao Yuanke (83)
<i>A Book Review of "A Theoretic Consideration of 'the Economic Marvel' Happene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i> .....	Yu Fu (85)
<i>A Recommend of Tu Chenglin's New Works "Mission of Phenomenology"</i> .....	Wei Dunyou (87)

道德建设事关国家命运，广东理论界加大研究力度

## 为构建新时期道德理论和规范体系献策

——广东新时期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综述

□本刊记者 冯达才

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广东省社科院联合举办的“广东新时期道德建设理论研讨会”3月5日—7日在广州召开。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与会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作了《以立为本，虚功实做，扎扎实实推进新时期道德建设》的主题发言（全文另发）；省委副书记黄华华会议期间专门召集学者座谈征询意见；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160余人。

**加强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社科理论工作者要着力研究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在会上指出：我们要更深刻更切实地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如何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又限制其中的消极因素；如何扩大开放又抵御国际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大胆吸收新文明成果包括新科技革命成果又防止坏东西渗透；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又保持经济、政治、文化的和谐稳定发展；如何面对国力不足的现实状况又千方百计增加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等等。探索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将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律认识达到新高度，而且将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

德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关口、新的考验。今年初，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认真讨论了宣传思想工作并作出郑重决定，把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作为今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主题。因此，一个加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的前所未有的好时机正在到来。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要着重强调思想道德建设的特殊重要性。特别在目前，显得尤其尖锐和迫切。因此，抓住有利时机，努力加强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力争在跨世纪的15年内，使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牢固地树立起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和道德规范体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发言说，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伟大的第二次革命。一场革命要称得是伟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理论指导。新时期我们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同时需要建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思想和新的道德伦理。要把人类历史上的、古今中外的、引导人们向上向善的、有积极意义的思想成果，纳入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范畴，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理论为核心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思想道德新体系。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必然伴随着社会道德的激荡和变迁,引发出许多的新问题和新特点。

广州市委党校的冯永宁认为,社会转型给予社会道德建设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以下一些特点:(1)人们价值观念取向的多元性引起道德取向的多元性;(2)人们既得利益的层次性引起道德标准的层次性;(3)社会心态的不稳定性带来社会道德建设的不稳定性;(4)中西文化的冲突带来东西方道德观念的冲突。这些矛盾表现为:义与利的矛盾;公与私的矛盾;德治与法治的矛盾;素质与文化的矛盾。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的冯颖红分析了新旧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道德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特征:(1)人们的道德观念导向由单一向多元转变;(2)道德标准由“虚”向“实”转变;(3)道德行为由可控转变为“失范”。

### 努力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

与会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

#### 一、关于新时期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问题

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不少学者认为,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旋律,它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当然,新形势下的集体主义原则应当纳入新内容,建立新机制,采用新方法。要赋予集体主义以新的公正观,赋予集体主义利益原则以明晰化、具体化、规范化的内容,尤其要在保证国家、集体利益至上的前提下,兼顾并充分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有些人则认为市场的主体是人,市场经济呼唤并强化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应该着眼于个人,把个体道德主体性作为构建新道德的基本原则。个体道德主体性强

调个体的自觉道德意识和主体意识,追求个体生存、行为的道德目的和道德意义。它倡导的绝不是利己主义的中心论,而是要求个体既有明确自身的道德权利和道德目的,又要具有健康的道德义务观念和道义感。健全的权利观念和义务观念使个体在市场经济中达到“道德人”与“经济人”的统一。

还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以注重实利、功利为特征。每一市场主体只着眼于个人实利,为满足个人需求,实现个人功利而劳作。同时,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使累积的个人功利转化为社会功利,因此,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德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同时,要适当辅之以公正原则,以强有力地保障市场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因此,公正与功利原则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原则。

#### 二、关于新时期道德评价标准问题

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衡量道德进步的尺度只能是道德自身发展演变的理想状态,因为道德(准则、规范、行为等)都建立在完全的人类精神自律的基础上,它能有效地调节一切不属于法律约束的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使社会生活协调有序,在具体、合理、明晰的善恶标准下,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境界可以由“不损人”向“利他”提升,直至进入“利他”的境界,因此,评价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进步与否就要看它是否向上述道德理想靠近。

广州市社科院的李明华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它实际上是把人们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地归结为道德关系,仅仅在道德体系内部寻求解决道德问题的方法,因而仅把道德尺度作为唯一的评价尺度,其结果总是陷入不可解脱的困惑和矛盾之中。因而他认为,社会进步的评价应该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有机统一。这里所谓的历史尺度,是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形态的演进和社会总体的发展为依据,作为评价各种社会现象的准绳。邓小平在

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跳出了单纯道德评价的框框，体现了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

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研究中心的范英、梁世红、李振连、刘小敏等认为，道德标准与道德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相一致的，新时期的道德新标准应该是：一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进步发展的尺度；二是有利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尺度；三是有利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尺度；四是有利于主体道德完善发展的尺度；五是有利于人的真善美综合发展的尺度。

### 三、关于建立新的道德规范问题

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顾作义、暨南大学的林琼认为建立新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1）建立新的社会公德规范，应以提倡“五爱”为核心，以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公共生活规则、公约为纽带，以遵纪守法、礼貌待人、团结友爱、移风易俗为基本内容；（2）建立新的职业道德规范，旨在培育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的敬业精神；（3）建立新的家庭伦理规范，以利于倡导“互敬互爱、克勤克俭、求知求乐、爱国爱家”的家风。

广东省委党校的吴灿新论述了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道德机制问题。他认为从道德主体来划分，可以分为个体道德的活动机制和社会道德建设机制。前者包括道德动机发生机制、道德行为选择机制、道德后果评价机制和道德素质培养机制。而后者主要由管理机制、教育机制、监督机制和奖罚机制四个方面组成。

### 四、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问题

广州市委党校的王健民、谢玲、苏瞻红认为，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就道德建设的层次、内容和发展规律等问题作了论述，标志着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新体系的框架轮廓已初步成型，其中

主要包含四大要素：（1）社会主义的道德意识（包括道德思想、道德观念、道德感情、道德意志、道德原则、道德信念和理想以及道德理论体系）；（2）道德活动（包括道德评价、道德修养、道德行为、道德教育体系）；（3）道德关系（包括自我、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集体、主体人与客观自然、社会集体之间的道德关系）；（4）道德建设（包括道德规范、道德制度、道德风气、道德环境和道德素质的建设）。

中山大学的李宗桂等认为，新时期的道德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个结构层次：基础层次是日常（社会）生活道德，着眼于人伦实际，不尚空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为进一步提升道德境界打好坚实的基础；主导层次是政治道德，旨在使国家利益、民族大义昭然在心，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成为自觉信念；目标层次是职业道德，使每个人都有鲜明的角色意识，安于本职工作，敬业乐群，社会秩序和谐，运转协调。此外再辅之以经济道德、文化道德、家庭道德等方面的内容，构成新时期道德体系的基本轮廓。

广东省社科院的黄明同、周薇从新加坡成功的经验说起，认为新加坡的新道德，是以儒家传统道德为其价值母体，在赋予传统道德时代内容的同时，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道德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对我们很有借鉴和启发作用。由此出发，她们认为应该提出“建设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在这个建设过程中，务必要以传统道德为价值母体，时下所提倡的道德观念，诸如社会责任感、公德心、职业道德、主体精神、公平原则等，都可以汇入传统道德之“源”，而形成生生不息之“流”。对那些富有时代特色的外来的优秀道德，也可以通过与传统道德的杂交、互补，以建构出更具有生命力的新道德体系。

# 以立为本,虚功实做, 扎扎实实推进新时期道德建设

□于幼军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问题,研究如何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以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努力搞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

## 一、努力加强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个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文明进步。在社会大变革时期,加强道德建设,确立与社会进步要求相适应的新型伦理道德和规范体系,尤为重要和紧迫。当前,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社会转型时期。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的思想高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努力加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加强新时期道德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道德进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革命思潮、理论和运动,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了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作为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不仅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比前者更高的社会生产力,而且在于它能够第一次提供一种无愧于人的本性和尊严的社会生活方式。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做到把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在实践上一致起来。这就是说,经济发展不再以牺牲人的价值和尊严为代价,道德进步也不以损害经济发展为条件,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这两个方面同时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的源泉。

经过大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精辟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途径,又是实现道德进步的前提和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则集中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正义等人类十分珍视的伦理道德价值。因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影响到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并影



响到经济建设和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协调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其次,加强新时期道德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曾经是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人民群众思想的一个理论误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发展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并日益深入人心,我们终于走出了这一误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在今后15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是人的活动。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着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的规则。伦理道德体系的性质和社会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共同规定着市场经济的性质。在西方社会中,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原则使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联系,为资本主义服务。这也就告诉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除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基础之上,还必须使社会道德规范建立在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原则的基础之上。

必须充分肯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有利于人们冲破封闭保守、等级特权、禁欲厌世等腐朽落后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自强不息、奋发向上、自由民主、平等竞争、时间效益等新观念。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道德,另一方面又为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新型道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市场

经济在自发状态下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有负面影响的一面,与一定条件结合(如法制不健全、社会道德规范约束力弱化,等等),也会诱发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消极的思想道德观念。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价值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而且要通过一般等价物—货币来表现。这就容易使人们对货币产生神秘感,认为有了货币就能在市场上买到一切,拥有一切。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价值,似乎也通过拥有货币量表现出来。这就使一些人对货币顶礼膜拜,产生了商品—货币拜物教,不择手段追逐金钱。这种异化现象,很容易导致贪婪攫取、见利忘义等反道德的观念和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强道德建设,确立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限制市场经济自发状态的负面影响。

再次,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道德建设尤为重要和紧迫。

改革开放17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社会道德日益进步。比如,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自主、自尊、自强、创新等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逐步形成并深入人心,平均主义、安贫守旧等传统观念不断受到冲击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等等。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化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转型期里,我们在建国初期建立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伦理道德体系,有不少方面已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如果仍简单地把50、60年代形成的道德规范搬到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必然难以奏效。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规范体系又尚未建立起来。于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就出现了“空档”,出现了两种乃至多种道德理论和规范并存,道德评价紊乱,道德监督、调控失灵,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等方面出现大面积“滑坡”的

现象。人们或各行其是,或无所适从,一部分人则随心所欲,肆无忌惮地践踏道德,坑蒙拐骗、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等。

诚然,在社会转型的一段时间里,出现“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现象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无论是旧伦理道德观念的消亡,还是新伦理道德观念的形成并确立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都会相对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决不构成忽视道德建设的理由。相反,它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加强道德建设至关重要和紧迫。从现实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失范”和“道德滑坡”,已经严重地危害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它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活动,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因此,加强道德建设,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 二、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努力方向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我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确立其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有效地调节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生活安定有序创造必要条件,是新时期加强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既由经济基础决定,又有自身演变发展的特殊规律。道德进步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结果,必须通过人们在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觉活动才能实现。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时间的努力。我们是否可以遵循以下原则去进行探索:

——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适应。

道德是由一定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就有什么样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历史上任何类型的道德,都只有在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联系中,才能表明其现实性和合理性。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必须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相适应,必须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适应。一方面,只有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出发,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出发,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体系;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构建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坚持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精神;要提倡革命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信念;倡导为社会主义、为祖国、为人民多作奉献的道德理想。这是因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以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相结合,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基本含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是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相一致的;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以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幸福的美好社会为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一致。

——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水平相一致。

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无疑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奠定基础。因此要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和与之相应的道德准则、规范,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等等,据以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教育、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同时又要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经

济、市场经济不发达,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现实状况出发,提出、制定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特点和水平的、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道德规范,据以规范一般群众的言行。比如,我们既要提倡、弘扬积极奉献乃至大公无私的精神,但又要承认人们通过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来追求自己利益的合理性,以不损人或合理利己为基准去评价人们的行为,要求人们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和人们的觉悟水平,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使道德理论流于空谈和道德规范脱离实际。对社会全体成员提出的道德规范要求,不是调子越高越好,而是越切合实际越能收到好的效果。总之,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从实际出发,体现出层次性,反映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

——要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相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上的市场经济。求利、自由、平等、公正、竞争、等价交换、优胜劣汰,等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运作义理。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应当在坚持集体主义和“五爱”精神的基础上,用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引导人们的经济活动和行为,确认市场经济活动中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勤劳致富、公平竞争等原则的合理性,并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基本道德要求。与此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发展的特点,制定既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又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引导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健康发展,限制市场经济对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的负面影响。只有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建立能够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才能有效地引导、匡正市场经济活动,维系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有价值的精神文化成果,弘扬民族传统美德,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服务。

我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当然,我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道德在总体上已经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决不能把封建社会所形成的思想、道德、文化,诸如儒家等流派的思想学说和道德要求搬用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现代化、现代文明与小生产、封建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封建专制、封建思想更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必须高扬反封建的旗帜和精神,反对封建主义仍然是突出的、艰巨的任务。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头脑不清醒,忽视了反封建的任务,甚至把封建主义的东西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就会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走入歧途。然而,在传统思想文化和道德中,也不乏我们今天仍应批判继承的有价值的精神文化成果以及需要弘扬的民族传统美德,如讲文明、讲礼貌、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勤劳节俭、团结互助、热爱祖国、共抗外敌,等等。对民族传统道德中的这些美德,我们今天仍然应该继承,并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并应该根据新时代的要求,给民族传统美德赋予新的内涵,有些还要用现代文明要求和社会主义原则加以改造、充实和发展,使民族传统美德走向和融入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新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批判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使社会主义新道德与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相一致。

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为进步、合理和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在继承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必须也能够继承人类社会在道德进步中的一切优秀成果。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要注意吸收各国各民族社会道德中的文明成果。西方文化伦理中的人本主义、公正观念、主体意识、讲文明礼貌、恪守社会公德等等,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与文明、自由与民主的精神,要大胆地借鉴、吸取。

我们只有善于批判地吸取一切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成果,才能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相一致,并走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前列。

根据道德建设的规律,总结以往我国在道德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在遵循上述五个原则的基础上,从加强道德理论研究,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奠定基础 and 加强道德规范建设,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两个方面努力。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直接规范约束人们行为,从而确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是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构成道德规范基础和内核的道德理论(理想、原则、标准等)是否具有科学性、先进性,是否能够说服和掌握社会成员,是道德规范现实地发挥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加强道德理论研究,使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赖以建立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是极为重要的。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要求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既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既要批判继承传统民族美德和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又要对传统的和外来的思想道德进行鉴别、改造、创新,还要与落后、腐朽的封建观念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的任务相当艰巨。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努力加强道德理论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阐明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原则的内涵和理论根据,科学地分析、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道德关系,提出既符合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又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道德理想,确立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道德标准,等等,为建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是人们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的反映,是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判断人们行为是非善恶的一种准绳,对实现道

德职能具有决定意义。道德规范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新的道德规范,总是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而产生、形成并确立起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孕育、产生、发展了,反映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的道德规范,也就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显现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道德要求和评价标准。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道德行为的基本要求的概括,是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道德关系与道德行为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早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已萌芽产生,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推翻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而进行的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形成了热爱祖国、振兴中华、忠于人民、团结群众、为人民服务、信仰共产主义等道德理想和规范。建国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又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初步形成了以共产主义为道德理想、以集体主义为基本道德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基本道德要求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建设也出现了一些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实践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主要是道德规范过于单一,而且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这种不相适应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当今我国社会的现实出发,研究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新问题,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

历史上任何类型的道德规范,都具有现实性,也包括一些高于现实生活的理想成分或因素。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必须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首先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离开社会发展阶段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和接受能力,片面要求人们一律按照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标准去行动,使道德规范的制定和实践流于形式;也要反对片面强调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局限性,而不去提倡共产主义的道德规范,把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对立起来。

### 三、以立为本,虚功实做,从基础抓起,扎实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确立社会主义道德新秩序,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就当前的工作而言,我们要坚持以立为本,虚功实做,从基础抓起的方针和思路,抓紧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从总体上推进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遏制并扭转某些领域存在的“道德滑坡”现象,努力改善社会风气。

一是抓紧道德理论、规范的建设工作,构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

要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逐步确立它在社会道德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共同的道德评价标准,才能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力量,并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和环境,大多数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才会循“道”而行。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要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生活实际,认真研究问题,总结广大群众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中,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的丰富经验和成果,将它们上升到理论层次,拿出一批有分量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较强的关于社会主义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标准的研究成果,用以指导实践;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努力探索和构建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较好体现党在现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的道德规范体系。

二是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道德水准。

道德实践是人们自觉自愿的行为,它是人们对社会道德准则、规范的认识和认同为前提和基础的。社会成员只有掌握了社会所要求的道德准则、规范,并形成了道德

自律意识,具有了道德使命感,才会自觉遵循道德准则、规范,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因此,加强道德教育,提高社会全体成员的道德水准,是新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环节。道德水准包括道德知识掌握程度和道德素质高低两方面内容。我们要从抓好道德教育入手,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准。一方面在社会上大力宣传、普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知识,像扫除文盲、法盲那样扫除“道德盲”;一方面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开始按不同年龄段的接受能力,施以不同的教育内容,从最基本的规范要求内容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培育“四有”新人。道德教育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全社会都要来抓,各级党政机关、宣传、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单位,都要增强抓好道德教育的责任感。要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对象,创作和推介一批好的道德普及读物,如《新三字经》、《社会公德四字歌》等。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道德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伦理道德和个人品德的修养水准。虚功实做,扎扎实实地推进全民道德教育。

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培育良好的道德氛围。

道德是通过善恶评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的。在道德建设方面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倡导新的道德风尚,同时揭露、批评、抨击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言论和行为,通过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在社会上培育良好的道德氛围,促进广大社会成员自觉遵循道德准则,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及时发现和大力表彰体现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先进典型。同时,要有针对性地抓住一些反面的典型,组织舆论批评,让丑恶的行径曝光,使之为人们所不齿。我们的报刊、电视、广播、出版等传播媒介,要责无旁贷地负起这一责任,满腔热情地积极主动做好这一工作,为培育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作出自己的贡献。

四是健全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道德环

境。

社会道德状况,是由社会的大众行为构成的。如果在社会生活中,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而逍遥自在,那么不仅违规者会越来越放肆,还会引起其他一些道德自律意识不强的人起而仿效,以致恶性循环,污染社会风气。因此,健全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是确立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必要条件。

健全监督机制,首先要在社会上建立和健全监督系统。监督系统的作用是注视大众行为选择动向,监察人们特别是公共权利执掌者的行为方式,及时反映和揭露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违规行为。完善的监督包括大众监督、组织监督、舆论监督三个方面。从我国当前的情况看,大众监督比较薄弱,普遍存在“说也白说”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心理;组织监督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尚缺乏强有力制衡性,尤其是对单位、部门、区域的集体违规往往表现得软弱无力;舆论监督初显成效,但声势与力度都还不够。

从广东的实际出发,当前我们要以健全大众监督系统为主攻方向。一是大力宣传大众监督对于改善社会道德风貌的重要性,让广大群众明白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要靠大众的力量,调动大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二是充分发挥各类群众组织、团体如工会、共青团、妇联、街道居委会、村民小组等的作用。几十年来,它们在党的领导下,在组织、教育、发动群众,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我们发动群众,形成群众自我管理机制的强有力的队伍。近年来,我省不少地区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妇女禁赌会、红白喜事理事会等组织,也在移风易俗、弘扬正气、抵制不良习气,形成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它们具有扎根群众之中,相对稳定,熟悉情况等优势,所以能够较好发挥大众监督的作用。在健全大众监督系统的同

时,要加强组织监督系统和舆论监督系统的建设,健全组织监督系统,加强监督制约机制,消除组织监督盲点;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以正确的舆论倡导社会新风,揭露和抨击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在此基础上,加强三类监督的横向联系,实现相互协调,功能互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有效的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道德环境。

五是加大赏罚力度,确立道德调控权威。

虽然道德主要是以道德评价方式而不是以强制方式发挥作用,但是,倘若社会对违反道德准则的恶行听之任之或仅仅停留在一般劝阻的层次上,那么由于损人利己往往是最便捷、成本最低的获利方式,自利行为很容易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滑向不道德的一边。当今我国社会生活中许多不道德的行为,都属于这种情况。我们要通过社会赏罚机制赏善罚恶,使违规者得不偿失,引导和迫使他们从善。如果大量的不道德行为不能得到有效禁止,实际上就会成为对恶的鼓励和对善的打击。在赏善罚恶不力、不明甚至颠倒错位的情况下,任何道德教化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实现社会道德风貌的根本好转也无从谈起。因此,我们在确立社会主义道德秩序的过程中,要加大赏罚力度,以确立道德调控的权威。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伟大历史时期,今后 15 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担负着极其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立为本,虚功实做,扎扎实实地推进我省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全面实现我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  
责任编辑:石成

## “八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

□刘 伟

“八五”（1991—1995年）已经结束，认真总结“八五”经济发展的经验，深刻认识“八五”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我们实践“九五”发展计划并进入21世纪，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回顾“八五”，我国经济发展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征。

### 一、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创历史的通货膨胀并存

“八五”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时期。从增长速度上看，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11.7%，比“七五”时期高出近4个百分点，同时，各年度之间增长速度的波动不大，没有出现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基本实现了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各年份增长速度的相对落差由“七五”的94.9%缩小为48.7%。从国际比较上看，“八五”时期我国GDP增长速度居世界领先地位，同期，美国、日本GDP年增长率仅分别为2.0%和1.7%，即使是增长较快的韩国和新加坡也只分别为6.8%和7.9%。因此，通过“八五”，在经济总量上我们提前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并不是说高速增长与高通货膨胀有着必然的联系，但“八五”期间我国存在高通货膨胀是一事实。“八五”前四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水平年均上涨10.8%，其中

1994年高达21.7%；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年均上涨12.1%，其中1994年高达24.1%；1995年零售物价涨幅回落到15%左右。整个“八五”期间年均通货膨胀率超过11%已成定局，而这一涨幅是我国有史以来最高的。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与同期高速增长密切相关。

### 二、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张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相对下降并存

“八五”期间是我国GDP增长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八五”累计完成GDP近18万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10万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14万亿元以上，从而使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前7位。

但同时，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却在下降。这种下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在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中，政府收入比重持续下降，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八五”前四年政府收入合计1.6万亿元，占GDP比重12.8%，比“七五”时期下降4.1个百分点，1994年甚至只为11.8%；而同期集体和个人收入比重持续上升，“八五”前四年集体、个人收入累计为11万亿元以上，占GDP87.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无论怎样判断、评价这种分配格局的变动，由此而来的政府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次，在财政支出刚性

增强的条件下，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使财政宏观调控陷入极度被动局面，“八五”时期累计实际财政赤字已达 6348.6 亿元，并且呈现逐年增加趋势，不仅难以有效运用财政政策实现宏观调控，而且财政赤字本身就推动了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指标恶化。其三，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比重持续下降，财政调控能力减弱，势必形成宏观调控对货币政策的依赖度提高，集体、个人收入相当比例转化为银行存款，加强了货币政策对于宏观调控的作用。这就要求在金融体制上深化改革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八五”期间虽然金融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专业行自负盈亏的商业化机制远未形成，央行独立性依然较弱；存贷款利率远未市场化，远低于物价涨幅，形成事实上的负利率；货币发行严重超出经济发展实际需要，“八五”期间，货币净投放 6144 亿元，比“七五”增长 2.7 倍，年均增长 29%，狭义货币 M1 和广义货币 M2 年均增幅分别达到 31.5% 和 32.5%，大大高于 GDP 现价增长速度。再加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低，尚不能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等等，使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效性受到严重影响，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能力。

### 三、产业结构深刻变化与农业落后并存

“八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工业化加速期产业结构高度演进的一般趋势，而且，总体上呈现出顺应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良性演进特征。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结构变化显示出中国工业化程度的急速提高。从产值结构演变上看，三大产业占 GDP 的比重，第一次产业由 1991 年的 24.5% 持续下降到 1995 年的 18%，而且同时农作物总产量在逐渐扩张，1995 年我国粮食产量已超过 9000 亿斤，基本体现了经济发展中农业产值比重下降但绝对量增长的趋势；第二次产业比重持续高速上升，从“八五”期初的 42.1% 逐年上升到期末的 49%，整

个“八五”期间第二次产业增加值达 8.5 万亿左右，占同期 GDP 的 47%，比“七五”时期上升近 4 个百分点，体现了工业化加速时期经济增长在产业结构上主要依靠工业化进展的特征，而且，以第二次产业比重为标志，我国工业化进展到“八五”期末已超过世界中等偏下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30%）；第三次产业稳步增长，整个“八五”时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大都稳定在 33% 以上，比“七五”时期上升近 3 个百分点，“八五”时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近 6 万亿元。上述结构演进比较典型地体现着工业化加速时期产业结构高度推进的一般规律，是“八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质态演进的重要特征。

但与这种质态演进相伴随的是农业基础薄弱，也就是说，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的农业基础不够坚实，工业化迅速进展和农业落后的矛盾，在“八五”期间显得极为突出。这种矛盾并非体现在农产业产值比重下降上（这一比重下降本身是发展的标志），而是体现在农业效率不高上。一方面是耕地减少和农业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另一方面是对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再加上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原因，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单产效率和规模经济改善等方面出现严重滞后；此外，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民负担加重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农产品收购价偏低等等，又使农业成本上升，使农业的相对收益下降。农业的滞后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严重制约着结构高度推进的进程，而且成为宏观经济产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仅就“八五”期间对农业的投入而言，尽管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增加农业投入，但由于政府财力有限，国有单位对农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农业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仍大幅度下降，由 1991 年的 2.6% 左右下降到 1995 年的 1.9% 左右；与此同时，集体和农户或者对于农业投入缺乏长远预期，或者能力有限，使得农业投入与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之间的不适应性日益严重。



#### 四、工业迅速发展与工业企业效益降低并存

“八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高速增长，年平均工业总产值（不变价）递增近19.9%；工业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到1994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近3.4万亿元，比1990年增加近2万亿元，相当于“七五”时期固定资产增加额的2.5倍，“八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近24%；人均装备系数由1990年的近2万元/人提高到1994年的超过4万元/人，平均每年递增20.2%；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进入世界前列，如原煤、水泥、电视机、布的产量已占世界第一；钢、电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原油保持世界第五位水平。可以说，“八五”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经济拉动的。

然而，与之并存的却是工业企业效益的降低。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工业企业亏损逐年增加，亏损上升势头难以遏制。“八五”前四年，我国工业企业亏损额以每年14.2%的速度增加，四年累计亏损高达2356亿元，相当于“六五”和“七五”时期累计亏损额的2倍，冲抵同一时期利润总额的47%，平均每年大约有500多亿元的利润被亏损企业抵销。

第二，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一是产成品资金占用过大，1994年末产成品资金近4000亿元，比1990年增长1倍多，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工业生产平均19.9%的增长速度；二是流动资金周转速度降低，“八五”期间全国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为1.7次，比“七五”时期平均水平低0.14次；三是产品销售率降低，“八五”期间降低2.5个百分点；四是企业间相互拖欠严重，到1995年末，企业间三角债已近8000亿元，占企业流动资金26%左右。企业资金占用大，利用效率低，一方面造成企业资金上的严重困难；另一方面，又加剧对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扩张的压力，从而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困难。

第三，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下降严重。

一是国有企业亏损面逐年扩大，到1994年已达30.9%，分别比集体工业企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企业高出14.3个和3.8个百分点。二是亏损额逐年增加，从1990年的不足350亿元逐年增加到1994年的482.6亿元，在工业企业全部亏损额中，国有工业企业所占比重平均每年高达71%。三是国有工业整体效益低下，“八五”时期国有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比“七五”时期下降5.4个百分点，国有工业资金利税率仅为10.1%，比集体工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低0.7个和1.5个百分点，成本利润率仅为4%，比集体工业和其它类型工业低0.1个和4.1个百分点。四是国有工业增长速度相对缓慢，“八五”期间，全部国有工业（乡及乡以上）生产平均增长速度仅为7.2%，远远低于集体工业平均增长27.7%和其它类型工业平均增长69.8%的速度；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1990年的66.3%降至1994年的49.1%；在全国工业新增生产份额中，国有工业企业增加额所占比重下降更为显著，从1991年的53%下降至1994年的28%。这表明国有工业企业对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八五”期间工业经济迅速增长，主要是依靠非国有经济增长来支持，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实现体制和增长模式转换的紧迫性。

#### 五、基础产业投入增大与“瓶颈”加剧并存

“八五”期间国家在产业政策上始终把发展基础产业放在重点位置上，因而基础产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等获得了显著进展。

首先，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八五”期间是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自1991年至1994年，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达51.6%，比“七五”期间平均增幅提高18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也由“七五”期间的平均8.6%上升为“八五”期

间的13.1%，更是超出80年代末以前的平均7.8%的比重。交通运输业投资大幅度增加，除国家在产业政策、财政、信贷、投资、价格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一重要因素。“八五”前四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国家投入已由“七五”期间的72.8%降至56.7%，地方投资、集资、合资、利用外资等方式形成的投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八五”期间仅直接利用外资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就近百亿美元，比“七五”期间增加2倍。由于投入的大量增加，“八五”期间我国综合运力显著增长，铁路营业里程新增3000多公里，电气化铁路所占比重由期初的13%提高到期末的16.6%；公路里程新增10万多公里，比“七五”期间新增公路多35%左右；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超过百万公里，1991—1994年间的增长量超过前40年的增长量，民用飞机增量达到“七五”期间新增数量的4.6倍。

其次，能源工业投入加大，产量稳定增长。“八五”期间国有单位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8400亿元，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3%左右。能源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其中，“八五”前四年基本建设新增原煤开采能力7142万吨；新增原油开采能力6086万吨；天然气开采新增能力44.26亿立方米；“八五”期间电力工业新增发电装机容量6782万千瓦。能源产量稳步增长，其中，发电量增长最快，“八五”累计发电量为41893亿千瓦时，平均增长9.8%，比“七五”时期增加55.3%；原煤产量58.8亿吨，平均增长3.5%，比“七五”时期增长6.7%；天然气838亿立方米，比“七五”时期增长16%。

尽管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在“八五”期间获得了显著发展，但基础工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仍远未克服，某些方面还相对加剧。首先，虽然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投入力度加大，但作为社会先行资本投入产业，现有投入比重远不符合先行资本产业要求，通常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交通、能源等基础产

业的投资比重在20—25%以上，我国目前尚远低于这一水平，有些方面甚至投入比重绝对下降，如“八五”期间能源工业投资比重比“七五”就有所下降，整个能源工业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总额比重的14.3%，交通运输业投入增幅大，但占总投资比重还在15%以下，远未达到20%以上。因而，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难以长期稳定支持高速增长。其次，供求矛盾仍然突出。在能源供应上，煤炭企业资金极为紧张，总体实现扭亏的困难很大；石油产量稳定的难度越来越大，进口原油已大于出口；电力生产增长仍未达到与经济增长同步的程度。在交通运输上，40%的铁路区段达到超饱和状况，铁路货运车皮申请满足率仅为71.6%（1994年）；50%以上的公路交通量超过设计能力；港口压港压船现象经常发生，港口接卸和疏运能力不协调；民用机场少，全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尚有一半多未通航，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需要形成鲜明的差距。其三，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加工工业。从增长速度看，“八五”期间原材料、能源工业等基础产业与1990年相比，平均每年递增14%左右，但加工工业与1990年相比平均每年递增22%左右；工业结构进一步向加工工业倾斜，1991年至1994年，基础工业分别增长8.8%、15.1%、19.7%、11.9%，而同期加工工业则分别增加14.9%、24%、25.8%、23.1%，均高于基础工业；进入1994年以来，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回落中基础工业更快，回落7.8个百分点，而同期加工工业仅回落2.7个百分点；由此进一步扩大了基础工业差距，加剧其“瓶颈”程度。

## 六、经济全面发展与发展水平低下并存

经过“八五”时期的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落后的大国的特点更加显著。在已有基础上，“八五”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提高了整个综合国力。首先，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七位。按1987年美元计，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2.3%上升至1994年的3.2%，我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8.5%上升至11.9%，相当于日本的比例从14.6%上升到20.9%。其次，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八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9%，居世界首位；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稳定上升，其中，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4%左右，远高于“七五”时期3.7%的年均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2%，也高于“七五”增长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到1995年末达到3万亿元左右，比“七五”末增加3倍多。其三，我国成为居世界第11位的贸易大国。199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2.59%，1991—1994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9.7%，远高于世界年均4.5%的速度，“八五”累计全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累计增长1倍多；国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1995年末上升到670亿美元左右，比“七五”末增加5倍。其四，科学、教育、卫生事业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为2658万人，居世界首位；成人识字率为73%，居世界中上水平；拥有医生总数为188.2万

人，居世界首位；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我国现阶段所实现的还只是低水平上的发展。首先，人均指标水平低。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GDP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03位，不足500美元，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490美元）。其次，产业结构质态落后。尤其是第三产业落后，产值比重仅为3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4%），而且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5%）。第一次产业产值比重为18%，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7%），第二次产业产值比重为49%，高于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0%）。总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再考虑到就业结构高度，我国在产业结构上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三，居民消费水平处于世界中下等地位。在消费结构上，食品支出比例达到50%以上，而用于交通、卫生、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比例仅为15%，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尚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

---

\* 本文所引用的统计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1995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在经济高速增长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条件下，中央“五中”全会提出转变增长方式的政策导向，是从供给角度实施总量管理的一个重要举措。这有助于减轻经济增长过程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依赖于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行为的转变，而这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作用，取决于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它们的经济增长也经历过一个数量扩张的阶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就曾说过，在机器大工业兴起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曾处于数量型的增长时期。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上升，才促使企业转变生产经营的目标和行为，由主要追求产量扩张转为日益注重提高生产经营的效率和质量。要推动我国经济由资源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变，提高市场机制对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调节作用，关键在于加快改革开放。我认为，在“九五”期间，要重点推进的改革开放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加快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尽快扭转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和效益低下的局面

市场机制的形成及其调节功能的增强，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重要市场主体的企业之行为合理化，否则，即使市场体系形成了，市场机制也难以正常运行和有效起

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的国有企业制度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有企业并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为什么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均明显好于非国有企业，且集中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却反而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主要因素？这除了某些客观原因之外，根本问题在于企业制度变革滞后。企业制度不合理使企业不能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出正常反应，或者说导致市场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因此，要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促进企业转变增长方式，首先要加快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

由于国有企业制度变革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涉及面广，影响性大，近期可以先在加快政企分开、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做较大努力。但需要加以明确的是，这几个方面实际上都是与产权问题和产权制度相联系的。如政企分开要以政资分开为基础，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要求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需要明晰产权关系。如果不尽快通过推进国有产权制度改革去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始终得不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局面难以真正改变。并且，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解决不好，非国有企业增长质量

##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几个重要问题

□郭克莎

和效益的提高势必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它们能够从国有企业模糊的产权关系中获得很多好处和有利条件，可以通过不正当竞争从国有资产获利或向国有企业转嫁损失，而一个产权模糊的企业是难以与一个产权明晰的企业展开竞争的。

应当指出，明晰产权关系决不等于搞私有化。因创立产权经济学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教授认为，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出证伪，中国可能会找到某种替代的财产制度，这种财产制度在公有产权的基础上，通过明确界定各产权主体的地位和关系，建立起市场交易。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也认为，只要分清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实现了真正的自负盈亏，就可以形成一个正常的市场主体，而与所有制的性质并无直接关系，国营和私营都是没有区别的。很多曾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从目前中国的情况看，全面的私有化，无论是其可行性还是必要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从国际经验看，混合经济比全面私有化要好。国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更明确地反对把产权制度变革与私有化的思路联系在一起，认为在坚持国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推进产权制度变革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公司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企业制度变革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探索充分表明，以此为基础才能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而接受市场机制的有效调节，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又必须以明晰产权关系为前提，因此，尽快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就成为加快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为了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我认为，近期可以推行一种国有产权承包经营——企业公司制改组的模式。具体改革过程包括：（1）组建一批跨地区、跨行业、没有“上级主管”的国有产权经营公司；

（2）对产权经营公司实行公开招标，通过竞争承包经营国有产权；（3）建立产权承包经营过程的利益约束和风险承担机制；（4）由承包经营国有产权的公司取代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组。同时，改变单纯依靠试点推进改革的方式，实行中央统一规划和地方推进改革的方式。由中央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要求，确定产权变革和企业改制的总体模式或基本模式框架，然后让地方在这个框架内实施具体改革，并在借鉴和创新的基础上探索各具特色的产权制度和公司模式。

## 二、在加快非国有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推动非国有企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提高发展层次

非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加快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市场竞争的程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实证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的增长效率（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贡献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国有企业一般没有国有企业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在税收等方面也有不少优惠或有利条件。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看，大多数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仍低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大量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仍相当差。随着这些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比重上升，企业经济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加快将成为关系到国民经济增长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进行相应的企业制度变革，非国有企业尤其乡镇企业必须建立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工业现代化的企业制度。这种企业制度变革既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调节，也要靠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引导。

在发展中国家，有两个重要因素妨碍企业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这就是企业规模较小和缺乏某些必要的互补性投入。二者都与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和技术进步的轨

迹有关。对于我国的乡镇企业来说，这两个方面的制约是相当突出的。由于企业的规模较小，许多重要的资本物品不能使用，新的技术发明得不到运用，因而小企业在采用新技术方面比大企业遇到更多的困难。同时，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要求更换原材料的种类、新的零部件和维修设备，要求提高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程度，而这些互补性投入要素在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中往往是不能全部具备或不容易得到的，互补性投入的缺乏使乡镇企业的技术改进和技术应用比国有企业更困难。解决的途径，一是可以促使乡镇企业与大型的工业企业相结合并协调起来（但应注意不能抑制了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力），采取股份公司或企业集团的形式，以克服采用新技术的规模约束和互补性投入的制约。二是必须促使乡镇企业尽快提高生产者的知识和技能，使生产者的素质与技术进步的过程相协调。应当指出，提高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者的素质，还是提高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条件。

我国的非国有企业尤其乡镇企业的发展正有方兴未艾之势，它们的迅速发展是解决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和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希望所在，同时对国民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只有以适当政策推动这些企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提高发展层次，才能全面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三、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提高市场机制对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调节作用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和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是推动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最重要基础。但是，近几年由于经济超高速增长，市场需求过度扩张，通货膨胀较为严重，加上企业体制尚不合理，市场机制在促进企业提高质量和效益方面的调节功能受到很大影响，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的作用甚至有扭曲的态势。因此，应当在

控制经济适度增长和加快企业制度变革的条件下，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来提高市场机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节作用。这主要包括：

第一，推动市场体系的系统和协调发展。市场体系不完整或某个市场片面发展，都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甚至妨碍市场正常运行。我国的市场体系，除消费品市场较为发达，生产资料市场发展较快外，其他要素市场基本上尚未形成或很不健全，特别是作为市场机制运行基础的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发育程度仍很低，明显不能适应产品市场变动引起的市场机制运行并发挥调节功能的需要，也影响了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连锁关系和相互作用。各种要素市场很不健全，主要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但几个基本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过低或发展过于缓慢，则与相关体制改革的滞后有很大关系。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发展缓慢，与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进展较慢有关；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发育迟缓且发育不正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技术市场不能较快发展，也是由于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以及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阻碍。因此，要促使这些基本要素市场较快发育和形成，关键在于加快相关体制改革的进程。只有使最基本的市场体系尽快确立和系统发展，才能使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具有整体效率，使市场机制能够发挥正常的调节功能。另一方面，要注意市场体系由低到高的有序发展进程，重视各种要素市场的协调发展。对于证券市场、期货市场这些较复杂的市场的过快发展，要持谨慎态度和采取适当措施。国外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在有关法律和监管手段不健全条件下，过早发展这些高难度的市场，存在着一定危险，很可能弊大于利。要防止市场体系的发展出现失衡，导致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其弊端却过度发展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推进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注重整体性

和协调性。

第二，加强市场规则的作用。市场规则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准则，是市场机制运行和发挥调节功能的基本条件。市场规则包括法律法规、行政管理规定和道德规范三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市场规则规范和约束着资源所有者、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三类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规范和约束生产经营者即企业的市场行为，包括规范企业的正当竞争，约束企业的合理逐利等。市场规则发挥作用需要三个条件：一是规则的合理建立；二是规则的执行和管理；三是广泛的社会监督。市场规则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影响我国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问题出在哪里呢？从市场法律法规的建立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相继制订和出台了一大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法规，虽然这些法律法规从总体上说还很不系统和不健全，但主要的方面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问题在于，不少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较差，过于严厉和复杂的法律并不是好的法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法律执行过程所耗费的资源远远大于法律本身得到的好处，这些法律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从市场法律法规的执行和管理看，问题十分突出，可以说大多数法律法规没有得到较好实施，主要原因是执法和管理队伍较为薄弱，素质太差，腐败相当严重，同时权力机构和政府官员对执法过程的非法干预也带来了很大影响。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法律法规不能正常施行，大大地影响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法律观念的强化。从执法过程的社会监督看，由于各种社会性监督机构不健全，舆论监督的影响受限制，执法监督的社会风气尚未形成，作用仍很小。这样看来，作为市场规则最主要内容的法律法规对企业这个最重要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的约束作用尚未真正形成，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自然受到很大妨碍，特别是竞争机制促使企业提高效率的作用得不

到有效发挥。因此，要促进市场规则的形成和作用，必须通过进一步推进有关改革，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及其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执法和管理队伍的力量，提高其素质，治理其腐败，排除各种非法干扰；并加强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法律观念，提高全社会的监督意识。

第三，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市场法律法规的实施，影响了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和市场规则的合理形成，特别是影响了市场竞争过程的正常展开和优胜劣汰机制的有效作用，使一大批地方企业能够在这个保护伞下稳定地实行数量型扩张和重复低层次发展，而不是把增长方式和投资重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的轨道上来。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地方利益的相对独立化，以及利益分配格局与资源配置过程的联系。应当以完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为中心，推进利益分配体制的改革，淡化利益分配机制与资源配置形式的关系，并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在这个基础上，要发挥市场机制对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调节作用，必须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倾向，打击干扰市场机制作用的违法行为，不仅要继续消除地方市场的封锁和割据状态，而且要进一步禁止地方政府对本地企业不正当竞争的保护以及对市场统一管理和执法过程的干扰。

#### 四、实施对外开放的战略转变，在扩大开放中提高开放质量和效益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对外开放度已相当高，基本上完成了数量型扩张的阶段，目前已到了实行战略性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应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重点，并进行一系列相应的体制变革和政策转换。

从对外贸易看，要改进外贸经营效率，提高我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主要靠两条：第一，加强进出口商会的作用。外贸垄断和过度竞争是影响我国外贸效益

的一对矛盾、两大弊端，消除弊端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进出口商会的作用。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看，进出口商会在为国内企业服务 and 协调外贸经营，从而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提高对外竞争力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应加强进出口商会的组织和制度建设，引导大多数企业加入行业商会，加强商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威性，提高商会的服务效率和协调能力。第二，加快大经贸格局的建设。目前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并且形成两张皮的状况，明显影响外贸经营的效益。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形成大经贸格局，即组建贸工（农、商、技）结合的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发展集团化和国际化经营。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看，通过这种形式发挥大经贸优势，对于提高国际竞争力和降低营销成本，具有很大的作用。应当推进外贸体制及相关体制改革，为加快大经贸格局形成和大型外向型企业集团发展创造条件。

从利用外资看，要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效益，关键在于：其一，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和法律环境，逐步推行国民待遇政策，更多地吸收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高技术投资。其二，进一步开放利用外资的领域，利用外资的范围由肯定法转为否定法，只明确规定外资不能进入的某些领域，其余的全部放开，同时允许外商的高新技术投资以外资控股和让出部分市场为条件，更多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合作项目。其三，通过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导外资较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和基础产业部门，并对低层次、高污染项目加以必要控制。其四，在完善有关法律和健全执法监督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惯例，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加强对资金到位、利润转移和避税行为的监管。

## 五、在推进宏观调控机制的转轨和完善的基础上，提高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调控能力

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宏观调控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九五”宏观调控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反通货膨胀为中心，防止需求膨胀和结构失衡；二是以加快技术进步为中心，调整投资重点和优化产业结构。前者为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创造环境条件，后者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物质保证。要实现如上目标，必须进一步推进改革，加快宏观调控机制的转换和完善，并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各种宏观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对于不同的调控目标，经济、法律和行政三种手段的运用应该有所侧重，互相配合。提高经济和法律调控的比重而降低行政调控的比重是宏观调控机制转变的一个基本趋势，但现阶段，至少是“九五”期间还不能忽视行政调控的作用，特别是对于控制经济超速增长来说行政手段还相当重要。但行政调控的对象要由国有企业转向地方政府，控制其助长本地区经济过度扩张的行为，或盲目扩大投资以追求政绩的倾向。二是各种宏观政策的相互协调。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关的各项政策，如需求管理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技术进步政策等要注意相互协调，防止一项政策的力量被另一项政策的影响所抵销。如需求管理的总量性政策和环境保护的总体性政策，是产业发展、技术进步、投资重点以及外贸外资等结构性政策的基础而不能被突破。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 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

## 一、我国汇率制度的选择

1994年1月,我国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统一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取消外汇分成制度,实行外汇结售制度;建立全国统一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取代原有的外汇调剂市场。通过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我国形成了有管理的单一的浮动汇率制度,建立起新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首先,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对于原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1994年以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并存的复汇率制度。人民币官方汇率是中国人民银行制订和公布的汇率,它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根据我国国际收支的情况和对外经济政策的需要随着若干种主要货币币值的变化而调整。人民币调剂汇率则是在外汇调剂市场上由外汇供给和需求决定的汇率,它随着外汇供求的变化而变化。复汇率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汇率制度,它增加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敦促有关国家改进的汇率制度。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一举实现了官方汇率和调剂汇率的统一,建立起单一的汇率制度,这无疑是我国走向更高程度开放的重大举措。

其次,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适应汇率制度改革潮流。1973年,随着国际金汇兑本位的崩溃,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也宣告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复合货币本位条件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下,发达国家一般选择单独浮动的汇率制度,发展中国家则选择钉住单一货币、钉住一组货币以及灵活的汇率制度。据统计,从1976年到1989年,选择钉住单一货币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从62.6%下降到

38.2%,选择钉住一组货币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从23.4%变化到28.2%,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从14.0%上升到33.6%。在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中,选择管理浮动和单独浮动的发展中国家从8.4%上升到29.8%。①由此可见,70年代以来,选择钉住单一货币的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持续下降,选择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持续上升,其中选择管理浮动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上升得最快。我国的汇率制度是一种介于管理浮动和单独浮动之间的汇率制度,它顺应了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变化趋势。

再次,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第7位,进出口贸易位于世界第11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落后水平。显然,我国不应选择钉住单一货币的汇率制度。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与某个发达国家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为了保持这种关系的稳定而把本国货币与该发达国家货币的兑换比率固定下来,然后随着该发达国家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浮动。钉住单一货币的汇率制度的局限性是本国货币的汇率乃至利率都不得不随着某个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和利率的变化而变化,难以发挥汇率和利率对本国对外经济关系和本国国内经济的调节作用。我国也不宜选择钉住一组货币的汇率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与某几个发达国家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为了保持与这些国家经济关系的稳定同时又避免本国货币汇率较大幅度的波动,把本国货币与某几个发达国家货币币值的加权平均数的比率固定下来,并随着这些国家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汇率的变化而变化。钉住一组货币的汇率制度的局限性是本国货币汇率的变化并不能确切地反映本国与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变化,本

国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不能有效地调节本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另外，我国还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那种较为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我国选择自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合适的。

## 二、我国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从总体上看是与国际货币制度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汇率制度，但它本身还存在某些尚需完善的地方。按照现行的汇率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每天根据上一个营业日银行之间外汇市场成交汇率的加权平均数，公布本营业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然后参照国际外汇市场美元对港元和日元的汇率，决定人民币对港元和日元的汇率。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允许在公布汇率上下0.3%的幅度内浮动，银行与顾客之间的外汇交易允许在公布汇率上下0.25%的幅度内浮动。这种谨慎的注重稳定的制订汇率的方法对于保证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是必要的，但它本身还存在下述问题：

第一，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变化幅度的限制过于严格，使人民币汇率实际上难以反映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例如，假定某日美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是1美元=8.3191人民币元。按照波动幅度不得超过公布汇率上下0.3%的规定，第二个营业日每1美元兑换人民币数量的变化不得超过0.025人民币元，第十个营业日以后每1美元兑换人民币数量的变化不会超过0.25人民币元。可以设想，如果在外汇市场上持续发生美元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情况，由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受到严格的限制，公布的汇率会逐渐脱离由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决定的汇率。久而久之，人民币汇率有可能演变为一种不反映外汇供求情况的官方汇率。这样，单一的汇率制度将受到破坏。

第二，人民币汇率没有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上实际的外汇供求情况。按照目前的外汇结售制度，国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收入的外汇，必须按照公布的汇率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即结汇；在经常项目下支出的外汇，则可以向外汇指定银行购买，即售汇。中央银行担负着买进或卖出外汇市场供求差额的责任。在公布的汇率下，如果结汇大于售汇，中央银行需要买进外汇；如果结汇小于售汇，中央银行需要卖出外汇。因此，人民

币汇率没有反映中央银行平衡外汇供求前的外汇供求情况。按照这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可以保持长期的稳定，但对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则造成很大的压力。如果外汇供给量持续大于需求量，中央银行不得不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假如国内同时发生了通货膨胀，中央银行收缩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削弱。相反，如果外汇供给量持续小于需求量，中央银行不得不卖出外汇收回人民币，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假如国内同时发生了经济增长缓慢的现象，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影响。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以来，我国外汇市场基本上处于外汇供给量大于需求量的状况，1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数量只减少了约0.4人民币元，但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中央银行为买进外汇投放了大量的人民币。对于外汇储备增加的问题尚能用提高外汇储备效益的方法来解决，大量投放的人民币却严重削弱了中央银行为对付通货膨胀而实行的货币政策。可以设想，如果发生相反的情形，中央银行因卖出外汇收进人民币而造成的货币供给量的收缩还可以用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方法来抵销，但外汇储备的流失将会对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形成威胁。

第三，人民币汇率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对外汇供求的调节作用。汇率是外汇的价格，它由外汇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对对外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对外汇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这就是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例如，当我国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量大于需求量时，人民币汇率将会下降。人民币汇率的下降将会通过增加出口的人民币收入和提高进口商品的人民币价格而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从而对外汇供给量和需求量产生调节作用。但是，我国却没有很好地利用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市场上外汇供求的差额，人民币汇率难以随着外汇实际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也就不能通过汇率的变化对对外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强制性的结汇制，即使汇率的变化有较大的弹性，也无法对结汇产生影响，而只能对售汇产生影响。这样，汇率机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没有被利用或者说没有被充分利用。

因此,要使我国的汇率制度更加完善,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进行调整。

### 三、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我认为,在现行的汇率制度下,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第一,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在规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外汇汇率随着外汇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中央银行不设立强制性的汇率波动的上限和下限,而是在汇率的波动超过一定的幅度时利用买进或卖出外汇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防止汇率过大的波动。但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国际竞争力还不强,中央银行驾驭外汇市场的经验还不足。如果实行这样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易于波动,而且还有可能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对汇率的波动实行一定的限制,问题是这种限制不能过于严格。我认为,中央银行仍应采用现行的制订汇率的方法,即根据上一个营业日银行之间外汇市场成交汇率的加权平均数确定本营业日的公布汇率,但允许实际汇率在公布汇率上下较大幅度的波动,如允许实际汇率在公布汇率上下0.5%的幅度波动。放宽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既可以防止因限制得过于严格而造成汇率不能反映外汇供求变化的情况的出现,又可以避免汇率频繁波动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外汇市场出现外汇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人民币汇率将会进行调整,但调整的时间被延长,因而单位时间的波动幅度将减少。

第二,中央银行不再承担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供求差额的责任。中央银行买卖外汇供求差额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市场基本上处于外汇供过于求的状态。尽管中央银行买进外汇投放人民币助长了国内价格水平的上升,但外汇储备的增加并没有对外汇管理体制造成不利影响。假如日后外汇市场发生外汇供不应求的情况,尽管由此造成的货币供给量的收缩可以用扩大货币供给量的方法来抵销,但外汇储备的流失则直接动摇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性和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

制。因此,中央银行应从买卖外汇供求差额以稳定汇率转变为通过汇率的变化调节外汇的供求。在中央银行不再买卖外汇差额以后,如果外汇供不应求,允许人民币汇率下降,以刺激结汇和抑制售汇;如果外汇供过于求,允许人民币汇率上升,以限制结汇和鼓励售汇。这样,就可以较为充分地发挥人民币汇率的调节作用。

第三,把强制结汇制转变为自由结汇制。正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制,即外汇收入必须要出售给外汇指定银行,中央银行才不得不买进或卖出外汇供求差额。要使中央银行不再买卖外汇供求差额,同时要使汇率的变化对结售汇都产生影响,应该把强制结汇制转变为自由结汇制。任何企业,包括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必须在外汇指定银行开设贸易现汇帐户和资本现汇帐户。不同来源的外汇收入,分别进入这两个帐户;不同去向的外汇支出,分别从这两个帐户支付。对贸易现汇帐户的外汇实行自由结售制,它可以保留在贸易现汇帐户里,也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支出,可以从贸易现汇帐户里支付,也可以在外汇市场上购买。对资本现汇帐户的外汇则仍然加以严格的管制。在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和流出,都要经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批准。经过批准流入的长期外汇资金可以保留在资本现汇帐户里,也可以在外汇市场上出售;经过批准流入的短期外汇资金,则必须向外汇指定银行结汇。在资本项目下的外汇支出,经批准分别从资本现汇帐户中支付或者在外汇市场上购买。这意味着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实现可自由兑换。

我认为,经过上述调整以后,人民币汇率能够更加充分地反映外汇市场实际的外汇供求情况,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发挥对我国对外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将更加完善。

---

① B. B. Aghevli, M. S. Khan, P. J. Montiel, *Exchange Rat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MF, 1991, P3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 谭湛明

# 变革时期广东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温思美 罗必良 李大胜

##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国内外农业经济学者的广泛兴趣。虽然人们一致认为,农村体制改革广泛而成功的推行是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但这一解释仍不能满足当今经济学研究日益定量化的要求。因此,许多学者在定量分析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方面进行了各种尝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冯海发等人(1989年)、顾焕章等(1990年)、Fan(1990年)、Lin(1989年)以及McMillan等人(1989年)的研究成果。Lin的研究表明,在1965年至1987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现代农业投入要素的增加所作的贡献占总增长的40.8%(其中化肥这个要素占其中的2/3),另外43.06%的增长是由于制度变革所引起的。他认为,这期间的技术进步和价格变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不足2%。McMillan等人利用典型的Dennison-Solow增长核算法所作的研究表明,1979年以后农业增长的2/3源于农业体制改革,大约22%归因于价格刺激效应。

## 二、关于农业增长因素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论问题

尽管国内外许多学者利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均在全国一级进行,缺乏省区案例分析,关于广东的类似研究更不多见。Wen和Zhang于1992年采用Fan等人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分析了广东农业增长的影响因素。

他们将广东省分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余地区”两组,分别估计了这两个地区和全省农业增长的分阶段(1979—1985年,1986—1990年)变化情况,得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Wen and Zhang, 1992, P73)

本文对广东农业增长因素的分析,是1992年Wen和Zhang所作研究的继续和扩展。目的是要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和断面数据,估计1978年以来广东农业增长过程中要素投入、制度创新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由于省内不同地区的显著差异性,我们仍将广东省分成两部分: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其余地区;把1978年以来分为两个时期:1978—1985年,1986—1994年,以比较它们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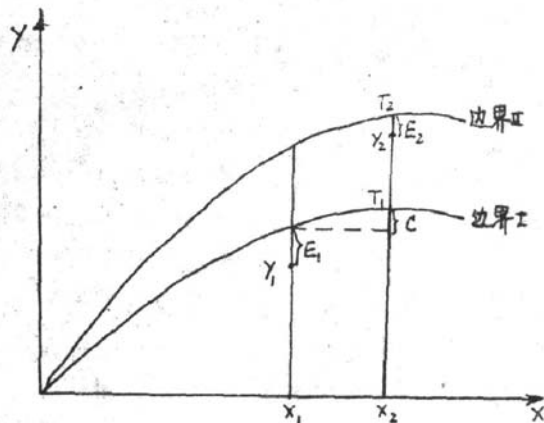


图1 增长因素影响示意图

下面我们来解剖一下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一个简单的生产函数模型中,技术变化可以被定义为生产函数的移动,而制度创新则是一种改革

生产刺激的形式，有助于效率的改善。在这一生产函数中，效率的改善被定义为生产者实际产出与其潜在最大产出（即产出边界）之间差距的缩短。在图 1 中，边界函数 I 和 II 分别代表生产者在时期 1 和 2 的技术水平。如果经济处于最佳效率状态，则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相等，即  $T_1$  等于  $T_2$ 。现在假设由于效率不完善，两时期的实际产出分别为  $Y_1$  和  $Y_2$ 。根据这一假设，技术变化可以表示为  $T_2 - T_1$ ，而效率的改善则由  $E_1 - E_2$  表示，也即两个时期与相应的最佳效率的差距的比较，如  $E_1 > E_2$ ，则第二期的效率改善了；反之，则效率下降了。图中 C 表示的线段是将要素投入从  $X_1$  增加到  $X_2$  而增加的产出，因此，它代表增加要素投入对总产出的贡献。这样，总产出的增加 ( $Y_2 - Y_1$ ) 来自三个方面的作用：要素投入的增长、技术变化以及效率改善，也即：

$$Y_2 - Y_1 = C + (T_2 - T_1) + (E_1 - E_2)$$

我们选择随机边界函数的分析方法以消除观察值的可能波动对分析准确性的误差。我们定义以下生产函数：

$$Y_{it} = f(X_{it}, b) e^{V_{it}} e^{U_{it}}$$

$$\text{或者 } \ln Y_{it} = \ln f(X_{it}, b) + V_{it} + U_{it} \quad (1)$$

其中， $i$  表明第  $i$  个地区（本文以县为单位）， $t$  代表时间。 $Y_{it}$  表示农业总产值， $X_{it}$  是一个  $1 \times K$  的要素投入， $f(X_{it}, b)$  代表潜在的最大农业总产出（值）， $V_{it}$  代表非可控因素对产出作用的随机变量， $U_{it}$  为一单尾分布的随机变量， $U \leq 0$ ，代表技术效率不佳的程度（technical inefficiency）。因  $V_{it}$  为外生的随机变量，因此， $f(X_{it}, b) e^{V_{it}}$  是随机边界，从以上假设可知，实际产出一定是位于或低于这一随机边界。根据以上定义，一个地区或农户在  $t$  时间的生产效率可以表示实际产出与边界最佳产出的比率，即：

$$Y_{it} / f(X_{it}, b) e^{V_{it}}$$

根据以上假设，考虑到计量分析的可操作性，我们定义以下边界函数形式进行经验估计。

$$\ln(Y) = a_0 + a_1 t + \sum_1 a_{1i} \ln(X_i) + \sum_1 a_{2i} \ln(X_{it}) + a_{2t} t^2 \quad (2)$$

### 三、计量分析结果及其讨论

我们利用公式 (2) 进行经验估计。模型中所用数据是 1978 年到 1994 年期间的截面 - 时间序列所组成的混合数据 (Panel data)，总产出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表示。考虑到资料的限制，投入要素只选择了土地、劳动力、化肥、农机总动力四个指标，土地以播种面积表示，以公顷为单位，农业劳动力是从年末农村总劳动力中扣除从事乡镇企业的人数得到的，化肥按有效成分折合成标准单位，农机总动力以年末总马力表示。所有变量的观察值均以县区（或县级市）为统计范围。

表 1 生产函数的主要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变量	系数估计值
$a_0$	-3.015*	$X_1 t$	-0.1020**
$X_1$	0.451*	$X_2 t$	-0.0065**
$X_2$	0.258*	$X_3 t$	0.0078*
$X_3$	0.143*	$X_4 t$	0.0084***
$X_4$	0.062**	$t^2$	0.0013***
$t$	0.0637***		

注：1. 系数估计值为一个“\*”号的表示其显著性水平为 5%，有两个“\*”号的则表示其显著性水平为 10%，有三个“\*”号的表示其显著性水平为 20%。

2.  $a_0$  为常数项。 $X_1 \dots X_4$  分别代表劳动力、土地、化肥和农机总动力； $t$  为时间趋势变量，1978 年为  $T = 1$ ，…，1994 年为  $T = 17$ 。 $X_1 t \dots X_4 t$  为各投入变量与时间变量组成的交叉项。

表 1 是基于公式 (2) 的生产函数形式采用极大似然法得到的模型估计值，表中数据大多符合 5% 的显著水平，只有少数估计值的  $t$  检验在 10% 和 20% 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从这些变量在 1978—1994 年的生产弹性，我们发现，劳动力和土地两个投入要素的生产弹性在动态上是下降的，而化肥和农机动力两个投入要素的生产弹性在分析期内则是上升的，尽管其增加的趋

势进入 90 年代已开始放慢。这表示前两个投入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增加引起的产出增量在下降，如果没有其他现代投入要素的配合（我们这里把技术和体制因素也考虑在内），则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将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化肥和农机两要素生产弹性的增加，表明这两个要素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这一点与我们从现实中观察到的情况相吻合；在三角洲地区，由于劳动成本较高，小农机对劳动力的替代正在悄悄地广泛地出现；而化肥使用量的逐年增加已成为保证农作物产量的关键投入，加上近几年山区农村商品农业的发展，对化肥的依赖日益明显。时间趋势变量  $t$  的系数大于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表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相当程度是通过农业的中性技术进步实现的。

下面讨论广东农业增长的源泉。我们将效率的改善解释为由于生产者刺激结构的改善，这主要由改变各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调整与创新而实现的。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使总产出增长。因此，我们认为，总产出增长的因素是投入要素的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利用公式 (2) 的分析结果，生产函数的估计式可以作如下表示：

$$\ln Y(t) = a_0 + \sum_i a_i \ln X_i(t) + \sum_i a_{it} \ln [X_i(t)]^{xt} + a_t t + a_{tt} t^2 + \ln [e^{v(t)}] + v(t) \quad (3)$$

$$= \ln A_0(t) + \sum_i a_i(t) \ln X_i(t) + \ln E(t) \quad (4)$$

其中  $\ln A_0(t) = a_0 + a_t t + a_{tt} t^2 + v(t)$ ； $a_i(t) = a_i + a_{it} t$ ，而  $E(t) = e^{v(t)}$ 。对 (4) 求时间  $t$  的一阶导数，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表示为：

$$3 \ln Y(t) / 3t = 3 \ln A_0(t) / 3t + \sum_i a_i(t) \times 3 \ln X_i(t) / 3t + \sum_i \ln x_i(t) \times 3 a_i(t) / 3t + 3 \ln E(t) / 3t \quad (5)$$

第 (5) 式中右边第一项测量中性技术进步，第二项计算要素投入变化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它是要素投入增长率 ( $3 \ln E(t) / 3t$ ) 与相应的要素弹性  $a_i(t)$  的加权总和；第三项测量偏倚的技术变化对产出增长的作用，如果它大于零，则偏倚性技术变化引起产出增加（利用丰裕要素代替稀缺要素），反之，这种偏倚性技术进步导致总产出下降（用稀缺要素代替了丰裕要素）。最后一项属随机扰动项，表示制度改革对总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程度。

我们用公式 (5) 对农业增长进行分解。为方便起见，我们将 (5) 式中第一项表示的中性技术变化和由第三项表示的偏倚性技术变化加总，作为总的技术变化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余地区和全省三个组别分别计算两时期（即 1978—1985 年，1986—1994 年）的数据，结果见表 2。

表 2 广东农业总产出增长因子及其贡献 (%)

	1978—1985 年			1986—1994 年		
	珠三角	其余地区	全 省	珠三角	其余地区	全 省
总产出增长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总投入增长	52.25	60.17	55.31	56.32	59.20	57.98
劳动力	23.16	15.27	20.61	24.41	15.78	21.41
土地	-4.51	2.24	-2.98	-4.83	0.14	-3.66
化肥	24.31	27.38	25.43	26.68	27.85	26.81
农机	10.29	15.28	12.25	13.86	15.43	13.92
总生产率增长	46.75	39.83	44.69	43.68	40.80	42.02
体制创新	36.61	30.05	34.64	32.52	30.04	31.00
技术变化	10.14	9.78	10.05	11.16	10.76	11.02

注：每个时期的农业总产出增长定为 100%。总投入要素和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比例相加应为 100%。

表2显示,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农业增长愈来愈依赖于投入要素的增加。在1978—1985年期间, 农业总产值增长中有55.31%源自投入要素的增加; 而1986—1994年期间, 投入要素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则上升到57.98%, 增加了2.67个百分点。这两个时期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从44.69%下降到42.02%。这表明, 农村改革第二阶段开始以后, 由于缺乏像改革开放初期引进责任制那样强有力刺激, 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有减缓的趋势。这一结论可从制度创新的贡献率明显下降得到进一步印证。在第一阶段, 农业制度创新占农业总产值增长的34.64%, 对总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77.5%; 而这一指标在第二阶段分别为31.0%和73.8%。

第二个结论是, 在各种生产要素中, 农业劳动力和化肥使用量是最重要的投入, 而且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的重要性有上升的趋势。作为现代投入要素的农业机械, 其重要性在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有显著上升, 对总产值的贡献从12.25%上升到13.92%, 增长了14%。这一结果表明, 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 农村劳动力被机械替代的经济合理性是非常显著的。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 在两个时期都是农业增长的制约, 而且其制约能力有增加的趋势, 这一点与迅速推进的广东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密切关系, 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这种状况尤其明显。

第三个结论是, 虽然1985年以后制度创新的贡献稍有下降, 但技术进步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在1978—1984年期间, 技术进步对农业总产出增长的贡献为10.05%, 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22.5%; 1986—1994年期间, 这两个指标分别上升到11.02%和26.3%, 许多案例可以支持这一结论。最典型的是广东各级政府大力促进“三高农业”和“创汇农业”的发展, 面向市场促进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结构比重大幅度提高。我们可以说, 这一阶段的农业技术进步是在市场诱导和政府促进两方面推动下实现的。

此外, 尽管制度创新的贡献在第二个时期有所下降, 即从34.64%减少到31%, 但总的来说, 它仍然是农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在我们所考察的因素中, 没有任何“单个”因素有如此大的作用。在这两个时期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中, 制度创新的贡献率分别为77.5%和73.8%。这表明, 通过各种制度安排改进对生产者的刺激水平, 使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 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关键因素之一。

分析表2“珠三角”和“其余地区”这两组数据可见, 农业总产出增长除了具有以上分析中全省的一般特点外, 地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投入要素对两地区的农业增长虽然都非常重要, 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作用比其余地区更加明显。从分析中的两个时期来看, 要素投入的贡献在珠三角地区明显上升, 而在其余地区则略有下降。对这一现象可作如下解释: 珠三角以外的地区农业投入相对来说原来就严重不足,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 增加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是上升的, 但当投入增加到第二时期时, 其边际产出率可能出现下降的趋势。同时, 对珠三角地区来说, 80年代开始的农村工业的迅速扩张, 使农业资源大量转移向非农产业, 就其生产技术水平而言, 其要素投入处于相对不足状态(相当于在生产函数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初期), 因此, 要素投入的增加(第二时期)可能使其边际产出率增长。在四种主要投入要素中, 化肥和机械的作用在其余地区更为明显, 而劳动力和土地在珠三角地区更加重要。前者似乎与人们的一般判断略有出入。劳动力的作用在珠三角地区非常重要, 且在两个时期略呈上升趋势, 这是由于劳动力这一传统要素在珠三角地区一直比较缺乏, 加上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面推进, 使农业劳动力的作用更加突出。土地这一要素在其余地区的作用比较稳定, 但在珠三角地区, 它对农业产出增长的制约有加强的趋势。这一现象印证了珠三角地区大量耕地被占用的现实后果。

在整个分析期内，珠三角地区总生产率的增长对总产出的贡献要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余地区的这一指标既低于珠三角地区，也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这似乎是人们预料之中的结果。就农业生产率增长的源泉来看，两地区都表现出对制度创新的极大依赖。尽管这两地区均有所下降（两时期分别为78.3%、75.4%和74.5%、73.6%）。此外，两地区农业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在整个分析期内都非常重要，且有明显的上升；珠三角地区农业技术进步的贡献在整个分析期间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但在第二阶段，其余地区技术进步的作用有更为显著的增加。这表明广东省第六次山区工作会议以后，鼓励开发山区资源，大力发展山区“三高”农业的措施显然促进了这些地区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在制度创新方面，虽然珠三角地区一直高于其余地区，但其余地区在整个分析期内比较稳定，没有显著的弱化迹象；而珠三角地区在第二阶段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从实践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丘陵山区在制度创新方面明显优于珠三角地区的情况，倒是相反。因此，这一现象只能解释为两个地区对制度创新的反应敏感度存在一定差异。对珠三角地区来说，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它需要较高层次的制度创新才能足以支持或促进其效率改善。因此，它对一般性或者说浅层次的制度创新可能并不十分敏感。

#### 四、结束语

本文的目的是分析广东农业增长的源泉，即从定量的角度确认有关因素对广东农业16年增长的贡献。

根据第二部分所讨论的理论框架，我们选择边界函数形式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经验估计。在模型分析中，我们将中性和偏倚性技术进步两项汇总作为总的技术变化，表示效率改善的制度创新也未进一步细分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我们认为，这样做并不影响对问题的解释，因为理论框架中只关心三个增长

因素的贡献程度。

模型的估计值总体上是满意的，也与我们在实践中观察到的状况相一致。分析表明，要素投入的增长仍是农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且现代投入要素的作用更为明显，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在农业生产率增长中，制度创新的贡献超过2/3，其余1/3为技术进步的贡献。但是，制度创新的作用在8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没有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突出，而技术进步的贡献正在逐渐增加。这一结论是合理的：制度是相对稳定的，有时是间断的；而技术是渐进连续的。从两个分区比较来看，区域之间的差异显然存在，且符合各自所处的农村经济发展水平。

#### 参考文献

1. 冯海发等：农业总生产率研究，天则出版社，1990年。
  2. 顾焕章等：中国农业增长的源泉与技术进步，南京，1990年。
  3. 温思美：广东农村的市场化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4. Fan, Shenggen: "Effects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on Production Growth in Chinese Agriculture", Minnesota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Station Paper No. 18172. 1990.
  5. Lin, Justin Yifu: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 Mimeo, Beijing: DIRCRD, 1989.
  6. McMillan, John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7. No. 4. 1989.
  7. Wen, Simei and Yueheng Zha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okyo: IDE Publication, 1992.
- (\* 南京农业大学经贸学院顾焕章教授为本文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 慧能的佛性思想及其演变

□冯 翼

佛性是众生成佛的理论根据,属于佛学本体论(Ontology)范畴,它是随着大乘佛教空宗走向极端而产生的一个理论概念,后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佛学理论。

在佛教史上,慧能以他超人的智慧建立了独具创新意义的佛性思想,并以此为核心

创建了最为重要的思想体系和佛教流派。正确把握慧能及其传人的佛性理论,无疑是认识整个禅宗思潮的钥匙。

## 一、执著之心与本然之心

慧能一卷《坛经》,处处讲“心”,但这“心”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却长期令学术界困惑不解,并因此而导致了对慧能整个佛学思想截然不同的把握。有的学者认为,慧能所讲的心是“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灵明不昧的宇宙的‘心’”;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慧能的心是“最完全、最圆满的主观精神(本心)”。②慧能的所谓“心”,为何引至如此不同的认识?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全面、深入地分析其佛性思想。

慧能虽然常常谈“心”,但我们发现,他基本上在两个层面上谈论这一对象:③一是在众生的层面。这个层面的“心”可以叫做“执著之心”,也就是滞着于人心内外某种法相的心。这种心因为滞于一法(相),故不能通达无碍来去自由。“执著之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妄心”。如“非幡动、风动、人心自动。”④“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⑤“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谤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⑥等等,这里的“心”都是妄心;另一种是“善心”。如“不见自性本净,心超看净,却生净妄。”⑦“既忏悔已,与善知识发四弘誓愿,各须用心正听。”⑧“若遇大乘顿教法,虔诚合掌至心求”⑨等等,这里的“心”都是善心。虽然慧能经常说“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⑩表现出传统佛教舍恶向善的倾向,但这只说明他的佛学革命尚不彻底,并不妨碍他超越善恶之心的思想倾向,他的宗旨是复归心“不思善、不思恶”时的“本来面目”。⑪所以,在他的主体思想中,“妄心”固然当去,“善心”亦不可存。

另一个层面是佛的层面。这个层面的“心”可称为“本然之心”。所谓“本然之心”是相对“执著之心”而言的,指那种寂然无住、不染善恶、来去自由、圆融无碍的本始之

心。这种心因为无念、无住、无相，不滞着于任一时空之点，故众生一旦证见此心，同时便舍生向佛，走向解脱。慧能凡谈及此心，无不与成佛相联系：“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性），即悟大意。”<sup>⑫</sup>“识白（自）本心，是（自）见本性”。<sup>⑬</sup>“自心从本以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得者，为顿悟；即心是道，为顿悟；即心无所住，为顿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顿悟。”<sup>⑭</sup>在这里，“本然之心”实际上即是“解脱之心”。

慧能既然将人之一心分成“执著之心”和“本然之心”，那岂不是将一个完整的心分裂为善恶、高下相待的二心了？如此又怎能由凡转圣、离生向佛呢？我们看慧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莫定（若空）心座（坐），即落无既（记）空。（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sup>⑮</sup>“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sup>⑯</sup>“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sup>⑰</sup>很显然，上述论断表明，“本然之心”虽然广大空寂、无相可得，但它却包含一切诸法，只要此“本然之心”不起心念、不染诸法，则此心圆融无碍，诸法任运生灭；而只要此“本然之心”起心动念，则此心合体反转成“执著之心”，万法随之成为障蔽此心之相。慧能并引《大乘起信论》中“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的理论加以佐证。这样，在慧能的思想中，“本然之心”与“执著之心”并非两个截然不同的心，而是一个心的体与用两面，前者是体，后者为用。当然，慧能以“本然之心”为圆足、无碍的本体，表明他有消用（“执著之心”）归体（“本然之心”）的倾向，只做到了体用同源，尚未达到体用合一。

## 二、本然之心即是佛性

“本然之心”与佛性又是什么关系呢？慧能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确立起他的佛性理论。

在“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慧能常常将众生之“自性”、“本性”等同于佛性，他反复宣称：“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sup>⑱</sup>“识自本心，见自本性。”<sup>⑲</sup>但

这“自性”、“本性”是否就是前述“本然之心”呢？

慧能说：“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sup>⑳</sup>对此，牟宗三先生认为，慧能的“自性”是主宰“自心”的空寂之性，自心之起般若智还是生灭法，完全取决于自性的迷悟。<sup>㉑</sup>此解无疑揭示了慧能佛性思想与《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关系，但这仅仅是慧能思想的一个不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消用归体”的方面。从上引慧能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自心”与“自性”的另一层关系，即自心对自性的依存关系，<sup>㉒</sup>“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正表明“自心”不能离开“自性”而独立存在。这一内涵才是慧能佛性思想的主导方面，他正是从“自心”对自性的依存关系走向它们的同一的。<sup>㉓</sup>慧能在下面这段心性连举的论述中明确阐述了“自心”与“自性”的同一性：“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具一切具，万境自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者，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sup>㉔</sup>这里，慧能要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如如之心即是真实”，也就是“自性”。而所谓“如如之心”即如其自然地存在和展现的心，实际上就是“无住”、“无碍”的“本然之心”。总之，“本然之心”即是“自性”、“本性”或“佛性”。在《坛经》中，明确表达这一思想的论断还有不少，如：“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既得解脱，即是般若三昧。”<sup>㉕</sup>“即自心无所攀援，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sup>㉖</sup>“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sup>㉗</sup>这些都旨在标明，“自心”、“本心”即是“自性”、“佛性”，识“自心”、“本心”即是解脱，也即是成佛。

那么，这种作为“佛性”的“本然之心”究竟有些什么规定呢？对此，慧能在论禅宗的宗、体、本时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已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

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 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 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sup>②⑧</sup>这里,“无相”、“无念”、“无住”不仅是慧能的修行方法,而且是他对“本然之心”的规定。慧能所讲的“本然之心”或佛性,实际上就是他所说的清净空寂、离言绝相、非常非断、非善非恶的不二之性:“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佛性非常善非不善,是名不二。……不二之性,即是佛性。”<sup>②⑨</sup>“一切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佛性。”<sup>③①</sup>这就是慧能潜心设置的解脱主体。

慧能的佛性思想可以逻辑地导出下面三个结论:

第一,慧能的佛性思想诚然深受《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影响,但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两者的重大区别。《起信论》主张,“众生心”具有两种门,“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sup>③②</sup>“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总相法门体,所谓心性不生不灭”,<sup>③③</sup>它具有无染、无念、无言、无动的“如真空”性和“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的“如实不空”性两种特性。这个“心真如”实际上就是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最高本体,也是众生成佛的体性;“心生灭者,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合和,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sup>③④</sup>“心生灭”依蕴含佛如来的一切智慧功德和一切成佛因素的“如来藏”而有(如何产生,《起信论》并未回答),是动静、染净的合一,又称为“阿黎耶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具有觉和不觉二性,觉即悟,不觉即迷,前者为众生自心本有(故又叫“本觉”),后者由无始无明熏习而成,众生由觉到不觉就流转世间、轮回苦海,由不觉到觉则还归寂静、得道成佛。而无论众生觉与不觉,“心真如”都是自性清净、空而不空、恒常

不变的本体,“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恒常不变”。<sup>③⑤</sup>这种佛性理论是典型的“如来藏缘起”或“真如缘起”说。慧能所说的“心”虽然也包含“本然之心”和“执著之心”两义,但他反对有离开“执著之心”而独立存在、恒常不变的“本然之心”,在他这里,“本然之心”与“执著之心”是众生一心的两面。若一念住著(迷)则举“本然之心”体为“执著之心”用,若一念无住著(悟)则举“执著之心”用为“本然之心”体,两两各各举体呈现。<sup>③⑥</sup>

慧能与华严宗和禅宗北宗在佛性论上的差别也与此类似。无论是华严宗的“本源真心”还是禅宗北宗的“明镜台”,都是离开染心独立自在、永恒不变的“真如心”,与慧能将“本然之心”和“执著之心”合于一体具有质的区别。

其实,就佛性论而言,天台宗的“性具染净”说对慧能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天台宗的佛性虽然依旧是一种真如法性,但是,其“性具染净”的思想则开始打破了众生心与真如心的对待。执认染净、善恶诸法皆为众生一心所具,与慧能“心含万法”的思想相一致,慧能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走向对染净、迷悟的超超而追求无善无恶、无染无净、无滞无碍的“本然之心”的。

第二,有的学者认为,在慧能,“当下的一念之心,同时也就是众生的解脱之心”。<sup>③⑦</sup>如果理解不错的话,所谓“当下的一念之心”应指众生随时随地的任何一个心念。既然是众生随时随地的任何一个心念,那么此心念既可以是无善恶、美丑、真假分别的心念,也可以是有善恶、美丑、真假分别的心念。这样,以当下一念之心为众生解脱之心实际上就是执认任一存有现象为本体、佛性。显然,慧能并没有达到这一高度,他只认前者为自性、佛性,即只认“本然之心”为自性、佛性,至于后者,他是要超越和舍弃的。只有慧能之后的洪州宗才达到了这个水平,这在下面会专门讨论。

第三,慧能的佛性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可以说都是,也可以说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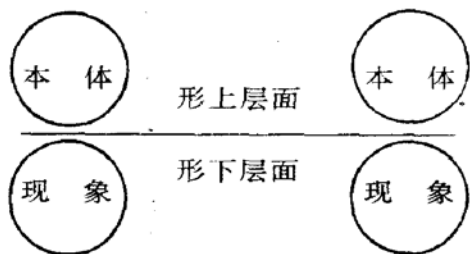
是。就“本然之心”先于主客对待而存在来说,它既不能归属于我们平常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也不能归属于我们平常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只能勉强称之为“先验状态的这一个”。这种通过拒斥主客对待而把握到的本体,只有胡塞尔的“先验的自我”才能表证。<sup>⑳</sup>就“本然之心”所具有的性质来说,它既可归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也可以归属客观唯心主义,因为它一方面能够“生万法”、“含万法”,另一方面又是众生先天具有的。其实,就本质而言,此“本然之心”不能以分别智去认识,而只能凭直觉去洞观。

### 三、慧能佛性思想的演变

慧能之后,其佛性思想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一是荷泽(神会)、净众、保唐系的道路,他们在慧能“本然之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消用归体”,逐渐将佛性变成了“任迷任悟,心本自知,不籍缘生,不因境起”的“空寂之心”、“灵知不昧之知”,<sup>㉑</sup>在他们这里,慧能的即万物而超万物的“本然之心”又逐渐转变成与万物相隔离、相对待且“天地不能变其常、幽明不能易其理”<sup>㉒</sup>的“真空”,实即成了“本源真心”或“真如”。牟宗三先生说:“神会之顿悟禅,如来禅,即同《起信论》华严宗之唯真心。”<sup>㉓</sup>这确为不易之论。

就本体论的哲学性质而言,虽然慧能与他们的佛性论均属本质论(即认为万有具有一个共同本体的理论),但其间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却是不同的,这种差别可以图示如下:



(慧能)      (荷泽、净众、保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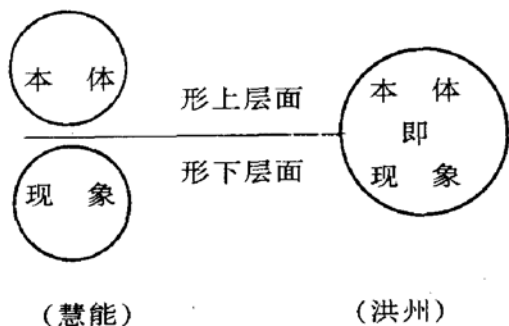
上图中的横线表示本体与现象分界。这表明,在慧能,本体与现象是一体的;而在荷泽、净众和保唐,本体与现象却分隔开了。

慧能佛性论的第二条道路,以怀让发其端的洪州宗为代表。他们根据慧能的佛性思想,进一步突破本体对现象的限定,直指任一存有现象为本体,将佛性发展为“不道之道”。只有这一系的佛性思想才真正达到了以“留下一念之心”为佛性的高度。按宗密(公元780—841年),他们这一系的佛性思想是这样的:“即今能言语动作,贪嗔慈忍,造善恶苦乐等,即汝佛性;即此本来是佛,除此无别佛也。”<sup>㉔</sup>“洪州意者,起心动念,弹指动目,所作所为,皆是佛性全体之用,更无别用。全体贪嗔痴,造善造恶,受乐受苦,此皆是佛性。”<sup>㉕</sup>宗密的上述论述完全符合洪州宗的思想。我们试看下列论断:“有行者问:‘即心是佛,那个是佛?’师云:‘汝疑那个不是佛?指出看。’”<sup>㉖</sup>“万类之中,个个是佛。”<sup>㉗</sup>“有一行者,随法师入殿。行者向佛而唾。师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将无佛处来与某甲唾。’师无对。”<sup>㉘</sup>这些无不是说,众生的一举一动都是佛性的体现,佛性就在于用,没有什么“执著之心”与“本然之心”的分别。同时,既然任一存有现象即是本体、佛性,那么这佛性就是“不道之道”,“道个如早变了也”。<sup>㉙</sup>洪州宗后来之所以衍生出“扬眉瞬目”、“呵佛骂祖”甚至“焚经毁佛”等极端的行为举止,其理论根据就在于此。

不言而喻,洪州宗这种理论受到了天台宗荆溪湛然(公元711—782年)在《金刚铉》中阐述的“无情有性”学说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说这主要来自于这种影响。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洪州宗的佛性思想主要是慧能思想逻辑演变的产物:既然一切诸法都由“本然之心”所生,而“本然之心”又是圆满具足、绝对无待的佛性,那么由它派生的诸法就都应是圆满具足、绝对无待的,从而也就不应有染净、善恶之分。这样,直接指认诸法为本体或佛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事实上,慧能得法弟子慧忠(公于775年圆寂)已经从“即心是佛”走向了“无情有性”、“一切无情皆是佛心”的结论。<sup>㉚</sup>

慧能虽然已将“执著之心”和“本然之心”收归众生之一心,但这心既然有“执著”

与“本然”的分别,实际上依然显出二分的倾向,这心依然是一种具有有限性、对待性的存在。正是如此,慧能才在修行观上汲汲于“识心见性”、“顿悟成佛”之说。<sup>⑳</sup>而以洪州宗为代表的后期禅宗则不同,他们不承认有“本然之心”与“执著之心”的分别,认为“当下一念之心”即是“本然之心”,任何分别都是对这个绝对本体的限制、破坏。这样,他们真正将“心”上升为无限、无待、绝对、圆足的本体,使中国禅宗的本体论(佛性论)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在本体论上,如果说慧能倡“本质即存在”,那么以洪州宗为代表的后期禅宗则进一步倡“存在即本质”,前者依然属于“本质论”,而后者则越出“本质论”而进入了“存有论”(执认现象即本体的哲学理论)。慧能与洪州宗在佛性论上的这种关系,仿佛王弼与郭象在玄学的有无、体用、本末问题上的关系,亦类似王阳明与其后学在心学关于“良知”体用问题上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可以图示如下:



上图表明,从慧能到洪州宗,本体与现象已完全重合为一了。

慧能的佛性思想,无论在中国佛教史上还是在世界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他把此前仍具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色彩的佛性完全变成了内在于众生的活泼的、具体的人心,将众生由对外在的、抽象的、彼岸的佛的信仰拉回到对内在于的、具体的、此岸的自身心性的体悟,从而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任务;另一方面,他以“本然之心”为佛性的思想又为以洪州宗为代表的后期禅宗的佛教“存有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禅宗继续在中国和世界蓬勃发展开辟了道路。

①方立天:《佛教哲学》第22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3册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③洪修平先生将慧能思想中的“心”区别为缘虑心与解脱心,对作者有很大启发。参见《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218—23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郭朋:《坛经对勘》第27、41、49、41、50、73、44、26、16、35、38、56、68、151、81、13、81、13、70、96、39;齐鲁书社1981年版。

⑳牟宗三:《佛性与般若》第1051页;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修订五版。

㉑㉒参见方立天:《性净自悟——慧能〈坛经〉的心性论》;《哲学研究》1994年第5期。

㉓㉔㉕《大乘起信论》杜继文译注本;巴蜀书社1992年版。

㉖参阅洪修平前引书第228页。

㉗洪修平前引书第221页。

㉘胡塞尔的“先验的自我”是通过拒斥“经验的自我”而获得的“纯粹的自我”,这种自我超越了主客体的对待,万物在它面前都如如地呈现出来。胡塞尔这种思想与中国禅宗(还有其它宗)之间的一致性,是值得好好研究的课题。

㉙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㉚神会:《大乘顿教颂》叙。

㉛牟宗三前引书第1049页。

㉜宗密:《禅源诸论集都序》卷二。

㉝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

㉞慧海:《大珠慧海禅师语录》卷下。

㉟希运:《黄蘗断际禅师宛陵录》。

㊱㊲普济:《五灯会元》卷六。

㊳参见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209—2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㊴关于禅宗修行观,请阅拙文《“有修之修”与“无修之修”》,载江苏古籍出版社《禅学研究》第2辑。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 描述伦理学及其理论价值

## 一

描述伦理学是伦理学与其它相关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伦理学理论类型。因其对道德现象进行经验性的描述和客观再现而得名，故又叫记述伦理学。与传统规范伦理学不同，描述伦理学既不研究行为的善恶及其标准，也不制定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是依据其特有的学科研究方法对道德现象作纯客观的经验描述和分析。换言之，描述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而是社会的道德事实及其规律；其任务不在于提供社会道德价值目标及其标准和行为规范，而在于展现社会道德实际和揭示社会道德发展的科学规律。

描述伦理学的出现有其理论必然和社会现实基础。一方面，从伦理学理论本身来说，一般而言，伦理学是一门以道德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客体的科学。但从伦理学在公元前4世纪被亚里士多德赋予独立学科资格始，不同的思想家在具体把握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各有侧重。由此不仅在微观上形成了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和学说，而且在宏观上产生了不同伦理学理论类型：立足于价值—规范的方法，侧重于道德规范的论证、制订和实施来研究道德，这是规范伦理学，即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的伦理学理论类型；凭借逻辑语言分析的方法，从分析道德语言（概念、判断）的意义和逻辑功能入手来研究道德，反映道德的语言特点和逻辑特征，此为元伦理学，是本世纪初产生并在西方理论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达半个多世纪且至今影响犹存的一种伦理学理论类型；而依据经验描述的方法，仅仅从社会的实际状况来再现道德及其科学规律的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描述伦理学。这三种伦理学，它们分别反映

了对伦理学研究客体——道德现象的三种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另一方面，真、善、美作为人类永恒的追求，无不贯穿于适应人类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各门科学之中。作为人类社会最普遍、最广泛的社会现象，不可避免地进入各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视野，尽管这些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对道德的研究，在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均与注重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对道德现象进行价值—规范研究的传统规范伦理学有很大的区别。随着时代的推进，各门科学在其自身飞速向前发展的同时，又呈现出与其它科学相互借鉴、互相交叉的趋势，这就为描述伦理学的出现提供了科学基础和现实可能。作为伦理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联袂的产物的描述伦理学，正是在交叉学科、边缘科学层出不穷的当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重视。

无视描述伦理学的存在，拒之于伦理学之外，不能站在伦理学理论类型的角度来认识其理论地位和价值，既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事实，也不能充分体现伦理学集理论科学、价值科学、规范科学与实践科学于一身的特点。

## 二

描述伦理学具有十分繁多的种类，如道德社会学、道德心理学、道德人类学、道德民俗学等等。它们分别从道德与社会、道德与社会心理、道德与社会文化和风俗风尚、生活方式等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道德状况及其规律。

道德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的道德现象的科学。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1. 研究制约和影响道德的产生及功能运行的社会有关因素，即道德的社会制约性；2. 研究道德与其它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成份如政

治、法律等相互影响的社会学规律,研究道德本身对社会的能动作用或反馈作用,即道德的现实作用;3.研究个人、社会群体表现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道德面貌和特征,其中包括他(们)对待一定价值和利益乃至对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本身的态度。需要说明的是,非常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落后或反动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以及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等等,也属于道德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从方法上看,道德社会学运用社会调查、作品分析、走访、座谈等各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社会与道德之间的双向作用过程的考察,研究和测定社会的道德实际状况和发展趋向,在对所获得的具体的资料、数据等社会信息的社会学分析中揭示出道德形成、发展和运行的社会学规律,展示社会的道德风貌,探明社会道德完善的途径。

道德心理学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科学。其根本任务在于通过研究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社会道德心理发生和运行的过程及一般规律,揭示人的道德品质和习惯、社会舆论和传统文化等形成、发展的心理学规律。其研究内容包括:1.道德意识的心理形式:对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也包括对道德理想、道德思维方式等)进行心理学的分析;2.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具体分析道德行为产生、展开的心理过程,即对欲望—动机—意志—行为—结果这一行为过程进行心理学的剖析;3.个体道德心理的发展规律:揭示具有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社会成员个体道德心理的状况、大致发展趋势和特征;4.社会道德心理的运行规律:研究社会习俗、传统风尚、社会舆论、社会文化制度对个体道德心理的制约和影响,个体道德心理与社会道德心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特点。需要指出的是,道德心理学也包括对不正常、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即病态心理的分析和研究。

此外,道德人类学侧重于从人类的生活方式、风尚习俗、文物、宗教、文化等方面来探讨人类道德发展的人类学规律;道德民俗学则立足于各种族的文化、风土人情、生活方式等角度来研究道德的形成及其演变规律。它们和道德社会学、道德心理学等描述伦理学类型一样,充分反映了道德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契合性以及人类道德生活本身的多姿多彩。

### 三

描述伦理学类属经验实证性科学。从其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视角与方法来看,无论是道德社会学、道德心理学,还是道德人类学、道德民俗学,都是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采取经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通过获取大量的事实材料、科学数据和客观信息来再现道德的社会本性、心理学规律、人类学特点和民族特征等等,具有十分鲜明的经验实证性。

描述伦理学的这种学科性质可以从它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中得到印证:

第一,以经验描述和分析法研究道德。描述伦理学运用一些和伦理学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来研究和分析社会的道德现象。无论是基于社会学、心理学还是人类学、民俗学等的立场对社会道德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和分析。如道德社会学运用的就是实证科学的经验方法,包括社会调查法(含问卷调查、走访、座谈及研究日记、回忆录、信件等个人性的文献)、统计学的方法、社会志、民族志及文学艺术的方法。再如道德心理学采取的是观察实验、个案分析等科学的方法。描述伦理学正是通过运用一些经验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对道德进行客观的观察和调查,并进行因果分析、功能分析和历史比较,在对道德现象进行客观描述、归纳和分类的基础上揭示出其社会学的、心理学的、人类学的及民俗学的多方面的规律性。

第二,具有边缘性和综合性。描述伦理学无疑属于边缘科学或叫综合科学、交叉科学。描述伦理学就是广泛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相关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道德现象的一门边缘科学,因而既具有相关学科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又带有伦理学的意味和色彩,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更何况有些相关学科本身就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特征。社会心理学便是突出例子。正因为如此,描述伦理学具有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研究具体的优点,但同时又带有研究不够深入、深刻、典型及可能抓不住本质的缺点。

第三,理论直接来自于实际。如前所述,描述伦理学作为对社会道德现象的一种经验描述和分析,它是对道德的社会本质、心理本性、民族

特征、人类历史特征的一种再现和记录。换言之，这种理论来自于对客观实际和科学规律的直接反映和经验总结。这就使得描述伦理学一方面具有较高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另一方面又带有重描述、轻论证，缺乏哲学——世界观高度的分析和概括，过分注重于对现实的说明，不进行像规范伦理学那样的价值分析和规范研究，因而受制于现实、局限于现实、缺乏对现实的规范指导意义和深刻的理论性的缺陷。

#### 四

由于传统伦理学指的是注重道德价值分析和规范研究的规范伦理学，因而承认描述伦理学的存在并将它纳入整个伦理学的构成体系中，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最早在国外也才是20—30年前的事情，在国内学术界尚缺乏明确的认识。笔者认为，给予描述伦理学应有的理论地位既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和事实，也有益于伦理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具体来说，描述伦理学可起到如下主要作用：

第一，为伦理学研究提供经验与科学材料。传统规范伦理学，强调的是道德上的“应当”，注重的是对道德的价值—规范研究。描述伦理学强调的则是道德上的“是”，注重的则是对道德的经验实证研究。要确定一个社会、一个人在道德上应当如何，必须首先了解这个社会、这个人实际上是怎样的。换言之，对道德的经验实证分析是对道德的价值—规范分析的先决条件和基础。描述伦理学运用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方法和观点所获取的大量的客观资料和规律性的东西，经过规范伦理学的分类、筛选，并上升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进行理论抽象和逻辑分析，便成为规范伦理学的科学依据。

第二，对规范伦理学加以印证和检验。规范伦理学来自于对社会道德要求的科学认识和理论加工，它本身还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丰富和完善自身。描述伦理学作为对道德实际和道德规律的直接反映和经验总结，犹如社会道德实际的晴雨表：道德规范体系是否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客观现实和理论要求、理想目标是否一致以及一致到什么

程度，客观实际和理论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以及原因何在，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等等，均可以通过描述伦理学的研究得到经验性的证明，从而帮助伦理学进行理论本身的补充、完善和修正。

第三，在伦理学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上提供指导。伦理学的研究来自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社会生活常常是变动不居的。描述伦理学可以及时地反映和总结社会道德的实际走向和未来发展趋势，因而在对原有的伦理道德理论进行印证和检验的同时，还可以提出一些社会实际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新问题，从而为伦理学的问题研究、规范的更新和构建、理论的自我反思和超越提供新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更要求伦理学密切关注人们道德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新问题，及时总结社会成员在道德观念、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方面的新变化、新需求。

第四，增强规范伦理学的社会功能。通过描述伦理学这一敏感的中介，规范伦理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有描述伦理学的基础性保障，规范伦理学的理论建构、完善和发展也就有了更坚实的客观基础和科学依据，从而更加切合实际。规范伦理学与描述伦理学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不仅能使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准，还可能使伦理学更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提高其干预生活的能力。实践表明，社会道德问题大多具有综合性，属于许多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领域的问题。对社会道德问题的起因及其解决措施等问题的研究往往需要各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通力合作。在这方面，描述伦理学不仅可以为规范伦理学的研究提供客观的材料和科学的数据，而且还可以发挥其相关学科的特长，为规范伦理学解决社会道德问题提供理论指导。借助于描述伦理学所揭示的科学规律，规范伦理学才能真正面向现实，有的放矢，使道德实践收到理想的效果。

作者单位：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冯生



# 试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守成派

□方光华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强调近代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派。与这种文化观相对应，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传统色彩较为浓厚的史学派别，即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为代表的新史学体系。他们既受西方学术思想的激荡，又有浓厚的传统学术功底，既认识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又不失对传统学术精神和方法的信念，成为新史学哲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

## 一、守成派的历史哲学观点

所谓历史哲学，主要是对于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考，它是史家认识历史的结果和史学创作的前提。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革命思潮，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章太炎共同提出的新史学特征是：以国民为价值中心，体现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则。为建立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作了激烈的批评，并大力宣传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提倡创作民史。

新史学的历史哲学是否完全与传统史学无关？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在章太炎初步反思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新史学应正面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中的道德精神，把传统学术中对理性和道德的信念当为新史学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对中国传统学术别著慧眼，他认为如果就形式逻辑而言，中国旧史学的前提和基础——儒家哲学，“其于思索未必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静安文集续编·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之后》）但儒家哲学却道出了消解人生困境的真理。在历数佛家的涅槃论、叔本华的自杀论以及儒家的道德化等等解脱方法后认为只有儒家的道德信念庶几有助于人生困惑的消解。故王国维对史学中道德理想十分重视。他的《殷周制度论》考察殷商与西周之际的社会变更，结论是：“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实际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所确立的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及其精神，是新文化的基本前提，新史学必须贯注对道德的信念。

陈寅恪对传统学术的道德精神有强烈的信念。他认为，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时期，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通过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他运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影响的例子说明，中国当时输入欧美思想，应该像宋代儒学一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史

学亦然，一方面有必要吸取西方学术体系的长处，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的道德精神。

陈垣对传统史学的人伦道德有深切的体验。他的《通鉴胡注表微》，表面上是对宋末元初胡三省、司马光《资治通鉴》注释的研究，实则通过对胡三省史学思想的阐发，表明他自己的史识。在其中，他分析了胡三省对当时民族文化问题的焦虑以及对人伦道德的信念，表彰胡三省史学的民族气节，畅述自己对传统史学所树立的人生观的信念。如他说，传统史学褒贬人物的是非标准，“能致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槟”。（《臣节篇》）这种受儒学熏陶的生死观，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所在。

汤用彤的史学思想与上述三人基本相近。他的《理学谥言》一文认为，评判一种文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看它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铸造方式和结果。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东西文化，人们就不会“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就会发现表面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性命道德之学，仍然有其现实价值。1918—1922年，他留学美国，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和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宗教，哲学，各有真理，各有特质，不能强为撮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载1922年12月《学衡》第12期）每一种文化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只能求同存异，而不能生搬硬套。汤用彤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间佛教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指出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本上文化相互化合，才能生长繁衍。汤用彤的这种文化观点应用于史学，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诸人不同，柳诒征对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作了正面论述，对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学的前提就是儒家经学，特别是《春秋》大义。“近人讲史学，不知推本《春秋》，漫曰《春秋》是经非史，而中国史学之根本不明”。（《国史要

义·史义》）他认为，如果我们把视野伸展到传统史学的经学背景，就会发现传统史学有许多地方是十分深刻的。如正统观念，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为某一王朝争正统的现象，但也不能忽视正统观念中正义、爱国、保卫领土完整的含义。“前史之断断于一家之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纲”。（同上）故柳诒征认为，虽然中国旧无历史哲学之称，“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子。……故吾人治中国之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例”。（《国史要义·史识》）

值得指出来的是，虽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都强调新史学对传统史学道德理性的继承，但他们并非一味守旧，他们也认识到必须结合时代需要，吸取西方学术精神，使传统道德理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王国维认为：传统儒家高扬道德信念，这是合理的，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对非道德现象缺乏像西方那样严格的法制制约。而“义之于社会也，犹如规矩之于方圆，绳墨之于曲直也。”（《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同上）因此他主张应该在道德信念前提下加强社会立法。这种认识引伸到史学领域，王国维也必然在宣扬史学的道德精神之外，宣扬史学的近代民主精神。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之后，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他认识到道德理想虽然有“超越时间地域”的一面，但也不能不有地域的变化。所以陈寅恪研究历史，特别是隋唐文化史，既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继承发展，也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转化和移植。也就是说，认识一种文化现象，既要看到它的精神实质，也要看到它的新的表现方

式。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必然如此。陈垣也并不一味固守传统史学精神而无视外来文化的吸收。在《通鉴胡注表微·释老篇》中说：“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不可顾虑及此。……故吾人当法孔子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他认为只有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吸收，才能真正认识到其他学术的长处。汤用彤曾经总结出文化移植的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撞；又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载1943年1月《学术季刊》一卷二期文哲号）所以文化冲突调和的结果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都有所改变而又不至于彻底改变，它们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汤用彤的文化移植思想对于新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结合，无疑也指明了发展方向。柳诒征也认为新史学一方面应吸取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的长处，如西方史学对于历史发展线索的认识，“可以益人神智”，虽然它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原貌，但新史学也有必要吸取其精髓，总结出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帝王中心论以及缺乏对历史规则的归纳等弊病，但它也有重视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长处。儒家经学是传统史学的基础。在新史学思潮出现不久，就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问题。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对旧史学体系进行批评，宣传新史学的进化原理时，章太炎于1904年开始反省进化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不能给人们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鉴，由此引起对新史学哲理的怀疑。后来，梁启超、章太

炎都重新评价中国学术传统，提出传统学术精神是新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从不同侧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它表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传统史学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是新史学的出发点。

## 二、守成派的史学方法观点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新史学必须因果分明、对历史发展的规则有所归纳。“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学》）新史家们反观传统史学，认为它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虽然记叙了纷繁的历史事实，从中却很难找到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则。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改变旧史学的“逐末之陋”。如何吸取西方学术方法，如何使西方学术方法与传统学术方法相结合，史家仍各自表述了不同的认识。

王国维对中西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他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静安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国学术无论理论思辩和具体分析，较之于西方学术，确有其不足之处。所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学术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但运用、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并不是把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排斥不取。他认为传统学术研究重视历史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情性因素，视野相当开阔。特别是乾嘉学术方法，朴实有征，是传统史学方法的瑰宝。此外，王国维还指出：“余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学术研究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王

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在乾嘉史学方法基础上，把考古资料与文献相印证，使古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寅恪认为以往文化史研究有两大缺陷：“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半出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以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新派失之诬。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有解释，看上去很有条理，然甚危险，有适用有不适用处。”（《陈寅恪先生传》，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所谓“滞”，就是没有明确的条理，这是传统史学的最大不足。但有些新史家用“条理”去凌驾历史事实，也不是正确的学术方法，它只会造成史学研究的“无中生有”。他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研究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其次也需要研究者在同情之态度外，深具考据学之功底，否则也容易陷入附会。

陈垣也认为，学术研究既要有严密的考证意识，也要有抽象思辩。但无论考证和思辩，陈垣都非常强调其民族学术传统。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书法、义例、避讳等，就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史法。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则性的把握。陈垣先后作《史讳举例》（1928年）、《校勘学释例》（1931年），对上述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使人们对传统史学方法获得一些理性认识，并为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指明了具体途径。陈垣的目标，就是要在传统学术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新史学方法。

汤用彤很少正面论述史学方法，但他的史学实践表明，他既坚持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又吸取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他注意用近代西方哲学的某些范畴来分析传统学术思想，如他的魏晋玄学研究，通过运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使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诸范畴得到了清晰的辨析。他强调学术研究的多种素养，说“越是研究中

国哲学，越要多了解欧洲哲学。”（任继愈《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载《燕园论学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强调学术的基本功。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就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典范。

柳诒征对传统史学的方法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传统正史的叙事体例，既分析历史事件时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又能用极简练的笔墨描写出极丰富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国史要义·史联》提出，无论是新史学的著作方法抑或是具体研究方法，都应该与传统史学方法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

所谓史学方法，既包括对历史的认识方法，也包括对历史认识结果的表述方法。前者属于历史认识论范围，后者属于历史编纂学范围。自新史学思潮批评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之规则的归纳以后，如何揭示历史发展的线索，如何找出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乃至如何把历史认识更精练地表现出来，都成了当时史家所必待思考的问题。梁启超主张用西方学理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而章太炎则认为不能把西方的学理当作普遍性的规律，而应该注意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但他由此导致对历史规律的否定，认为史学不需要“名理”，不要讲“历史哲学”，只需实证研究就够了。梁启超晚年也对历史进化论表示怀疑，并强调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一方面坚信新史学“求通”的理想，承认新史学必须克服传统史学的叙事笼统局面，显示历史事实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他们又摒弃对历史线索的肤浅理解，认为应该在实事求是的考证基础上，还历史的真面目，然后求得每一类历史事实的具体规则。他们既坚持了新史学的基本特点，又调整了新史学的方法体系，并沟通了它与传统史学方法体系的联系，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

### 三、守成派的史学成果体系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带来了当时

历史研究的繁荣局面。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的史学研究在近代新史学成果体系中颇具特色。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在后来引起较大影响的是他的古史研究。他通过甲骨卜辞与地方文献的互证，来分析周公之德和西周之所以统一天下的原因，进而整理出上古制度的演变线索，对于认识上古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后来郭沫若利用王国维的成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观点，侯外庐又在郭沫若的基础上，指出西周奴隶社会的特殊性质。可以说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为新史学总结上古社会的演变规则奠定了基础。

陈寅恪历史研究的重点在隋唐史。他认为要认识中国历史的演变法则，隋唐史无疑具有其独到的地位。围绕隋唐文化史这一课题，陈寅恪先后发表了三部重要著作，对唐代的各种制度、政治史、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的变化作了具体慎密的分析，并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在新史学体系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他为复杂纷繁的隋唐文化提供了一套具体的研究方法，他指明，要研究隋唐文化，就必须研究种族和社会集团，就必须研究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属性与党派分野，就必须研究他们对于文物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不同态度，也就是说必须研究社会关系中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后来，他的学生汪篪把陈寅恪的上述研究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联系，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陈寅恪的史学成果。这些都成为韩国磐、侯外庐等人研究隋唐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直到今天，研究隋唐文化的学者仍然得益于陈寅恪的成果。

陈垣的历史研究以宗教史和元史为主。他研究宗教史，一般不讨论宗教的教旨，而只是详细地研究各种宗教教会、僧侣、信徒的存在实况以及宗教典籍的境况。其元史研究也是利用繁富多样的资料，揭示元代社会生活的原貌。

汤用彤长于欧洲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尤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影响

深远。他的经典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通过对佛教的中国化的具体过程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佛教文化在汉魏隋唐乃至宋元时期的盛衰消长的线索；总结了佛学之所以能成为隋唐思想界的主流以及在隋唐繁多佛教宗派中只有禅宗得以流传开来的原因。这为新史学研究中国佛教文化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以及研究中国中古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都提出了基本途径和基本观点，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尊重。

柳诒征的历史研究面也相当广泛，但他对今人最具影响的则是他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他的《国史要义》有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等篇，对传统史学的起源、史官制度、史学的基本价值标准、史学的表叙方式、史家的品德和见识、史学的体例方法、史学的借鉴功能作了分析。他为人们进一步了解传统史学的体例和精神提供了帮助。

在20世纪的新史学思潮中，史家们为实现以国民为价值中心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线索的新史学目标作出了积极努力。首先是一大批史家希望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历史各发展阶段乃至每一类历史内容的前后渊源。如刘师培、章太炎等。但他们都未能从中国历史材料的内在线索去发掘符合中国历史的规则。因此，当章太炎等人在史学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西方进化原理乃至其他学理不可能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具体面目时，如何解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史学，就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目标。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的历史研究体现了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根据一切可能找到的历史材料，发现解开每一研究领域的钥匙，求得他们独立自得的、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原貌的认识。不难想象，新史学如果缺少这一环节，就不可能对中国历史作整体把握，也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史学的具体特点。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郭林**

# “路博将军”及其同

## 孙中山、陈炯明的会见

□邱

捷

孙中山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前，曾和一些苏俄、共产国际的人士有过接触与联系，若干中文史料提到，在这些人士当中，有一位“路博将军”。

陈其尤在 50 年代发表的《我所亲知的中山先生政治生活中的两三件事》一文中谈到：“1919 年冬，中山先生寓居上海，……当时列宁曾派一海军中将来中国致意（姓名一时忘记但从旧文件中查得），……这是苏联革命成功后，第一次派来我国的人。这时陈炯明还没有背叛革命，驻军漳州，先生即电知陈指示机宜，嘱他妥为招待这位外宾并商谈革命工作、如何联系帮助等问题。……我与廖仲恺先生、朱执信先生等奉命负责接待这位苏联友人，……这位苏联友人持有列宁的信，除交给我们这封信外，向我们转达了苏联愿意帮助中国革命的好意。”①大约刊行于 50 年代的《陈竞存先生年谱》民国 9 年 4 月 29 日条记：“苏联政府密派路博将军到漳州访问先生（按：指陈炯明），愿设法资助先生完成革命大事业，先生以革命应赖自力，乃婉谢之。先生并有书致列宁。”②陈其尤在 60 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也称这位苏俄代表名“路博将军”，回忆录说，他到漳州会见陈炯明时，陈其尤本人负责接待。张友仁在 60 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也提到“列宁的专使路博将军”到漳州会见陈炯明的事。③当时有三种有价值的文献：“一、苏联代表路博带来的列宁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亲笔信；二、朱执信起草的陈炯明致列宁的复函存稿；三、陈炯明为磋商接待苏联代表路博和在上海的孙中山的来往函电存稿。”但这些文件

后来全部散失。路博将军带来列宁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表示敬佩和鼓励，由路博转述请陈多做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并说如果我们需要，可以将储存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陈炯明给列宁的复函是由朱执信起稿的，大意是对他派代表前来表示感谢，并介绍中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对于提供军械问题，则答以现时漳州无港口可接收，拟待回广州再行计议。”④

一些关于孙中山、陈炯明的著作或传记，大概根据上面的史料记载“路博将军”和孙、陈会见之事。有人甚至完全按陈其尤的说法把“路博将军”称为“苏俄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⑤

有关这位“路博将军”的中文史料都是事后多年才产生的。至今还没有发现产生于当时的有关中文档案文献。在外文史料中，则至今没有出现“路博将军”这个名字。那么，“路博将军”是否实有其人，他与孙、陈的会见又是否实有其事呢？

多年后的回忆肯定不可能很准确。如苏联 1922 年底才成立，陈其尤把“路博将军”称为“苏联代表”是不确切的。又如苏俄红军在 1919 及 1920 年都没有军衔，自不会有什么“海军中将”。但是，几种中文史料不像是互相引用派生的，而且，陈其尤、张友仁都是亲历亲闻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编造的必要。因此，可以认为，有关“路博将军”的中文史料是有一定依据的，只是某些细节难免失实。

60 年代以来，一些苏联学者利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在自己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中，提到有一位会见过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波塔波夫将军。<sup>⑥</sup>80年代以后，一些专门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国学者认为，“路博将军”就是波塔波夫。<sup>⑦</sup>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对其中一些细节难于做出详细的考证。1994年，俄、德两国的学者整理出版了一批关于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的档案资料，使我们对波塔波夫得到比以前多一些的了解。

波塔波夫原来是沙俄军队的将军，在十月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来到中国。但在不久以后，他转向了苏维埃政权。1920年夏天，波塔波夫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当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12月12日，他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写了一个报告，题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孙逸仙博士》，报告说：

“我在上海同孙逸仙博士有过密切的接触。他是旗帜鲜明的反英分子、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近日已垮台）的敌人。

他在中国各地，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家中有自己的朋友。与他保持密切关系的有：陈炯明将军，福建的军政首长，中国南方所有反对北京政府的军队的总司令……

他告诉我，他在5月底收到您的信。因我即将返俄，他请我向列宁代为致意。他没有托我带致苏联政府的书面宣言，因为担心暴露了他和莫斯科的联络便会给他在租界的居留造成麻烦，以及影响他在中国的工作。他的担心被我在途中遭协约国代理人的搜查所证实。我们约定了联络中英文密码。除了他的照片以外，我没有任何他的文件。在几次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对我们俄国实行共产主义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他把中国人民以往的经验作为自己的论据。但是，我成功地说服了孙逸仙向我们派遣代表。他选择了廖仲恺——广东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南方著名的将领朱大符（按：即朱执信）。上述两人和我有多次的会谈，应在8月动身取道欧洲来俄。

孙中山是中国的头号人物。他收到了我们的宪法、土地法、俄法条约等的英译文小册子……（俄文本编者注：原件此处模糊不清）

我把小册子转交给Li Rienie（俄文本编者注：原文如此，此人未能查出），他把小册子翻译成中文，与从我处得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一起刊登在自己的共产主义出版物上。”<sup>⑧</sup>

这是苏俄政府收到的最早的有关孙中山的报告之一。从这件新披露的史料看，这位将军在4、5月间会见了陈炯明之后，似乎又到上海同孙中山见面，并非如陈其尤所说会见陈炯明之后便回国。因为孙中山和他谈起5月底收到齐契林来信的事。以往学者们认为孙中山没有收到这封信，看来并非如此。他的报告也使我们了解当时孙中山在与苏俄联系时的谨慎态度和他对共产主义的某些看法。一些中文史料提到孙中山想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等到苏俄学习。<sup>⑨</sup>波塔波夫的报告提供了旁证。

波塔波夫虽然同孙中山有过多次接触，但看来他对孙中山的了解还是有限的。已故的苏联学者叶菲莫夫评论说，尽管在中国呆了几年，但“波塔波夫对于中国政治斗争的参加者来说，毕竟是个局外人，他本人（甚至不止是他）不可能很深入地理解这个斗争和从思想观点与动机方面考察斗争的参加者。”<sup>⑩</sup>他对陈炯明过头的评价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在苏俄住了一年的美国记者索科夫斯基，当时常与孙中山来往，1920年初他向美国驻沪领事克宁翰（E. S. Cunningham）报告了孙中山同波塔波夫及另一位俄国军人波波夫上校会见的事。按索科夫斯基的说法，“波塔波夫采取布尔什维克的姿态，但却没有被授权”；波波夫则是“由阿穆尔（黑龙江）地区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指挥官派来的”。索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孙中山和这两个军官都讨论了国民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合作计划。”<sup>⑪</sup>这一说法尚未有其它资料佐证，但即使真有其事，恐怕也只是般地谈谈，无论是波波夫还是波塔波夫都不可能代表苏俄的党和政府与孙中山进行关于两党合作的谈判。

关于波塔波夫和陈炯明会见的具体情况，在已发表的俄文文献中似乎找不到多少记载。我们只知道，他回到莫斯科时带有某些中国人士和团体的信件、宣言。1921年3月15日出版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刊登了陈炯明致列宁的信、李烈钧告苏俄人民书、陈炯明告在俄中国工人书等文件。前面两种在刊登时没有附上日期，而陈炯明告在俄中国工人书所署的日期为1920年5月8日，195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的编者就据此判断前面两种文件的日期为1920年5月。其实，李烈钧的告

苏俄人民书中提到：“我们怀着衷心的喜悦，利用波塔波夫将军路过香港的机会……”。<sup>⑬</sup>可见，波、李会见与波、陈的会见肯定不在同一时间。但陈炯明署名的两种文件，应该是同时交给波塔波夫的。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而且我们又接受前面提到的《陈竞存先生年谱》关于波塔波夫于1920年4月29日到达漳州的说法，那么，波塔波夫在漳州至少逗留了十多天。与陈其尤所说“路博将军”一行“在漳州住了约两个星期左右”相符。

陈炯明致列宁的信称呼列宁为“导师”，并在对苏俄革命成功表示祝贺之后还提到：“前几天波塔波夫将军来到此间和我见面。他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向我讲述了苏俄的情况和扩大自决原则的方法。这使我极为愉快。”<sup>⑭</sup>

大概是因为陈炯明署名的这封信对苏俄与共产主义的热情友好的态度，再加上波塔波夫的推介，《外交人民委员会公报》在刊登陈炯明的文件时加上一段按语，称“陈炯明是最杰出的军人之一，是一位得到人民爱戴的共产主义者”。<sup>⑮</sup>

当时，陈炯明在国内拥有很高的声望。在“五四”运动时，他对爱国学生表示支持，主张在青岛问题上持强硬的态度和惩办卖国贼。在漳州，他推行“刷新政治”的计划，创办学校，提倡新学，改良风俗，发展经济。他创办的《闽星》半月刊和《闽星日刊》用了很多篇幅介绍苏俄的情况。

1920年4月29日的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漳州有过激主义传播说》的文章，文章说，“漳州传来惊人消息，谓闽者有人传布极端过激主义之文字，其尤可惊者，则为漳州陈炯明之资助此种鼓吹。此事在本月初始传闻于外，缘月初有许多中外人士赴漳州参观各校运动会，开会之日，传单乱散，陈炯明且亲将传单送给外人。”“陈对于共产主义予以财力上于精神上之赞助”。从这篇报道来看，尽管陈炯明在国内早有名声，《闽星》宣传“过激主义”也有好几个月，但广泛引起在华外人注意是在4月初，上海的英文报纸也刊登了报道。波塔波夫很可能是注意到有关消息后，才决定到漳州考察一下。从时间看，这个报道同他访问漳州的行程也很吻合。4月25日《申报》的“南北大事记”栏引用“23日北京电”称：“此间得悉陈炯明在漳州设立一会，公然宣传

过激主义，且谓中国人民如不步俄国同胞后尘，则失其对于人类之责任。”而陈炯明致列宁的信，也有同这些报道相对应的内容。

然而，从陈的教育背景、经历以及地位来看，陈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从他一生来看，与其说他是“过激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更为符合实际些。当然，在当时他还是以一个“过激主义”支持者的面目出现的。在他身边，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如朱执信、梁冰弦等人。特别是朱执信，当时是国民党内思想最激进的人物之一。陈炯明曾在朱执信门下受业，因此，对朱颇为尊重，朱对陈也很有影响。按陈其尤的说法，致列宁的信是朱执信起草的。这封信的内容，应该是更多地反映了朱执信当时的思想。

至于陈其尤所说的“列宁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亲笔信”的问题，我认为，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都很值得怀疑。其理由如下：

第一，直到今天，苏联或俄罗斯公布的史料中，没有任何反映此事的线索。

第二，当时苏俄方面都是由齐契林、加拉罕、越飞等人出面同中国各方人士联系，并无列宁亲自写信的事例。孙中山的地位比陈炯明重要，列宁在1912—1913年曾在几篇文章中赞扬过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但列宁也没有给孙中山写过信。齐契林收到孙中山1921年8月28日的来信后，于11月6日写信问列宁是否同孙中山认识，并建议在北京设立苏俄代表机构后再与广东政府建立联系；次日，列宁写了一张便条答复说：“不认识，彼此从来没有片纸只字的通信。我的意见是必须尽量客气些，经常写信联系，设法秘密地把我们的人派到广东。”<sup>⑯</sup>于此看来，在这之前，列宁并没有直接过问同国民党方面通信联络之事。从1919—1920年苏俄国内的形势、列宁的健康状况以及苏俄当时与中国人士打交道的惯例来看，列宁亲笔写信给陈炯明的可能性几乎也是不存在的。

第三，当时苏俄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非常困难。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1918年8月1日写给孙中山的信，住在上海的孙中山到1920年5月才收到；1920年10月写给孙中山的信，孙中山在第二年6月才收到。陈炯明在漳州的政绩，特别是他支持“过激主义”的名声，要到1919年下半年甚至是1920年才产生较大的影响；要说列宁



早就通过什么途径对陈炯明有所了解，并决定给他写信，再把信在1920年春天带到中国，从时间来看恐怕也不可能。

第四，波塔波夫只是一个旧俄的将军，是以“白俄”身分来到中国的，归顺苏维埃政权不久，按理列宁也不会把向中国革命者转交亲笔信这样的任务托付给他。从索科尔斯基的记载来看，波塔波夫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派遣的代表。陈其尤的回忆说，波塔波夫起程时陈炯明还赠给旅费贰千元。陈是负责接待的人，这个细节应较可信。如果是这样，波塔波夫也不像负有重要使命的代表。

第五，在陈炯明致列宁的信中，完全没有提及列宁来信之事。

所谓“列宁亲笔信”一事，恐怕是陈其尤的误记。

波塔波夫虽然没有带来列宁的亲笔信，但他的漳州之行未必是个人的行动，他可能受苏俄或共产国际某个来华代表的派遣。1920年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派来“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在孙中山逝世后发表的一个回忆说到，当时他对有关陈炯明支持社会主义的传闻很感兴趣，1920年秋天他会见孙中山，希望通过孙中山了解陈炯明。<sup>①⑦</sup>1920年6月他在一封发自上海的信说：“我无法同波塔波夫联系，因为他动身到欧洲或回苏俄去了。”<sup>①⑧</sup>于此看来，派遣波塔波夫的人不是维经斯基。是什么人？今天已很难考证了。

最后，进一步谈谈波塔波夫是否即中文史料提到的“路博将军”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中文史料中，见过孙中山并到过漳州会见陈炯明的俄国军人只有“路博将军”；而在外文史料中，做过这两件事的只有波塔波夫。而且《陈竞存先生年谱》所记“路博将军”访问漳州的时间与波塔波夫带回的文件所署时间很相合；回忆录的一些重要细节（如陈炯明写信给列宁）可与俄文史料相互印证。至于波塔波夫在中文史料中为何被称作“路博将军”，是他的化名，还是记忆的差错，现在已很难做出判断了。

波塔波夫如果不是同孙中山、陈炯明有过一段往来，他的名字早就被历史的尘埃埋没了。不

管怎样，他在促成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系毕竟起过一些作用，因此，历史应当记下他一笔。

①《光明日报》1956年11月3日。

②转引自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辑，台北，1960年版，第98页。

③张友仁：《我所知道的陈炯明》，《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④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如孙振有：《路博是苏俄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历史知识》1989年第3期。

⑥加尔图诺娃：《孙中山——苏联人民的朋友》（俄文），《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10期；叶菲莫夫：《孙逸仙——道路的探索，1914—1922》（俄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⑦参看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1988年出版。

⑧⑩⑬ [德] 郭恒钰等、[俄] 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1920—1925》（俄文），莫斯科1994年版，第45—47、64—65、28页。

⑨如何香凝：《我的回忆》，《双清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925页。

⑩⑭叶菲莫夫：《孙逸仙——道路的探索，1914—1922》（俄文），第118页。

⑪ [美]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英文），纽约，1976年版，第115—116页。

⑫⑬《中苏关系，1917—1957，文件集》（俄文），莫斯科，东方出版社，1959年版，第49、50页。

⑮参看段云章等：《陈炯明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章。

⑯《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60、109页。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郭林

近代广州城市商业文化，是在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和参与下，通过对传统商业文化的承传和不断的创新而逐步形成的。世界新航路的发现，大大缩短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尝试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首先是葡萄牙，接着是荷兰、英国等，先后来到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广州。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率先在广州设立商馆，即以后所谓的洋行。随之，荷兰、法国和美国争相效尤。到19世纪以后，洋行的数量有显著的增加。由于洋行买卖货物需要金融的调度，于是出现了外国银行的代理分支机构。此外，还有大量保险公司、轮船航运公司等。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上海的崛起，广州港的对外贸易逐步走下坡路。从1853年起，广州作为中国外贸的中心地位，更是为新兴的上海港所取代，但它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时间里，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港口城市。在“中外互市，肩摩毂击”的环境里，西方的商业精神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广州社会，影响着广州市民的心态和生活方式，并对中国儒家传统重义轻利道德观提出严峻的挑战。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广州人开始以一种新的、近代的价值观来衡量世事，将经商、赚钱、致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新的座标。于是，广州人的经商观念更为强烈，而广州这个岭南中心城市亦更加迅速地发展成为充满商品、商品生产和商品意识、弥漫着浓重商业气息的商业社会。因此，西方重商观念的传播，对于广州城市商业

## 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及其特点

□张富强

文化的近代化，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攫取利润侵夺我国利权是促使西方人来到中国的主要原因。而西势东渐，又使其商业利润观得以传播。由于岭南远离中原，在历史上又一直具有发达的商业传统。所以，对于西方的商业利润观，岭南人并没有采取排斥态度，相反，他们逐渐采而用之，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人通商，无形之侵伐也，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甚。谋国而不思所以御之之法，如之何可也？”<sup>①</sup>敏锐的岭南籍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同外国人进行“商战”的必要性。郑观应是著名的“商战”概念的重要倡议者。他认为，西方国家之强，是由于富，而富又来源于工商业的发达。因此，中国若能学习和运用“商战”，要比同外国进行“兵战”更能收到实效。而要提倡商战，其根本途径就是提高商人的地位，把处于现存社会结构底层的工商者，视为绅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之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显然，郑观应思想的重要性，在于他能从经济角度全面地解释了西方社会，并力图以西方的方式来反对西方对我民族经济权益的侵蚀。岭南籍洋务派官吏丁日昌曾强调，政府应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中国商人购买和建造轮船，以同外国商船竞争。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不仅断然拒绝了欧美商人来华经营电报线路的要求，而且坚持说，这类近代企业应由中国自己经营。他认为，西方人来华的动机是追求利润。如果我们能采取措施，不致“利权”外溢，就足以使外人无利可图。这样，中国不须

动武，就会促使外国人自动离开中国。②郑观应和丁日昌等人所阐述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对于我国沿海通商口岸如何发展民族经济这个重大议题，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这些思想在岭南的传播，也为加速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历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综观广州商业文化的近代化历程，大致有这样四个特点：

第一，近代商人和商业萌芽较早，他们的早期经营活动，带有“开风气之先”的特征。鸦片战争前，广州行商垄断了进口棉毛织品的贸易。1819年，广州已有一批布商小贩，专营或兼营英国洋行棉布的买卖。1837年，广州棉布商组成“南海布商会馆”集中进行棉布交易。③当时的棉布交易，以土布为主，兼营少量洋布。随着洋货的蜂拥而至，产生了许多中间商、转运商、内地集散商和零售商。这些商人不仅把那些洋货分布到广州城的每个角落，而且将他们刚刚学到的有关外国的粗浅知识，传播到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鸦片战争后，广州商人最初经营的商品，主要有进口五金、棉布和百货等。1873年广州出现了第一家五金行——永顺源五金号。这类五金行以后陆续开张，其中较有名的安和记，则是在1892年开设的。不过，对市民生活有更直接影响的，是战后出现的专营洋布和洋货匹头店及专营洋杂货的百货批发店，其中后者称为“灯色店”——因其最初经营洋灯及进口线衫、毛巾和时钟等物而得名。这类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当密切的百货店或批发店，最早出现在广州的，是创立于1858年的任万里。④至80年代，广州这类专营或兼营洋货的批发店，有万安隆、马贞记、万和、万生等，它们集中在长寿里、同兴街一带。正是在这里，逐渐形成了百货批发市场。广州各商家都有主营或专营某国商品的习惯。有的向洋行定购洋货，有的则直接从香港和日本进货。到民国初年，广州陆续创办了先施、真光和大新等经营“环球百货”的大型综合性百货公司。这些大型百货公司，分设专类

柜台，集吃、穿、用等商品于一身，颇受消费者的欢迎。这种始于法国，有“零售业革命”之称的销售方式，对于岭南人接纳西方式的商业观和消费观，具有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

第二，到民国初年，广州已发展成为一座相当繁华的商业城市。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城区共有店铺27,524家。⑤这些店铺大致有以下专门的分工：绸缎、顾绣、布匹、呢绒、绒线、皮货、成衣、鞋、帽、袜、书坊、纸张、笔墨、镌刻、金铺、银楼、珠宝、钟表、眼镜、花粉、香水、米业、面粉、烟酒、生果、茶叶、药材、铜铁器、酸枝红木家具、外国木器、寿器、木行、瓷器、颜料、照相、丝店、染坊、玻璃、海味、煤油、火柴、腊味、南洋庄、银行、银号、当质等等；且在此时亦已形成或正在形成专业性的商业街区。店铺种类的日趋繁多，街区的专业性分工，往往能反映出商业繁荣和市民消费水平的程度。而当时高级酒楼林立，娱乐场所众多的状况，更是说明民国初年广州市民的娱乐消费文化观当已处在形成阶段。据当时记载，广州市共有酒店旅馆70多家，茶楼90多家，酒楼餐馆更是不计其数。⑥仅民国八年《广州指南》榜上有名的高级酒店和酒楼有：大新公司、西施公司、真光公司、西濠酒店、东亚酒店、大东酒店、粤海酒店以及花旗酒店、兰亭酒店、鹿角酒店等；高级菜馆有：高升楼、贵联升、一品升、桃李园、陶然楼；番（西）餐馆有：安乐园、月华筵酒店、评春酒馆、一景楼、陶然楼、华盛顿、太平馆等。另有外人所设寓所：域多利亞酒店、日本馆、东洋酒店等。至于娱乐场所，著名的戏院有：东关戏园、同庆戏园、乐善戏园、河南戏园和镜花台；影戏院有：民智影画戏院、广州影戏院、先施乐院、南美影戏院、通灵台、一新影戏院、振兴影戏院和大新公司影戏院等。此外，还有大量理发店、浴室、西式洗衣店、番摊（赌场）、牌馆（西人夜总会）、妓寨、山票、铺票及弹子房等。⑦这一切反映了广州商业的繁荣，市民消费水

平的提高。

第三，近代商业文化在广州萌发之后，即迅速地辐射到省内及全国各地。广州历来以“多商”著称。到了近代，在西方重商主义精神鼓舞下，广州商人除了立足广州地区及三角洲地区外，还到香港、上海及内地省份乃至台湾等地推销进口商品。因此，在各大城市的商铺字号中，到处可见“粤”、“广”字样。鸦片战争后，广东的五金商业资本纷纷向广西、福建、湖南、湖北等省扩展，广设分号。汉口城里很多有名的五金商号，都是广东人开设的。1850年以后，中国的外贸中心开始转向上海，广东商人亦拥向上海等地。广东是买办的发祥地。这些买办，通过从外商手中获取佣金，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以后便自营商业。鸦片战争后，许多买办随洋行来到上海，在上海乃至其他通商口岸的中外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都曾经是上海滩十里洋行赫赫有名的大买办。而有“汉口外国租界内华商之父”之称，曾为武昌官纱局董事和接办武昌纱、布、丝、麻四局的应昌公司总董刘纪常，亦是汇丰银行汉口分行的第一任买办。这些人物在近代中国经济史上都居有一定甚至较为重要的地位。据统计，在19世纪60年代，宝顺、琼记洋行在各口岸的买办共41人，广东籍的有29人。到90年代，旗昌、怡和洋行在上海、天津、汉口等12个口岸有买办55人，广东籍的占了26人。<sup>⑧</sup>到了20世纪初，在上海的“广东帮”，总数达到60000多人，他们分别按县组成了同乡会。自民国初年起，广东商人开始控制上海的商业领域。除了商业，广东人还涉足其他行业。总之，广东商人经营商业或创办企业的活动，对他们所在城市商业的兴盛和外贸的发展作出过有益的贡献。

第四，广州人的消费意识和促销能力不断加强。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那种生活简朴、消费单一

的生活方式，日益为新型的多样性的消费模式所替代，从而逐步形成一种以追求生活质量，丰富业余生活为主调的消费娱乐文化。民国初年广州高级酒店、中西餐馆不断涌现，影戏院、西式洗衣店、牌馆、弹子房等娱乐场所日益增多的情况，充分地反映出广州市民消费文化的多样性，不仅出入酒楼饭馆的人数众多，甚至夜生活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而不同消费等级旅店的大量的增加以及车船等交通运输工具所反映的广州与其他城市之间客流量的逐年增多的状况，亦说明当时的旅游业相当兴盛，旅游消费文化观亦在形成之中。正是因为消费领域的扩大，消费场所的增多，人们对“广告”这一舶来品在近代商业社会中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为了推销商品或为了争取客户，各商铺厂家都使出浑身的招数，有的利用其临街路的环境，悬挂广告，有的则充分利用公共场所张贴广告揭帖，不少商家则利用报章书刊等出版物刊登广告。总之，清末民初广州商业社会对广告效果的充分注意，说明了商家促销商品的能力或手段的提高，同时也表明新颖的广告文化亦在逐渐形成之中。

---

①郑观应：《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2页。

②参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下册，第218—219页。

③④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二卷，第181、211页。

⑤广东咨议局编：《编查录》，宣统二年版，下，第103—104页。

⑥⑦参见《广州指南》（民国八年），上海新华书局民国八年版，卷四，页1—5。

⑧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165页。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郭林

# 中华古典地方行政机构体制 的设置及演进规律

□奇 秀

我国从夏朝至清朝的行政体制，分为王朝行政体制与皇朝行政体制两大阶段。前者以王为核心，实行宗主国与诸侯国联合管理，属于联邦型，如夏、商、周3个朝代。后者以皇帝为核心，实行中央集权下的分级管理，属于单一型，如秦至清各朝代。春秋战国是王朝行政体制向皇朝行政体制的转变期。

皇朝行政体制始于秦而终于清，其间2131年。这种行政体制明显地分为中央、地方与基层三大行政层次。我们称之为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体制。

## 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的类型

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类型有3个：

### (1) 实二级型

行政级次分为高级和初级2级，这2级都设行政机构，都是实的。实二级型的主要形式是秦郡县制。秦郡县制开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结束于秦二世三年（前207），前后14年。

郡是高级地方行政。秦始皇二十六年，设郡36个，后增到41个。郡的行政长官是郡守，每郡设1人。秦代秩级尚未形成。西汉郡太守（由秦郡守改称）二千石（秩第3级）。内史辖区与郡同级，也是高级地方行政。内史辖区1个，由内史统辖，内史设1人，二千石（秩第3级）。

县是初级地方行政。一共设有多少县，

不确。县有大县和小县之分。大县的行政长官是县令，每县设1人；小县的行政长官是县长，每县设1人。西汉县令千石至六百石（汉前秩级第5至第9级），县长五百石至三百石（汉前秩第11至15级）。

### (2) 一虚二实型

行政级次基本上分为高级和初级2级，这2级都设行政机构，都是实的；把全部高级地方行政单位划归为若干大片，各大片不设行政机构，都是虚的，中央按片临时派遣官员巡察。一虚二实型的第一形式是汉部郡县制，第二形式是唐道州县制，第三形式是北宋路州县制；其中以唐道州县制为典型，它始于唐贞观元年（627），唐天宝十四年（755）以后性质发生变化，前后128年。

唐道州县制的地方行政基本上分为2级——州、县。

州是高级地方行政。京府与州同级，也是高级地方行政，但地位高于州。唐贞观十三年（639），共有州358个，次年为360个；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共有州（府）328个，其中府3个（都是京府）。府的行政长官是尹，每府设1人。府尹从三品（第6级）。州的行政长官是刺史，每州设1人。州分为上、中、下3等，刺史为正三品（第5级）、正四品（第7级）。

县是初级地方行政。唐贞观十三年有1551个（其中京县4个），次年，增至

1557个(其中京县4个);唐开元二十八年1573个(其中京县6个)。县的行政长官是县令,每县设1人。京县令正五品(第9级),畿县令正六品(第11级),京县和畿县以外的县分为上、中、中下、下4等,县令为从六品(第12级)、正七品(第13级)、从七品(第14级)。

唐太宗于贞观元年(627)把全部高级地方行政单位州划归为道,共10个;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为15道。道属于巡察片,中央按道临时派出官员1人或2人巡察。派出巡察的官称初不固定,有存抚使、巡察使、按察使等,因时而异;唐玄宗二十一年(733)确定为采访使。这一级不设行政机构,是虚的。

### (3) 实三级型

行政级次分为高、中、初3级,均设行政机构,都是实的。实三级型的前期形式是明布政司府县制,后期形式是清省府县制。前者始于明洪武九年(1376),终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前后268年。

布政司是高级地方行政,全称是承宣布政使司,也叫做省。明洪武九年,设12个;十五年,增为13个;明永乐元年(1403)为12个,五年复为13个,十一年增为14个;明宣德三年(1428),减为13个,此后不变。每个布政司设行政长官2人:左布政使1人、右布政使1人。明代以左为上,左布政使为第一长官,右布政使为第二长官,均正二品(第3级)。直隶与布政司平级,初有1个,明永乐二年(1404)增为2个。

府是中级地方行政,共140个(其中京府2个)。京府的行政长官是尹,每府设1人,正三品(第5级)。京府以外的府分为上、中、下3等,行政长官是知府,每府设1人,均正四品(第7级)。

县是初级地方行政,共有1138个(其中京县4个)。京县的行政长官是知县,每县设1人,正六品(第11级)。京县以外的县分上、中、下3等,知县一律正七品(第13级)。

州有直隶州和属州之分。直隶州与府

平级,属于中级地方行政。属州与县平级,属于初级地方行政。州共有193个,长官是知州,每州设1人,从五品(第10级)。

### 古典地方行政级的种类及演进脉络

古典地方行政级主要有7个——县、郡、州、军、路、府、省。这7个地方行政级分为稳定类和变化类。

#### (1) 稳定类地方行政级

自创设以后级别始终不变的地方行政级。此类行政级有县和省2个。

##### 县

县自秦始皇二十六年被定为初级地方行政后始终不变,与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相始终,是存在时间最长的稳定类地方行政级。清宣统三年(1911)皇朝结束后,县仍然是初级地方行政。

##### 省

省自蒙古忽必烈汗中统三年(1262)创设为高级地方行政。省最初称行中书省,明洪武九年(1376)改称布政司,到清康熙元年(1662)定称为省;这只是名称变化,实质相同。省大体上与元、明、清3代相始终,存在了649年。清宣统三年(1911)皇朝结束后,省仍然是高级地方行政。

#### (2) 变化类地方行政级

自创设以后级别升降变化的地方行政级。此类行政级有郡、州、军、路和府5个。

##### 郡

郡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被定为高级地方行政。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创设巡察大片——部,郡仍然是高级地方行政。到了西晋,部由虚级大片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州,郡降为中级地方行政。隋开皇三年(583),废郡;隋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郡又成为高级地方行政。唐武德元年(618),改郡为州;唐天宝元年(742),又改州为郡。唐乾元元年(758),又改郡为州。郡在皇朝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中存在于979年。

##### 州

州由虚级大片——部蜕变而来。西汉

元封五年（前 106），创设部为虚级大片；到了西晋，部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州。隋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在唐代，州郡互改数次。到了五代，军由虚级大片——道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州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州又恢复为高级地方行政。到了金，路由虚级大片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州又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元世祖（1260—1294 在位）把州分为直隶州和属州两种，前者属中级地方行政，后者属初级地方行政。州是存在时间最长的变化类地方行政级，至民国元年（1912）才被废除，达 1600 多年之久。

#### 军

军由虚级大片——道蜕变而来。唐贞观元年（627），创设道为虚级大片。唐天宝十四年（755），按道设军。到了五代，道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军。到了金，路由虚级大片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军降为中级地方行政。金大定（1161—1189）年间，废军。军大约存在 250 年。

#### 路

路由虚级大片蜕变而来。北宋至道三年（997）创设路为虚级大片；到了金，路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蒙古忽必烈汗中统三年（1262）创设省作为高级地方行政以后，路降为中级地方行政；明太祖改路为府，路废。路存在了 200 多年。

#### 府

府自唐开元元年创设为高级地方行政，属于京府。唐上元元年（760），从京府中分离出次府。到了五代，军蜕变成高级地方行政，府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府恢复为高级地方行政。到了金，路蜕变成高级地方行政，府又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同时，创设总管府，府分为京府、总管府和次府 3 种。蒙古忽必烈汗中统三年以后，总管府与路合并，次府分解为直隶府和属府，京府和直隶府属于中级地方行政，属府属于初级地方行政。明太祖以后，改路为府，并把直隶府转变为府，把属府转变为县；府分京府和府两

种，属中级地方行政，此后不变。府存在了 1198 年，至民国元年才被废除。

总之，以上 5 个变化类的地方行政级，大体说来：郡原是高级地方行政，后来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又被废除。州由虚级大片部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后来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后又分化为直隶州和属州，直隶州是中级地方行政，属州是初级地方行政。军由虚级大片道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后被废除。路由虚级大片蜕变为高级地方行政，后来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又被废除。府原是高级地方行政，后来降为中级地方行政，后又分化为直隶府和属府，直隶府属于中级地方行政，属府属于初级地方行政；后来属府被废除，直隶府成为府，府是中级地方行政。

### 古典行政机构设置体制演进规律

第一，地方行政机构设置由实二级型经一虚二实型演进到实三级型，带有规律性。

产生这一规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行政区域拓展，二是行政区划变细。实二级型是处于行政区域尚小和行政区划粗放状态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一虚二实型是行政区域拓展和行政区划变细，实二级型不能适应，对高级地方进行分片管理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实三级型是处于行政区域广大和行政区划精细状态的地方行政机构设置。

大体说来，我国当代的省、市（地区）、县 3 级，是从清代的省、府、县 3 级演进而来的。自秦代至清代的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演进规律表明，实行省、市、县实三级型是我国地方行政机构设置 2000 多年自身发展演进的必然结果。

第二，地方虚级片变实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带有规律性。

历代皇朝所设虚级大片共有 3 个——部、道、路。

因高级地方——郡和王国达到 100 多个，中央管理幅度太大，西汉元封五年（前 106）把全部郡和王国划归为 1 个司隶校尉部和 13 个刺史部，这 1 级是虚的。东

汉中平五年(188)以后,部开始变实,蜕变为州。到了西晋,州被正式确定为高级地方,郡降为中级地方。

因高级地方——州达到300多个,中央管理幅度太大,唐贞观元年(627)把全部州划归为道。道不设行政机构,这1级是虚的。安史之乱以后,道开始变实。到了五代,道蜕变为军,军成为高级地方,与此相应,州降为中级地方。

因高级地方——州、府达到200多个,中央管理幅度太大,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把全部州、府划归为路。路不设行政机构,这1级是虚的。到了金,路成为高级地方,成为实的;与此相应,府和州降为中级地方。

清代原设省、府、县3级。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撤府,保留省、县2级,以省统县,省的管理幅度过大,民国二年(1913),北洋政府在各省内把县划归为道。道不设行政机构,这1级是虚的。民国十三年(1924),北洋政府撤道,仍然保留省、县2级,省的管理幅度太大,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京国民政府在各省内把县划归为专区。专区不设行政机构,这1级是虚的,各省按专区派出官员——行政督察专员进行督察。

地方基本分为高级和初级,这2级都设行政机构,都是实的;把全部初级地方划归为中片,中片不设行政机构,这1级是虚的,高级地方按片派遣官员进行巡察。这类地方行政机构设置属于二实中虚型。二实中虚型是由实三级型回复为实二级型以后,高级地方管理幅度太大,不得不对初级地方分片管理而产生的一种变态。

设虚级中片,这是民国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中的权宜之计。我国当代处于省、县2级之间的虚级中片——地区,是从民国的专区演进而来的。皇朝的虚级大片变实,这带有规律性;同理,民国以来的虚级中片变实,这也带有规律性。我国当代的地区由虚变实,转变成为中级地方——市(指地级市),这是虚级中片自身具有变实趋势的结果。

第三,中央或地方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蜕变为地方行政机构,带有规律性。

县和省的行政机构都是从派出机构蜕变来的。

春秋时,各诸侯国在新占领地域设县,县设派出机构。战国时商鞅变法,确定为秦国的地方,县设地方行政机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定县为初级地方,设初级地方行政机构。县的行政机构最初是从派出机构蜕变而来的。

西汉时,皇宫又名禁中,成帝改禁中为省中。省中的“省”是指皇宫。东汉时,建立起中央行政机构——尚书台;因为尚书台最初是从皇宫(省中)分离出来的,所以魏晋以后称为尚书省。尚书省的“省”,是指中央行政机构。自魏晋经隋唐到金,尚书省所设派出机构,或称行台尚书省(简称行台省),或称行尚书省。两者的“省”,均指中央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蒙古窝阔台汗把尚书省改称中书省,仍是中央行政机构。从元中统三年(1662)设陕西四川行中书省起,行中书省成为高级地方,设高级地方行政机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进而又简称省。省作为皇朝国家机构经历了4次演进:第一次,皇宫;第二次,中央行政机构;第三次,中央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第四次,高级地方行政机构。省的行政机构最初是从中央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蜕变而来的。

设派出机构,这也本是古典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中的权宜之计。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蜕变为行政机构,这也带有规律性。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南京国民政府设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设专署,这是民国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中的权宜之计。我国当代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地区行政专员公署(简称行署),是从民国的专署演进而来的。行署由高级地方行政机构的派出机构,蜕变为中级地方行政机构——市政府(指地级市政府)是形势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科社系  
责任编辑: 郭林**



# 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

□党圣元

文学价值评价是文学接受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基础来衡量客体意义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所说的客体指文学作品及其相关联的创作活动，以及其它一切足以成为评价对象的文学现象。这种认知活动，本质上是主体对文学价值本身即文学作品或其它文学现象所蕴涵的价值事实的反映。接受主体在反复认知、反映文学价值的过程中必然形成对文学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并且以较固定的形态在意识中呈现出来，这便是文学价值观念。

文学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评价的标准，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主体进一步的文学接受活动和文学价值评价活动。所以，为了深入了解文学价值评价及其标准问题，必须研究文学价值观念问题。

文学价值观念作为主体以其需求系统（需求模式）为基础或参照系，对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整合而形成的观念形态，它综合地体现了文学接受主体对于文学在价值、意义方面的愿望、要求、理想等等。这里所言之“整合”，具有选择、调整、组合等含义。

在哲学中，“观念”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观念”，泛指一切形式的思想、认识、看法等，与精神（与物质相对应）、思维（与存在相对应）、主观（与客观相对应）基本同义。狭义的“观念”，指

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总的看法和理解，它是通过反复的认知过程，在概括与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一定认识范围内的具有比较稳定的深层内容和具有模式、标准性质的总的观点。比如文学观点，不是对某一具体文学现象的说明，而是体现着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对于文学标准的理解和如何对待文学的态度。我们这里所讲的文学价值“观念”，便是在狭义上理解和使用的。

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可以形成许多观念，如时空观念、文化观念、哲学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文学观念、以及生活观念、消费观念等等，文学价值观念是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它具有自己的特殊含义。首先，我们必须将它与一般文学观念加以区别。文学价值观念包含在文学观念之中，是文学观念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文学观念作为人们对于文学的总观点、总看法，其内涵相当丰富，但是从价值与事实区分的角度来看，可以大体上分为价值观念和非价值观念两部分。其中非价值观念这部分，是关于文学本体及其规律、趋势的整体性认识，在这里我们称之为一般文学观念。而价值观念这部分，则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意义，也就是关于文学价值的观念性认识，它是文学接受主体基于自身的需要对于认识对象好坏的区分，即主要对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作出好或坏、值得或不值得、期望什么或拒绝什么之类的评判，以及在一些矛盾冲突关系中，应该

倾向于哪一方面，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见解以及辞受取舍、抑扬褒贬等态度，都属于文学价值观念的范畴。

通过这一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一般文学观念侧重于认知对象“是什么”方面的问题，而文学价值观念则侧重于认知对象“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它们的认知对象不同。一般文学观念属于“事实认知”，而文学价值观念属于“价值认知”。同时，一般文学观念是一种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本质上是阐释性、说明性的，其最高层次是科学的、系统的文学知识体系，而文学价值观念则是一种以基本评价标准为核心的价值信念，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尺度，其最高层次是审美理想，即内在的、稳定的评价模式。其次，一般文学观念变革的实质是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体系的更新，而文学价值观念变革的实质则是审美理想、基本评价标准的转换。

## 二

文学价值观念的特质是通过自身的一些具体特征表现出来的。这些具体特征与一般文学观念的特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文学价值观念具有一般文学观念的特征，即它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客观性，是被主体接受、改造过了的客观的价值实在（价值物）；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客观存在产生能动的反作用，以及在一定的条件下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它对文学事实、文学现象的认识，已经上升到观念性的高度，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稳定性，以及具有超越经验界限的宏观性。文学价值观念不是接受者主观臆造的产物，而是具有客观标准的认知性结果，是可以用实践（价值实践）检验的，即文学价值观念也具有实践性。

然而，除了这些共同特征外，文学价值观念又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首先，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主体在价值实践过程中，在价值追求、价值创造的活动中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因而具有较强的主体性。其次，文学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文学主体在价

值追求和价值创造活动中作为评价标准的那一部分观念或思维框架，因而带有强烈的评价性。再次，文学价值观念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追求、价值理想，对于文学主体，无论是接受者，还是创作者，都起着潜在的或公开的驱动、定向作用，从而具有价值导向性。

与一般文学观念比较，文学价值观念特别是其中与创作或阅读欣赏密切联系的部分，具有明显的自发性、经验性。文学价值观念是主体评价经验积淀、提炼、内化的结果。因此，当某种文学价值观念形成之后，便往往被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东西，在主体的选择、评价活动中不自觉地加以运用。这时，文学价值观念就成了主体的思考工具，而不是思考的对象，以致主体往往忽略了对它的注视和反思，呈现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定势，有极大的惰性，改变起来很困难。比如，六朝时期，在五言诗产生已久，并且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的情况下，一些批评者尚不予接受，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还停留在只承认《诗经》“雅”、“颂”为唯一正体的地步，如挚虞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文章流别论》，《全晋文》卷七十七）甚至批评大家刘勰处于五言诗取代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也仍然认为“四言正体”、“五言流调”（《文心雕龙·明诗》），足见文学价值观念所代表的习惯性思维定势的力量之强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价值观念是永恒不变的。恰恰相反，每当社会文化处于转型时期，文学价值观念亦必将产生新变，人们终会自觉地反思现有文学价值观念体系，进行调整、重构。由于文学价值观念具有自发性、经验性的特点，故与文学本体认识，在认识特征上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差别，后者是关于文学的本质属性的严格的理性分析，排斥自发性、经验性、非理性。文学价值观念尽管具有如上的特点，但却不能完全视为是非理性、纯经验的，它终究还属于认识领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理性内涵仍为其主要特质。

文学价值观念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由于每一个接受主体都有自己特殊的现实经历和文学知识背景，往往使他们在目的、需求、愿望、情感、直觉、潜意识等方面形成差异，因而亦使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形成差异，因人而异，各不相同。除了主体之间文学价值观念的差异外，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群体也有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

文学价值观念与一般文学观念之间又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一面。比如“文以气为主”属于一般文学观念，但是当曹丕提倡这一观念，并且以此作为评价标准来衡量品评当时的一些诗人及其作品时，它就转化为一种价值观念了。又如“意境”也属于一般文学观念，但是当人们将其作为衡量诗歌作品品位高下的评价标准时，它也就转化为一种价值观念了。凡文学观念都有特定的价值所指，而文学价值又无不有一定的观念所依。所以，在实践中，它们往往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文学价值观念与文学价值观之间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就其抽象程度而言，文学价值观比文学价值观念更具有概括性。文学价值观念，是对于文学的意义或价值状况的看法，而文学价值观则是关于文学价值的根本看法，是关于什么是文学价值、文学价值的本质、文学价值的形态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看法。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文学价值观也就是文学价值论。比如我们常讲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文学价值观”，就是指中国古代文论或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价值的基本观点。文学价值观是各种文学价值观念的抽象和概括，而文学价值观念则是文学价值观在有关文学价值问题上的体现和具体化。其次，就掌握方式来说，文学价值观主要是对文学价值的理论把握，而文学价值观念则主要是对文学价值的实践把握。我们在这里以文学价值观念为对象，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当然是一种理论把握，但是就文学价值观念本身来说，与具体的文学评论、鉴赏以及创作实践的联系更为密切些。其次，

文学价值观是文学价值观念的理论基础。文学价值观作为关于文学价值的系统化、理论化的观点、学说，对于一个人来讲不可能，亦不应该同时具有两种以上，而文学价值观念则可以有许多种，这是因为在文学主体的每一个活动领域都相应地存在着一种由总的文学价值观具体化而形成的文学价值观念。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似乎可以给文学价值观念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了：文学价值观念是文学主体关于文学价值现象或价值关系的系统化看法和观点，是以往主体在文学接受或创作过程中的价值实践和价值生活经验的理性化积淀，其特点是对客体对象有无价值以及价值品位高下作出区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模式性，实质上成为文学价值认知活动中主体内在性的评价标准、价值尺度以及评价的思维框架。

### 三

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从其内在结构来看，是以价值思维方式为基础，以基本评价标准为“硬核”，包括许多要素在内的一个观念体系。价值思维方式是主体据以形成一定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思维准则和评价方式。基本评价标准作为文学价值观念的“硬核”，是文学价值观念的生长点、聚汇点。每一个民族或社会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都有这么一个“硬核”，并以这个硬核为中心，直接或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文学价值观念来。比如，中国封建社会儒家学派就将以“仁”、“礼”为内涵之“善”作为文学价值的基本评价标准，形成了“风教说”以及后来的“文以载道”等文学价值观念。又如极“左”文艺思潮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作为衡量文学价值的基本标准，并由此而形成了“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为路线斗争服务”等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观念，组成一个庞大的观念群，而究其实质，无不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硬核”。基本评价标准是我们认识某一社会、某一群体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的核心标志。这也说明，所谓文学价值观念变革，主要是文学价值观念体系内部“硬核”的转换或革除，如果变革的只是其体系外围的、非内核性的东西，不将其硬核击破，重新加以选择、整合重构，旧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不久又会被“修复”起来，而新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建构便无从谈起。

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要素包括社会需求观念、主体角色意识、文学价值本位观念。这三大要素又各自统摄着一系列子要素，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社会需求观念与主体角色意识之间具有相互选择、相互转化的关系，而文学价值本位观念则对前两者构成一种制约，即文学价值本位观念规定了文学价值以什么为主导，把文学价值归结为何物，并对社会、主体的需求意识发挥一定的规范、制约作用，使得二者所持的基本评价标准尽可能与文学价值的本体特征相对应。文学价值观念三大要素之间呈动态结构关系，即有相互协调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而这种冲突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促使文学价值观念变革的发生。

文学价值观念的内部结构是多维性、综合性的，这种内部结构特征是与文学价值的多层面结构特点相对应的。因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种文学现象，都具有多种价值属性，作为价值载体包含着多种价值项，如政治、道德、宗教、文化、审美、认识等方面的价值因素；而其中的每一种价值维度都标志着其与接受主体之间的一种特定的价值关系，所谓文学价值观念就是主体对这些不同的价值关系的综合把握。

文学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成分、多层面的系统，其内部结构是相当复杂的。从内容性质上来看，文学价值观念由个体价值规范和社会价值规范两方面的内容构成，它们分别以个体或社会（群体）的价值需求为参照系，体现着不同主体对于文学价值的认同态度，前者反映着文学活动个体对于文学所具有或应该具有的价值意义的体认态度，后者反映着社会群体对于文学

所具有或应该具有的价值意义的体认态度。所以，文学价值观念在内部结构上实际上存在着两重性的特征。究其原因，文学价值观念的这种两重性又与文学价值本身的两重性特点相关联。文学价值本身是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两重性构成，而文学活动主体在接受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一系列关于它们的观点与看法，所谓文学价值观念的两重性正是文学价值的两重性的观念化反映。

从主体的角度来看，文学价值观念的这种两重性结构特征又与接受主体的双重存在特点相关联。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既是独立的生命个体，又是群体的一分子，因此他的一切价值活动便必然反映着出于个体生存需要的价值需求，同时又适应或服从社会群体的价值需要。处于价值关系中的任何个人实际上表现为双重主体：一方面他作为个人主体而存在，另一方面又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价值主体的这种双重主体特征反映到文学价值观念上，便必然会形成文学价值观念内部结构的两重性特点。

文学价值观念内部的这种两重性结构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有时它们是平衡、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时则是在矛盾冲突中出现失重现象，具体情况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或不同的接受主体来决定。因此，在某一社会阶段的文学价值观念中社会成分所占的比重可能大些，而在另一社会阶段的文学价值观念中个体成分所占的比重可能大些，或者在某一主体那里社会成分突出，而在另一主体那里则个体成分突出，甚至还会出现一种成分被另外一种成分完全排斥或取代的现象。

再进一步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文学价值观念内部社会和个体两种成分（或曰两个系统）又各自包含着一些具体的评价尺度，根据评价客体的不同，可以分为政治功利、伦理道德、宗教、审美、认识等等评价尺度。可以说，在每一个被评价的文学价值成分方面，都存在着相应的价值尺度，都有一个对该被评价对象的态度

问题。文学价值观念的这种评价尺度（或曰内在因素）的丰富性，使得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观念丛”，而这一特点的产生又与文学价值本身是一种多成分的综合体密切相关。在文学接受活动中，主体或者单独使用这些具体评价尺度中的某一种来体认对象在这方面的价值意义，或者综合为总的评价尺度来衡量判断对象的整体价值品位。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中，这些具体评价尺度的结构方式亦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的特性就是由此而决定的。比如在儒家的政教中心论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中，政治功利和伦理道德的评价尺度占主导地位，在近代西方的唯美主义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中，审美又成了唯一的评价尺度，而在反映论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中，认识作用则成为主要的评价尺度，等等。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不同的接受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同的位置，具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理想以及思维认识方式，这些主体性差异必将影响和作用于他们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因而便使各种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从内在的评价尺度的结构方式到该体系的总体倾向性出现差异。

总之，虽然有史以来人类的文学价值观念多种多样，纷纭复杂，但是就一种文学价值观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来看，无非是由最高价值主体、终极价值目标、根本实现途径以及基本制约规范这相互联系的四个方面构成。所谓最高价值主体，涉及到一种文学价值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以谁作为最高评价主体的问题，亦即以谁的审美需要作为文学价值的根本标准问题。这是文学价值观念的首要内容，也是任何一种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问题，古往今来各种文学价值观念体系之间的不同，归根结底即在于此。所谓终极价值目标，是指一定的文学主体所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不同社会、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以及不同个人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是最有价值的、最为理想的，看法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所体现的正是不同的文学价值观念持有者所追

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即最高审美理想）的不同。所谓根本实现途径，是指文学主体为达到一定的审美价值目标所应具备的条件和采用的手段、方式。评价主体不同，审美理想不同，其实现价值目标的根本途径也就不同。所谓基本制约规范，是指文学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审美价值目标而遵守的主要美学准则，是美学规范。美学规范来自于文学创作和阅读批评实践，人们通过实践经验的积淀和总结，逐步形成了在某种特定情景中为实现特定的价值目标而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审美原则，这就是美学规范。上述四个方面，最高价值主体是整个文学价值观念体系的基础和立足点，终极价值目标则是其实质与核心，另外两个方面是一定的文学主体实现其价值目标的条件，它们协调一致，构成一定意识形态的文学价值观念体系。

在文学接受过程中，主体往往对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价值特点加以概括，将其中他认为非常成功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价值创造事实转化为主体心理事实，并且纳入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念，作为一种参照模式，来评价其它文学作品，从而成为一种评价标准和尺度。比如历代将杜甫的诗歌誉为“史诗”，一些诗评家以此为依据，要求诗歌要反映深广的历史内容，要求诗要发挥史的作用，对诗的创作提出明确的价值功用方面的要求。在这里，杜甫的“史诗”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价值目标，并作为参照模式而成为一种评价尺度。这种参照模式虽然是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来的，但实质上仍是某种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的转化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感性色彩，不完全是概念集合性质的，但仍是理性化、观念化的产物。从文学价值观念内部结构的逻辑关系来看，它从属于终极价值目标。在我们认识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时，对此亦必须加以注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责任编辑：陶原珂**

## 玄学·玄谈·玄言诗

### 一

玄学之“玄”，语出《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微妙玄通。”（第十五章）《说文》：“玄，幽远也。”“幽，隐也。”“幽”字中的“玄”就有细小之义。奥妙的道理常常就隐藏在幽微之中。玄义是“远”的，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意在八方之表”。奥妙的道理，往往不是人的感官所能直接理会的，它存在于人的感觉世界之外，没有具体的形象，因此也是不清晰的。这是从宏观上来理解“玄”。总之，不管从微观或宏观的角度看，“玄”都是不能直接把握的，因此，人们才会将玄学理解为形上之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哲学了。将“魏晋玄学”译成“魏晋哲学”，我想是并无大谬的。

在中国哲学史上，道家学派的建树最为卓越，其一便是突破了儒家尚实的传统观念，将人的目光引向玄虚之境。“玄”（或“虚”）的概念或范畴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大发明，其哲学意义极为深远。先秦儒家多是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们关注的重心是社会政治问题和个人的道德修养，正视现实是儒家一大传统。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说明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对于人性和自然界的哲学思考是很淡薄的。而这两方面在道家留下的精神遗产中却焕发着诱人的光彩。

《颜氏家训·勉学》说：“何晏、王弼祖述玄宗。……《庄》、《老》、《周易》，总谓三玄。”将两部道家著作和一部儒家经典汇合变通，构成了玄学的基本精神。其实，魏晋玄学家们的观点也很分歧，汇通儒道两家思想的情形并不一样。王弼、何晏把儒、道视作“末”与“本”或“有”与“无”的关系。“本”、“无”指抽象世界，

“末”、“有”指现象世界。“本”与“末”、“无”与“有”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如“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就是二者关系的具体运用。按这个命题推论，封建统治的名教，不就是合于自然之道的合理现象了吗？这是将现实的儒、道关系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来加以解释，比之儒学原先那种质实的统治思想，的确要精致得多。此外，向秀、郭象也讲“有”、“无”，但将二者视为彼此并列的关系，具体到名教与自然，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譬如《庄子·逍遥游》塑造了一个藐姑射山神人，本来为的是与儒家崇奉的圣人对抗；郭象在《庄子注》中有意曲解庄子的原意，将道家的神人与儒家的圣人加以调和：“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葛洪《抱朴子·逸民》讲得更明确：“在朝者陈力以乘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东晋有个僧人叫竺法深，常结交王侯，出入朱门，有人问他：“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世说新语·言语》）这都是用并列的眼光来看待并调和名教（仕）与自然（隐）二者的关系。到东晋时，这种认识已是带普遍性的观念了，其现实目的在于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新需要。这是玄学初创时期的宗旨，决定了玄学的基本政治倾向。

玄学虽是汇通儒道二家的产物，但从实质上看，它更倾重于道家，因此有人说玄学是道家学说的新发展，并非毫无道理。“三玄”中的《老子》和《庄子》是道家的经典，其中“玄”、“虚”两个范畴充满了哲学的深刻内涵和思辨意味。《周易》虽说受到孔子的重视，曾被列为教授学生的科目之一；但它原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中的卦、爻辞，不少具有朴素的哲学思辨火花，与道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本来并非儒

家所专有。然而，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具有某种空想的性质，由对现实人生的激愤和批判而导向消极避世。经过玄学的汇通，儒家的尚实精神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受到重视，致使道家探究宇宙、人生至理的目的，终于落实到现实的需要上来，从而淡化了自身的空想色彩。这一点，我们是不应该忽略的。

然而，玄学在魏时那样风靡朝野，于后世影响甚远，魏晋风度（其中也包括玄谈）被后人的叹赏不尽，却主要不是因为它的尚实精神，而是即实入玄（虚）的谈吐所显示的思辨色彩和非凡智慧，所谓“方外之妙趣，囊中之玄照”（孙绰：《喻道论》）讲的即是玄学家们的理想追求。在他们看来，无论“方外”（现实社会之外）、“囊中”（现实社会），都应有超拔于现象世界之上的理性观照。一次，太傅司马道子问谢玄：“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说新语·文学》）读书多，有学问，但若不能“入玄”（上升到理性高度），是不能说思入妙境的。谈论历史人物也不能就事论事，拘泥于具体的历史，只有升华到理性的境界，才算妙思入玄。

## 二

魏晋玄学，除了学术性的论著，比较广泛采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玄谈，即通过口头方式来探究玄理。玄谈之所以引人入胜，除了思辨色彩和启人思虑的智慧之外，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玄谈家语言的精彩、独特。当清谈名士手执麈尾、侃侃而谈的时候，不但展示了他们的哲学智慧，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们超凡的风姿神采。这种通过言语举止显现出来的精神风貌，便是魏晋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精神境界——“玄胜”。实际上，语言表达能力也是衡量他们智慧的一个重要方面。《世说新语》（尤其是《言语》篇）可说是玄谈妙语的渊藪。概而言之，玄谈语言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简洁。清通简要为玄学的基本语言特征。不仅玄谈崇尚“清辞简旨”，撰写学术论著，训解古籍也以语言精约为优，烦累为劣。《世说新语·文学》载有一则谈论南北学风差异的轶事：当时南北的地理分野是以黄河为界的，河北一带深受汉代经学的影响，崇尚“渊综广博”；黄河以南，盛行玄学，标举“清通简要”。支道林把这南北不同的学风（实际上也是指语言风格），形象地表述

为“显处视月”（博）和“牖中窥日”（精）。

玄学语言的清通简要，不仅要求语言本身的精简，而且这种精简是能恰到好处地抓住事理的要领的。正如《晋书·王承传》赞美王承“言理辩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语言的精约，在于“明其指要”，在析理辩义上做到“约而能通”。

二是即实入玄。用佛家支遁的话这叫“即色游玄”，指的是一种非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即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浅近物事，用比较接近口语的言谈，启发听者从中体悟某种深刻的事理和旨趣。《世说新语·文学》载有一则轶事很能反映这种特点：

殷中军问：“自然无心于禀受，何以正善人少，恶人多？”诸人莫有言者。刘尹答曰：“譬如写水著地，正自纵横流漫，略无正方圆者。”一时绝叹，以为名通。

崇尚自然是魏晋玄学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行动上就是一种任真率性的作风，具有冲破儒家礼法禁锢人性的解放色彩。其实，同样标榜自然，东晋与西晋并不尽同：西晋名士崇尚自然主要表现为行为上的任诞不羁，反映出极其鄙俗、强烈的物欲和对社会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如“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抱朴子·刺骄》）。西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勉强维持了52年，那些中朝贵族，许多在动乱中灭亡了，有的苟全性命，逃到江南，偏安一隅。他们在痛定思痛中，或出于自责自悟，或见于历史教训，多有清谈误国的悔恨之论。这就使得东晋士人的崇尚自然一变而为精神上的潇洒脱俗。这种潇洒脱俗，一方面表现为比较现实的人生态度，既入仕又淡泊情怀；另一方面则是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和对文学艺术（如诗文、绘画、书法、歌舞等）的一往情深。玄谈固然还是他们展示自己的风姿才华的重要方式，而逸放山水，钟情艺术，更是他们潇洒脱俗情怀的一种寄托。大司马桓温叹赏谢尚：“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世说新语·容止》）觉得他像天上的仙人一样洒脱。这种联想和升华，实在是从具体中把握某种抽象精神内涵的玄学方式，从语言的角度说，也就是即实入玄了。《世说新语·容止》中有不少通过自然物的具体形象以展示人物精神气韵的例子，如用“孤松之独立”、“玉山

之将崩”去刻划嵇康；用“朝霞举”状述司马昱；用“春月柳”形容王恭等等。

三是追求音韵的美感。理论著作讲究语言在听觉上的美感，这在我国早有先例，如《易经》的卦、爻辞，为了说明某种卦象的原理，常常引用一些押韵的格言或歌谣，使人易于背诵和记忆。《老子》更是从头到尾像诗一样押韵，难怪一些外国人称它为哲学诗了。这种情况在后来的《庄子》中还保留了某些痕迹，如《逍遥游》最后那一段庄子与惠子辩论樗树有用无用的文字，就基本上是隔句押韵的。魏晋玄谈讲究语言的音韵之美，明显受老庄这种语言风气的影响。此外，佛学东渐始于东汉，至东晋时几可与玄学抗衡。中国文人受印度梵音学的启示，对汉语声韵逐渐有所认识。佛僧念经、讲经，素重语言的节奏和音韵之美，这也势必影响到玄谈家们的语言表达习惯。《世说新语》中即有玄谈家或佛僧在使用语言时“好整饰音辞”（《言语》）、“甚有音辞”（《赏誉》）、“韶音令辞”（《品藻》）等记载。“辞”偏重于词藻的修饰，“音”则明显指语言的音韵节奏之美。像道壹道人描绘吴中下雪的情景：“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言语》篇）不但写出了当时雪景之美，而且用了四句整齐的六言句，二、四句还是押韵的。无怪乎名士清淡的语调常给人一种“咏”的感觉，以至《世说新语·容止》有“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遭”的记载，此处“理咏”当是指玄谈时近乎吟咏的那种“音调”之美。当时，玄谈家们才思、语言之美，是十分令人倾倒的。一次，支循谈论《庄子·逍遥游》，“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连颇为自负的王羲之也不能不“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清淡名士谈玄时那种为人叹赏的热烈场面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不少记载，如：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所谓“二家之美”，其魅力究竟在何处？邓粲《晋纪》叙裴遐清言之美揭示了这个谜底：“遐以辩论为业，美叙名理，辞气清畅，冷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原来“知与不知，无不叹服”的正

是玄谈家们那“辞气清畅，冷然若琴瑟”的词采音韵之美。

### 三

玄谈的魅力，既然来自“名理”与“奇藻”，而对于听者来说，“奇藻”乃是直接被接受的，其特殊效应常常掩盖了它的“名理”的智慧之光。这就促使清淡名士十分重视语言的表达艺术，从而很自然地推动了玄理与诗歌的结合，玄言诗与玄谈几乎同步始终，由此或能看出某种契机。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名士们在清谈时是那样注重语言的技巧，在显露他们的哲学智慧的同时，也展示了他们的文学才华；可是，当他们创作玄言诗时，却往往给人“质木无文”的感觉，文学的才华黯然消失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尽管比较复杂，但我认为片面追求诗歌的雅化，不能不是明显的原因之一。其实，在诗中注入“名理”本身就是诗歌雅化的一种表现，因为哲理的智慧确能启迪人的思虑，涤荡人的胸襟，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魏晋士人孜孜以求，后来的诗人也乐此不疲的正在此。东晋之时，这种雅化还表现在追求一种脱俗的文学语言上。《世说新语·言语》载：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文学的描写首先要求真实，即所谓“格物”。雪有米雪（即“霰”）和絮雪之分。从“格物”的要求说，如果这次下的是米雪，则谢朗的“撒盐空中差可拟”比较贴切；若是絮雪，当然谢道韞的“柳絮因风起”最富诗意了。对此，谢公何以只是“大笑乐”，而不加评鹭呢？我想，他大概是有苦衷的，实在不好评说；因为这次下的很可能是米雪，谢朗的形容虽然贴切，但过于粗俗，与东晋玄谈追求雅化的风气不符；而谢道韞的描绘尽管脱俗而有兴味，终因不格物而难以褒举，所以谢公只好以“大笑乐”来敷衍了。其实，谢安谈玄是最重“理致”的。所谓“理致”，按我的理解就是指通过脱俗而富有雅趣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哲理。他的玄言诗也是追求雅化的典型。根据他平素的好尚，他的内心应该是倾向侄女道韞一边的。《世说新语·文学》另有一则记载：



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逯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于谏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小雅《采薇》中这四句诗，无论体物入情的细微，抑或诗歌语言的色泽之美，都堪称《毛诗》中的佳句；而大雅《抑》中那两句则无论如何算不得好诗。用今天的眼光看，谢玄的鉴赏水平远比谢安高。为什么以大雅君子名重一时的谢安却如此推崇那两句干枯无味的诗呢？这或许与他当时身处宰辅高位的心胸（谋大图远的政治抱负）有关；但从诗歌艺术的标准来要求，这种“雅人深致”，实在太缺乏艺术的韵味了。其实，谢安这种对诗歌的偏尚，正代表了东晋玄言诗创作追求雅化而走向极端的倾向。这种极端雅化的语言风格，从本质上说就是奥涩。玄言诗，尤其是东晋的玄言诗，普遍存在这种毛病，它脱离实际语言越来越远，代表了当时上层社会文学“沙龙”的狭隘而扭曲的审美情趣。东晋名士的清谈语言之所以给人美感，除了玄谈的内容比较高雅外，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富有文学的情趣也是重要原因。这种富于文学特征的玄谈语言一般是比较通俗浅近的。玄言诗追求雅化而导致奥涩，正违背了玄谈语言这一普遍的审美趣味。可见，玄言诗不仅背离了诗歌艺术的一般法则，也与玄谈固有的语言习惯相左，它的逐渐为世人所抛弃，乃是理所当然的事。

还有，玄言诗追求雅化的趋向表现在形式上就是模仿《诗经》“雅”诗那种比较板滞的四言体。虽然玄言诗并非尽是四言诗，但四言是玄言诗发展中的主流形式（尤其是前中期）。《诗经》中的“风”诗尽管也以四言句为主，但常常杂糅若干长短不拘的句子，或衬以口语中的语气词“兮”、“思”之类，诗体显得活泼而有变化，避免了四言诗在节奏上的单调而带来的板滞感。而

“雅”诗，无论内容或形式都比较投合上层社会的审美心理，尤其是形式上那种趋于整齐划一的四言体，更是为历代统治层所乐于效法。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自汉代以来，凡属郊庙的祭歌或上层社会的酬唱之作，大多是这类整饬的四言体雅诗。玄言诗的发展也汇入了这一雅化的潮流；这与诗歌艺术发展的主流——形式上追求既统一又多变的审美趋向是背道而驰的。整饬的四言体玄言诗，大多用于上层社交场合的赠答，内容、结构都似有固定的模式，常常由若干首构成组诗，一般都是从宇宙（或“道”）写到人生，然后再叙及彼此的关系，并赞美对方如何如何。如著名玄言诗人孙绰的《赠温峤诗》（五章）、《与庾冰诗》（十三章）、《答许询诗》（九章），开头分别是“大朴无象”、“浩浩元化”、“仰观大造”。作诗的用心多有谀人之嫌；写诗不是因感情的激发而不得不发，而是为着某种现实的功利而咬文嚼字，这就很难做到真实动人。再是整齐的四言句，一首诗长的多达一百多句，其音调节奏之单调、沉闷，读来味如嚼蜡。再生动的内容，再精采的文学语言，经这种短而且促的四言体的裁割，少有不伤灵气的。钟嵘说四言诗“每若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诗品序》），道出了四言诗让位于五言诗、七言诗是诗歌艺术体制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在五言诗已经成熟，并蓬勃发展，七言诗也已兴起的魏晋时代，四言体雅诗在形式上的劣势越来越明显，而玄言诗人硬是费尽心力去驾驭，其结果只能是为无情的历史所抛弃。一些玄言诗改作五言诗，往往时有佳作，如孙绰的五言《兰亭诗》、《秋日诗》，读来清新可喜，这固然与诗中的山水描写有关，但五言诗节奏上的优势确实也助了一臂之力。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试论汉语方言岛

历史上操相同或相近方言的一部分人迁入操另一种方言的人的地盘，他们所带来的方言在本地方言的包围下，就如大海上的岛屿，即是通常所说的“方言岛”。现存的汉语方言岛基本上都是在明、清两代形成的。明、清以前，虽然也曾有过一些方言岛，如临安（今杭州）的北方话方言岛，但由于年代久远，大多已淹没在周围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本文力图运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人与严修鸿几年来在李如龙教授的指导下实地调查的材料，综合论述方言岛的一般问题。

## 一、方言岛的成因

历史上的移民运动，是形成方言岛的直接原因。

### （一）军事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凡是与军队或战争有关的移民，都是军事移民。例如，明朝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闽中沙县邓茂七举兵起义，起义军数月之间攻克了20多座州府和县城。次年正月明朝急派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率领京营及江西、浙江等地军队

计五万人，入闽把起义军镇压下去。明王朝为防止起义军“死灰复燃”，令陈懋所部留驻延平（今南平市），那些京师官兵就此定居下来，成为自北而南的军事移民。500多年过去了，其后代至今尚有相当部分还在说“土官话”，这就是南平城区的北方方言岛。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关隘、城池或河流，历代统治者都要调遣重兵驻扎把守。民国十一年（1922）修的《琴江志》载：“雍正六年，福州将军蔡，奏请设立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着在省老四旗之汉军分派官丁及眷属来营。”另据记载，这支水师旗营由13名官员，30名领催和470名兵丁组成，加上他们的眷属，当年到琴江来的北方人共有140多个姓氏，总人口当在1000人以上。如今，其后代仍在用北方方言，形成长乐琴江村北方方言岛。

每逢兵荒马乱，平民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只好背井离乡，举足他迁，这也形成军事移民。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大批福州人溯闽江而上，内迁南平、顺昌等地，很多人就此定居下来。至今顺昌县的洋口镇还有“小福州”之称，是一个福州方言岛。同是抗战时期，广东省政府内迁韶关，大批“广府人”也涌入韶关城区，使韶关城区白话基本取代“老韶关话”而成为主要的交际用语，但周边农村仍主要说“老韶关话”或客家话，城区成了白话方言岛。

### （二）政治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政治迫害，是引发政治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收复台湾，以为抗清之基地，但他当年就病逝。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统一了台湾，郑成功的亲属开始受到清廷的政治迫害，其中一支潜回大陆，隐居于闽南漳浦县沿海。旋被发现，复逃迁到闽侯县西台村。至今，这带郑氏居民都还在说他们自称为“下南话”的方言。又如，四川的官话方言，是元末明初湖广的大规模移民带来的，其中部分原因也与明政府的政治迫害有关。①当年随湖广人入川的官话方言，也是以方言岛的形式散布在土著方言之中的。只是随着历代北方人源源不断入川，官话方言才成为四川的主导方言。

政治移民还包括官吏贬谪、罪犯流放所造成的人口迁移。海南岛最南端三亚市的“迈话”，处在闽方言系统的琼文话和琼崖话的包围之中，是一个约有12000人使用的方言岛。明代《正德琼

台志》载，“迈人、客人（按：当地对讲海南闽语的人的称说）俱在崖州，乃唐宋以来仕宦谪寓之裔。”这些被贬谪的官员，“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也不大可能来自同一个时代，谪寓到古崖州前的仕途经历也不大可能相同。”所以，今天的迈话具有明显的混合性质；②黑龙江省的肇东、肇源和泰来等县，有一种与当地的东北官话略有不同的方言——站话。站话的使用者，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的后代。站丁的祖籍多在云南，他们大多是清代“三藩”之一的吴三桂的部卒、附属及其家属。吴三桂清初被册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拥有旗兵 53 佐领，绿营 10 营。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乱，至康熙二十年（1681）始被清廷平定，其部卒免死发配到黑龙江。据张伯英《黑龙江志稿》载，“站丁皆云南产，以吴三桂叛故充谪山海关外。”③可见，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来自云南一带的政治移民。

### （三）经济移民与方言岛的形成

一方的居民在经济生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举足他迁，这是一种经济移民，它也可能在异地他乡形成方言岛。位于闽东宁德湾南岸的碗窑，是一个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闽南方言岛。“从泉州一带的陶瓷业历史，可以推知碗窑人从闽南迁居宁德的原因……明清之交，闽南的晋江、南安、永春等地瓷业渐趋衰竭。碗窑人的祖先于清初从泉州、南安、永春一带移居宁德，正是由于晋江、南安等地瓷土资料逐渐枯竭，瓷业开始衰败而向外转移的。”④

四川的官话区中，分布着几十个的客家方言岛，总人口在 100 万以上，他们的祖上多是在清代前期从潮州、惠州、嘉应州、韶州和南雄州辗转迁移而来的。粤东、粤北山多田少，土壤贫瘠，加之雍正年间旱涝灾荒连年不断，平民百姓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到异地谋生。恰逢明末清初之际，饱经战争创伤的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⑤，清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外省人入川垦荒。于是，粤东、粤北的客家人，也就大规模地向四川迁移了。（参阅《甘庄洛公全集》卷七）

## 二、方言岛的地理类型

从地理位置和分布状况看，方言岛可分为孤岛型、群岛型、列岛型和岛中之岛型等四种基本类型。

### （一）孤岛型方言岛

操某方言的一个村落（有时是一个城镇），或者相连成片的几个村落，处于另外一种方言的包围之中，即是孤岛型的方言岛。福建省长乐县琴江村北方方言如上所述，这里的居民，上了一定年纪的都还在继续使用“旗下话”，年轻人则改说周边的福州话了。福建省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分布在全镇的几十个自然村中，基本上都相连成片，同处在武平客家话的包围之中，也是孤岛型方言岛。据考证，中山镇“军家话”是明朝洪武年间来自江西、浙江等地的官兵及其眷属带来的，至今还保留赣方言的某些特点。

### （二）群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互不相连成片，而是被周围方言彼此隔离开来，即是群岛型方言岛。群岛型方言岛是网状的方言岛。四川的客家话，散布在 20 多个县市的局部地区，“其人数多寡不一，少则几百（如威远石坪），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隆昌县达 20 多万），全省总人数估计在 100 万以上。”⑥在福建省福清市和闽侯县的闽东方言片中，有几十个闽南方言岛散布在近十个乡镇中，大多是清代前期从闽南地区播迁来的，实为一方言群岛。

### （三）列岛型方言岛

在一个方言区（片）中，沿着河流或交通要道的走向，分布着几个甚至几十个操其他方言的村落，即是列岛型的方言岛。列岛型方言岛实是一个线状的方言群岛。在粤北地区，北起乐昌市，南至清远市，沿着武江、浈江和北江（武、浈两江至韶关市汇合成北江）的两岸，分布着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闽南方言村落，这是沿河流分布的列岛型方言岛；黑龙江的站话，是清代驿站的站丁及其眷属所使用的方言，有别于当地的东北官话。因为驿站是沿驿道设置的，所以站话分布在驿道两侧而形成列岛型方言岛。

### （四）岛中之岛型方言岛

乙方言处在甲方言的包围之中，而丙方言又处于乙方言包围之中，这样，丙方言就受到甲、乙两方言的双重包围，形成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在闽东福鼎县的沙埕镇，有一个闽东方言包围之中的闽南方言岛，口音近于泉州、永春一带。在这个闽南方言岛内，又有澳腰和后港两个村的 2000 多人说的是莆田方言—澳腰话。澳腰话即属

于岛中之岛型的方言岛⑦。

### 三、方言岛的双方言交际

方言岛处在其他方言包围之中，出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岛民们一般都要兼通包围方言而成为双方言者，所以，方言岛一般都成为双方言区。但是，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方言岛就在城镇当中，则不一定兼通周边乡村的包围方言。如南平北方方言岛的居民，不兼通周边的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顺昌县洋口镇的福州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当地顺昌话；粤北韶关市区的粤方言岛，岛民们不兼通周边农村的客家话及各种土话。

就总体情况而言，大多数的方言岛都是岛方言与包围方言并存并用的双方言区。即使像长乐琴江村这样的长期闭关自守的北方方言岛也不例外。这个方言岛的岛民“旗下人”乃是清代官兵及其眷属，长期享受清廷的俸禄，辛亥革命前，他们一般不与城外的福州人通婚，也不学说福州话，倒是进城就读的福州人得学说“旗下话”。辛亥革命后，琴江“旗下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不得不走到周边的福州话区谋生。（据原琴江小学校长，67岁的旗下人许辉先生的介绍。）

岛方言是岛民们世代口耳相传的母语，是方言岛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语言社团的最重要标志。每个语言社团，都有维护母语、忠诚母语的言语感情和言语态度，即言语心理。这种言语心理，是在长期的言语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是维系某个语言社团团结合作，相互认同的纽带，具有稳固性和持久性。客家人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正生动地体现了这种言语心理。方言岛的居民，在上述言语心理的支配下，对内坚持使用岛方言，客观上起到联络乡谊、增强内部凝聚力的作用。但是，这种言语心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极端的表现如福建省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据了解，当地闽南人地方、宗族观念很重，过去一般不与顺昌人通婚，后来虽然通婚了，但在语言观念上仍相当保守，家族中严格保持闽南话，一般不许说顺昌话……”<sup>⑧</sup>然而，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年轻一代的岛民，出于现实交际的功用，不是很注重维护岛方言的使用，有些人已基本放弃岛方言而改说包围方言了。

即使岛方言与包围方言是两种系属相同而且

可以相互通话的方言，有时在方言岛中也形成双方言并存并用的格局。如山东青州市北城满族村是个北京官话方言岛，岛方言与包围方言青州话同属北方方言系统，可相互通话。但是，“北城满族的语言使用现在普遍为双方言制：在北城内部或北城人之间，使用北城话；与当地汉族交往时使用当地青州方言。”<sup>⑨</sup>类似的还有上述黑龙江的站话方言岛。

逐渐缩小范围以至最终消亡，是大多数方言岛的共同趋势。在方言岛内，各个角落双方言交际的状况是各不相同的。与包围方言直接相接的那些地方，双方言交际以包围方言为主，以岛方言为辅，岛方言的主要使用者是老年人。经过一段时期，随着这批使用岛方言的老年人的死亡，这里将完全被包围方言“侵占”，方言岛的势力范围向内退缩；与包围方言相距较远的方言岛中心地带，双方言交际以岛方言为主，以包围方言为辅。但随着包围方言的步步进逼，方言岛的中心地带也必将被蚕食，方言岛最终沉没在包围方言之中。闽侯县青口镇茱萸洋村，历史上曾经是个自称为“汀州话”的客家方言岛。时至今日，全村就剩下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还会说“汀州话”。可以想象，再过几年，这个客家方言岛将不复存在。

### 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

在方言岛中，由于岛方言和包围方言在岛民们的言语能力中共存，岛民们根据交际的需要转换使用两种方言，这样，一种方言的成分就会悄悄渗入另一种方言而成为变异成分。如果这些变异成分受到其他岛民的模仿，并在方言岛中扩散开来，那么，一种方言也就实现了对另一种方言某个方面的影响。观察表明，在方言岛中，岛方言与包围方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平衡的，即岛方言一般总是受到包围方言的影响，而包围方言因为大都是人口多，势力大的强势方言，它所受岛方言的影响往往是不明显的。在闽侯县西台村闽南方言岛，岛方言“下南话”所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闽南—闽东的混合型方言，而岛内所说的福州话与周边的福州话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不同的方言岛，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不相同的。戈尔龙在《论语言与方言相互影响的类型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将借用

和融合看作语言或方言相互影响的两种类型<sup>⑩</sup>，是非常有见地的。岛方言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轻微的仅限于部分词语及某些语音、语法形式的借用，深刻的则可能引起方言的融合，甚至导致方言基本属性的改变。

南平的北方方言岛，岛方言“土官话”几百年来处在闽方言的包围之中，借用闽方言的语词，出现了闽方言的一些语言特点，如没有轻唇音声母 [f]，[is] 与 [ish] 两组声母不分，[-n] 尾韵与 [-ŋ] 尾韵合流（闽北、闽中特点），但还保留北方方言的基本特征。可见，岛方言“土官话”所受包围方言的影响是轻微的；闽侯县西台村的闽南方言岛“下南话”，几百年来在福州话的严重侵袭下，虽然还保留闽南话的一些基本语词的语音特点，但已融入了大量的福州话特点，如阳声韵收 [-ŋ]，入声韵收 [-ʔ] 及声母类化，还借用了大量的福州话语词。所以，今天的“下南话”与本土的闽南话已难于通话，它实际上已成为闽南——闽东的一种混合方言。类似“下南话”的还有闽西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是“赣方言和客家方言混合的一种方言。”<sup>⑪</sup>

岛方言因接受包围方言的影响，也可能发生基本属性的转变。临安（今杭州）在两宋之际屡遭战火，人口下降甚多。建炎元年（1127年），宋王朝从汴梁（今开封）迁都临安，大量将相臣僚及下层百姓随驾移居临安。（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3）他们操的仍旧是从中州带来的汴梁官话，它成为吴语区中的一个北方方言岛。然而，时至今天，杭州话虽还保留着北方话的某些特点，但已基本转变成一个吴方言了。

在方言岛内，岛方言老派与新派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老派保留了该方言早些时候的面貌，而新派则体现了该方言几十年来在包围方言影响下的新发展。岛方言新、老派的共时差异，正透露了岛方言在包围方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

据李如龙、陈章太先生的研究，宁德碗窑闽南方言岛，老派有70个韵母，而新派只有53个

韵母。新、老派在韵母方面的差异，一是韵类的合并，二是韵值的变化。体现了碗窑话几十年来在闽东方言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

词汇是岛方言新、老派差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总体而言，新派比老派更多地放弃本方言原来的说法而改用包围方言的说法。所以，老派仍在坚持使用的一些方言词，新派已经少说或根本就不说。闽侯闽南方言岛“下南话”，老派更多地保留闽南话的词语，如火金姑（萤火虫）、胡蝇（苍蝇）、烧水（热火）、龙眼（桂圆）、巷（胡同）、爸妈（父母）、姊（姐姐）等，而新派则改用福州话的说法，即蓝尾星、菩蝇、汤、宝丸、弄、爸妈、依姐等，从而构成新、老派的词汇差异。这种词汇差异，也体现了岛方言“下南话”不断接受包围方言福州话的影响、渗透的事实。

①⑥ 崔荣昌《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

② 黄谷甘、李如龙《海南岛的迈话——一种混合型的方言》，《中国语文》1987年第4期。

③ 游汝杰《黑龙江的站人和站话述略》，《方言》1993年第2期。

④ 李如龙、陈章太《碗窑闽南方言岛二百多年间的变化》，《中国语文》1982年第5期。

⑤ 《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⑦ 李如龙《福鼎县澳腰莆田方言岛》，《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⑧ 陈章太《顺昌县埔上闽南方言岛》，《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⑨ 张树铮《山东青州北城满族所保留的北京官话方言岛记略》，《中国语文》1995年第1期。

⑩ 转引自伍铁平《论语言的融合与社团方言》，《外国语》1983年第6期。

⑪ 梁玉璋《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话”》，《方言》1990年第3期。

作者单位：韶关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 Tamão 与西草湾

□赵立人

葡萄牙文献称葡人入居浪白和澳门之前在广东的贸易据点为 Tamão 岛,并谓 Tamão 为中文译音。但其具体位置,则模糊不清,从 19 世纪初期至今,先后出现 8 种说法,即“上川说”、“下川说”、“屯门岛说”、“顺德大茅说”、“浙江大茅山说”、“伶仃说”、“舵尾说”和“大屿山说”。①

上述各说中,“顺德大茅说”、“浙江大茅山说”、“舵尾说”实际上均仅以对音为依据,以为 Tamão 之对音为“大茅”、“塔妙”之类,实则大谬不然,因为葡文的拼音规则,与英文颇有差异,Tamão 之中文对音应作“大曼”、“塔曼”、“大芒”之类,故以错误的对音为依据的以上三说(此外还有汤开健先生文中提到的“大澳”)均可否定。

伶仃说,是布拉伽在否定了传统的“上川说”之后提出的。然而,他之否定“上川说”,既未能提出确据,而其肯定为伶仃岛,更是连起码的论证都没有,仅以“葡人所称的 Tamão,很可能就是伶仃岛”一语含糊了事。②此说之不足取,一目了然,故国内学者从无采信者。虽然此说在西方史学界已取代“上川说”成为“定论”,但实无学术价值。

“屯门岛说”有一定的文献依据。

明代张燮《东西洋考》卷五“吕宋”条引《广东通志》记:“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1517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铙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无会典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铙自固。……海道副使汪铨帅兵至,犹据险逆战。商人凿舟用策,乃悉擒之,余皆遁去。”然南头寨当时为明军驻防重镇,葡人不可能直接在此建立据点。汪铨战前曾赋诗一首,题为《驻节南头喜乡耆吴瑗郑志锐画攻屯门彝之策赋此》。③战后,有陈文辅《都宪汪公遗爱祠记》谓:“海之关隘,实在屯门澳口,而南头则切近之。……近于正德改

元,忽有不隶贡数恶夷,号为佛郎机者,与诸狡獪杂屯门、葵涌等处海澳,设立营寨,大造火铙为攻战具。占据海岛,杀人抢船,势甚猖獗。虎视海隅,志在吞并。图形立石,管辖诸番。脍炙生人,以充帝食。……事闻于公,赫然震怒,命将出师,亲临敌所,冒犯矢石。……召募海舟,指授方略,皆有成算。诸番舶大而难动,欲举必赖风帆。时南风急甚,公命刷贼蔽舟,多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舶及火舟,通被焚溺。命众鼓噪而登,遂大胜之,无孑遗。是役也,于正德辛巳(十六年,1521年)出师,至嘉靖壬午(元年,1522年)凯还。”④稍后,祁郑《重建汪公生祠记》又谓:“邑岸翟中立、乡耆郑志锐、吴瑗谓郑受知于公,俾记其成。中立曰:‘屯门旧为番舶所萃,正德丁丑(十二年,1517年),西番佛郎机假以修贡,扰我边圉(下略)。”志锐曰:‘公为总制(下略)。”瑗曰:‘屯门临不测之海,风涛险恶,寇恃火炮为长技,虐焰张甚(下略)。”⑤以上三则,均为当事人的记述,可证屯门明代曾是“番舶所萃”的贸易港口,屯门、葵涌(今均属香港新界)及其附近海岛曾为葡人窃据。汪铨驻节南头(今属深圳市),于 1521 年出师,1522 年一举歼敌。《新安县志》又记:“九迳山在县南四十里,下临屯门澳。明海道汪铨帅土人歼佛郎机于此。”⑥按万历元年(1573 年),始划东莞县南部地区,另立新安县,可见明代葡人曾窃据东莞屯门,实信而有征。

于是藤田丰八、张天泽、张维华等,遂指 Tamão 为东莞之“屯门岛”,此后,这个子虚乌有的“屯门岛”,就经常出现在国内有关著述中,也被视为定论了。然而明正德、嘉靖时东莞固然有屯门,但却是大陆地方,而从无所谓“屯门岛”,故此说亦误。至于林天蔚修正“屯门岛说”而提出的“大屿山说”,留待下文讨论。

笔者认为,要解开 Tamão 之谜,必须从中葡文献的对照研究入手。

《明实录·世宗实录》嘉靖二年三月记:“佛郎机国人别都卢寇广东,守臣擒之。初,都卢恃其巨铳利兵,劫掠满刺加诸国,横行海外,至率其属疏世利等千余人,驾舟五艘,破巴西国,遂寇新会县西草湾,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思率思师截海御之,转战至稍州,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兵齐进,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被掠男妇十人,获其二舟。余贼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等复率三舟接战,火焚先所获舟。百户王应思死之,余贼亦遁。巡抚都御史张崧、巡抚御史涂敬以闻,都御史覆奏,上命就彼诛戮枭示。”⑦《明史·佛郎机传》所载略同。这里提及的“米儿丁甫思多减儿”,研究者一致认为当即伦斯泰特(Andrew Ljungstedt)《葡萄牙人在华居留地简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和张天泽《中葡通商研究》(Sino - 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中所记由葡王派遣来华的克亨何(Martin Alfonso de Mello Coutinho),“减”为“灭”之讹,是役发生于嘉靖元年(1522年)。由于对音相当吻合,可以排除巧合的可能,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西文资料均记此役发生于 Tamão 一带海域,由此可知 Tamão 应当就在“新会县西草湾”附近。遗憾的是今天的新会并无西草湾,有关西草湾的位置,又可有如下三说。

### 一、新安县大屿山茜草湾

林天蔚认为,“新会县西草湾”实为“新安县西草湾”的笔误,新安县有大屿山,是屯门以南的海岛,当时称为“屯门岛”,大屿山有“茜草湾”,其名至今尚存。“屯门”与 Tamão 音近,可见 Tamão 就是大屿山,“西草湾之役”即爆发于此。⑧

按《新安县志》明言葡人凑杂屯门、葵涌海澳,占据海岛,大屿山既近此两地,水源亦较充足。葡人占为据点,是极可能的。又《新安县志》记葡人“假以修贡”到屯门在 1517 年,明军在此击败葡人,在 1522 年,两点均与西文资料有关 Tamão 的记载吻合,故“大屿山说”值得重视。

但是,万历年(1573年)始有新安县,《世宗实录》虽修于万历年间,但资料来源,则为嘉靖朝档案,修实录者不会因为后来行政区划的变动而擅改前朝的记载。因此,《世宗实录》中绝不可能出现世宗时还没有的新安县,“笔误”之说,不能成立。

可见,“大屿山说”最重要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所谓“大屿山当时称为屯门岛”,也只是想当然而已。故“大屿山说”虽颇有学术价值,不能排除其可能性,但其论证尚不能自圆其说,不宜视为定论。

至于汤开健先生以“翻检明代的文献,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外国商人在大屿山建立贸易点的更多确切证据”来否定“大屿山说”,笔者认为颇可商榷。前引明代文献《重建汪公生祠记》谓“屯门旧为番舶所萃”,所谓“旧”是指葡人到来之前,荟萃于此的番舶既然不为当地人指责,当然就是和平商人,屯门一带,当然就是外国商人的贸易点。退一步说,即使明代文献确无外国人在此经商的记载,也不能以此否定“大屿山说”,因为按此逻辑,则汤先生本人力持的“上、下川说”亦应否定了,理由是明、清两代的中国文献都从未提到上川岛有外商贸易,然而这种贸易的存在却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 二、香山县西草湾

万历九年(1581年)刊行的《苍梧总督军门志》的海图中,明确标出了西草湾,位于磨刀门以南,大小横琴岛和三灶岛以北。同刊于万历年间的郭棐《粤大记》海图则有西草澳,是位于濠镜澳(澳门)以南、亚婆尾(横琴岛东南角)东北的一个海岛,其地当即今之九澳岛或潭仔岛(今均属澳门)。西草湾与西草澳显然连在一起,故大小横琴岛以北之马骝洲水道,及大小横琴岛以东,澳门、潭仔、九澳一线以西水域,亦在西草湾范围之内(大小横琴今已基本相连,统称横琴岛)。

恰在磨刀门以南,大小横琴岛和三灶岛以北,亦即西草湾的中心有一小岛名“大芒洲”,“大芒”与 Tamão,对音相当吻合,则所谓 Tamão,可能就是大芒洲或其邻近岛屿。

西草湾海域,明代为香山县辖境(今属珠海市),《世宗实录》称“新会县西草湾”,或系由于参战者为驻守新会县之防军而致此误。盖克亨何舰队由马六甲开往西草湾,必经新会县海域,当地驻军“截海御之”,而在香山海域爆发激战。然此解释,终不免有勉强之感,故仍不宜视为定论。

### 三、新会县甫草湾

今台山市广海镇有甫草湾,与上川岛隔海相望。按台山市原名新宁县,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由新会县析地而置。不过广海卫在新宁置县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仍隶属于新会。

康熙《新会县志》卷三“事纪”记：“弘治十二年……二月析得行、文章地置新宁县。都御史邓廷瓚奏割得行、文章二都、海晏、埕峒二盐场及望高巡检司置新宁县。广海仓印仍属本县。”“嘉靖十年(1531年)……冬，广海有虎暴，知县张文凤募人搏之。”“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知县陈豪查钱粮，清屯田。县有守御所，因有丰积仓，有广海卫，因有广海仓，皆县贮也。……官军禄饷于是乎出。”

由此可知，在“西草湾之役”爆发的1522年，甫草湾仍为新会县辖地。甫草湾与上川岛隔海相望，而在布拉伽提出“伶仃说”之前，西方史学界依据葡文史料大多肯定 Tamão 港在上川岛上，Tamão 岛即上川岛(个别人认为是下川岛)，<sup>⑨</sup>两者可互相印证，而“甫”、“西”两字，草书形近，因此，很有可能《世宗实录》所谓“新会县西草湾”实为“新会县甫草湾”之误。当然，这个解释也有点勉强。

上川岛西北之港口，名三洲港，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Xavier)之坟墓及纪念教堂，即在三洲港附近之大脑山嘴，至今仍存。《利玛窦中国札记》根据16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史》，记载了沙勿略的行程。其中提到，1551年，“他从日本沿中国海岸到印度的返航途中，曾在上川岛停留；当时，在澳门城兴建以前，上川岛是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贸易地点。”1552年，他为进入中国传教而再到上川，情况依然如此：“上川是一个离中国海岸约三十海里的荒芜岛屿。当时它是葡萄牙人和中国人贸易的所在；只有一片用树枝和稻草胡乱搭成的茅屋。”“中国官方禁止葡萄牙人建造任何种类的坚实房屋，他们的一切建筑都要在他们离开时任其荒废。”沙勿略企图由此进入大陆，未果，1552年病死并埋葬于上川岛面向大陆的贸易港附近。<sup>⑩</sup>显然，这个港口就是三洲港，当时葡萄牙船只停泊于此。

伦斯泰特《葡萄牙人在华居留地简史》记1522年克亨何舰队之役(即“西草湾之役”)谓：“时葡船数艘，向上川之 Tamão 港驶行，中国水兵阻之，抗不受命，后经长时抗御，始行屈服。”<sup>⑪</sup>又谓：“Tamão 在上川岛的西北岸，是个著名的贸易港，外国与中国的商人在此交易；当季风结束时，一切活动终止，恢复死寂，直到下次季风与交易来临时。”<sup>⑫</sup>可见，伦斯泰特所说的 Tamão 港，也就是三洲港。

三洲港所在之小海湾，名大浪湾，Tamão 与“大浪”，读音相当接近，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总之，笔者认为，大屿山说，香山西草湾说(亦可称为“大芒洲说”)、新会甫草湾说(可包含“上川说”和“下川说”，而以前者更为贴切)都各有其理由，然亦皆有不能自圆其说或显得勉强之处，有待继续探讨。而至今尚流行于国内外的“屯门岛”和“伶仃”二说，前者根本不存在，后者基本上是凭空臆断，不宜再视为定论了。至于其他建立在读音错误基础上的“大茅”、“舵尾”、“大澳”之类，就更无足深论了。

①各家说法的具体内容，参阅拙著《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早期活动的地点》，载《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黄启臣：《澳门简史》，第55～56页，澳门历史学会1995年版；汤开健：《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载《学术研究》1995年第6期。

②参阅拙著《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早期活动的地点》。国内学者或以为布拉伽亦主“屯门岛说”，误，见 J. M. Braga, The “Tamão” of the Portuguese Pioneers. Tien Hsia Monthly, Vol. Ⅷ, No. 5. (布拉伽：《葡萄牙先驱者的 Tamão》，《天下》月刊，第8卷第5号)

③④⑤⑥嘉庆《新安县志》，卷24，“艺文”三，卷23，“艺文”二，卷23，“艺文”二，卷4，“山水略·山”。

⑦《明实录·世宗实录》，卷24，第8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亦见于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所引，北京图书馆藏本，但与此略异。

⑧林天蔚：《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迹考》，载《香港前代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⑨参阅拙著《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早期活动的地点》及汤开健：《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

⑩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28～137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⑪译文参考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第17页。

⑫转引自张增信：《十六世纪前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贸易据点》，《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二)，第84页，台北，1986年。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郭林



# 澳珠经济关系及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的使命

## ——第九届澳门社会科学年会暨第八届粤澳关系研讨会综述

(澳门) 黄汉强

1995年9月是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成立十周年。澳门社会科学学会为此举行第九届年会暨第八届粤澳关系研讨会。

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和葡萄牙的30位外地专家学者以及澳门学术界的学者。在开幕仪式上,澳门总督代表、财政暨经济事务政务司贝锡安博士向大会发表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磊教授应邀致辞。出席开幕式的还有澳门基金会主席卢德奇博士、新华社澳门分社代表冼为铿先生,澳门社会科学学会名誉顾问吴荣格先生和崔乐其先生也出席了会议。在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就下面两个专题展开讨论。

### 一、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与澳门的发展

经过连续七届粤澳关系研讨会的讨论,大家对当前澳门经济在转型中遇到的资源短缺、产品成本上升、对外竞争力下降的困难和障碍都有较深刻的了解和共识,因此认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建立对澳门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必须及时把握,积极对待。全国暨广东港澳经济研究会周维平教授在这方面的论述,是颇有代表性的:发展区域经济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粤港澳区域经济是80年代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大潮流中涌现的一颗新星,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快速成长,“港澳因素”对广东经济发展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港澳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广东因素”,港澳和珠江三角洲区域又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的“核心”和“龙头”,改革开放政策与“一国两制”构想的结合,是珠江三角洲率先起飞的奥秘;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澳门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机会,开拓了空间;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对澳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认为应以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契机,加快研究和选择澳门跨世纪的经济发展路向,制订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期规划和确定远景目标,并付诸实施。为此,深入认识和充分发挥澳门的优势,经济发展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对接有重大意义。

与会学者借此对澳门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优势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澳门的主要优势是:

1. 自由港优势。主要是指有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制度和实行自由经济政策。这些制度和政策是: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外汇自由政策,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低税和免税政策,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进出澳门的货物不征收关税。澳门的自由港的优势地位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得到肯定,至少50年不变。此种优势亦随着澳门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加强。

2. 区位优势。澳门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珠江出海口的西岸,背靠大陆面向海洋;澳门又处于亚太区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中央地带。

3. 网络优势。澳门历史上是著名的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今天又是“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一些世界性经济组织和地区性经济组织的成员,作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经贸关系,既有广阔的国际经贸网络,又在这个网络中享有优惠贸易的安排,同时与欧共体建立了特殊“伙伴关系”而受到支持和照顾。

4. 历史文化优势。这是指澳门在400年前已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座重要港口,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形成了澳门今日的中西文化交融的独特文化色彩,整个城市就是一座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历史博物馆。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除了要深刻认识澳门的优势外,还要充分看到澳门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正如暨南大学何佳声教授指出的:第一,澳门是中国与拉丁语系国家经济贸易联系的枢纽;第二,澳门对推进中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具有借鉴作用;第三,澳门为中国组织跨国企业集团的示范基地;第四,澳门为促进东西方高新技术交流,推进内地科技产业化和科技产品走向世界的桥梁;第五,澳门对推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往来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是探求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重要区域。

如何充分利用澳门的优势,发挥澳门的作用?大家认为,首先要克服双重障碍:第一,客观障碍,这是“硬件”问题,即澳门地头细小,资源缺乏,水浅港窄等客观条件。第二,主观障碍,这是“软件”问题,表现有二:一是思想上对优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刻的了解,不是夸大优势盲目乐观就是低估优势妄自菲薄对前景缺乏信心;二是政策上营运上的障碍,主要是政策上的缺乏和营运上的阻滞和效率不高。

与会学者指出,为了克服这双重障碍,就要不断改善澳门的投资环境,包括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加强对发展经济的调查研究,多方采取措施,加大利用优势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将潜在优势,理论优势变为现实优势”。

与会者在讨论发挥优势时注意力都集中在区域合作尤其是澳门同珠海合作上。

北京大学港澳台研究中心徐雅民教授提出,澳门在推行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可以由近及远地分三个层次推进:第一层次,直接毗连的珠海市;第二层次,珠江三角洲地区、广东省;第三层次,由珠江第一大支流(西江)连贯起来的西江流域—桂、黔、滇、川四省区。即是说,推行“珠澳对接与西进战略”。

“澳珠对接”有两层意思。从小区位来看,是澳门经济同珠海对接;从大区位来看,是澳门经济发展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对接。会上着重讨论澳门同珠海的合作互补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两地是“连体双城”,互补性甚强;另一方面,过去的合作不尽如人意。

为了实现珠澳经济对接,与会学者除了提出两地要在工业、贸易、旅游、金融、信息、交通、

基础建设等领域采取积极措施进行全面合作外,还着重提出下列四项具体建议:

一、携手发挥澳门的自由港优势。大家认为,自由港是澳门的特有优势,但是限于资源,澳门却只有自由港的“软件”而“硬件”不足,因此珠海应支持澳门强化自由港优势。广东社会科学院许隆教授提出“珠澳共建自由港”,珠海租出一个海岛给澳门建外港,双方合作经营或者合资经营都可以。亦有论者认为,澳门现有九澳港亦应与珠海高栏港合作,实行优势互补。

二、共建珠港澳大桥,在珠澳间的海区上选择一适当地点,建立一人工岛,作为珠港澳大桥的“三岔口”,东连香港大屿山,西接澳门,北联珠海。这座大桥比珠海拟建的连接香港的伶仃洋大桥更具优势。首先是一桥连三地,效益大;其次连接香港的大屿山,避免伶仃洋大桥连接屯门而加剧当地的交通挤塞,同时亦避免伶仃洋大桥因通过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伶仃岛所造成的困扰;第三,三地受益、三地高兴,合力共建,节省投资;第四,集资容易,收效快。

三、联合开发横琴,建立珠海横琴—澳门路环经济协作区,作为珠澳合作的突破口。广东省社科联与澳门社科学会于1990年联合提出了珠澳联合开发横琴,建立横琴保护区的建议,早已获得支持,在这个基础上,珠海市经济学会田忠敏先生于去年在澳(门)佛(山)经济关系研讨会上又提出了建立横琴—路环经济协作区的设想,反应亦佳。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旧案重提外,还有提出开放横琴,在横琴实行澳门政策或在横琴实行社会主义自由港制度等多项主张。经过讨论,一般都支持建立横琴路环经济协作区,以此为突破口,加强珠澳两地合作;办法是以珠促澳,首先争取建好横琴—路环大桥。

四、成立沟通和协调组织,促进合作。这个组织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半官方的,也可以是民间的。除两地学者参加外,还要有两地的工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定期聚会。

与会者对澳门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卢桂源副主任的建议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建议澳门发展经济:第一,充分发挥自由港功能,把商贸搞活;第二,努力提高生产水平;第三,继续发展具有澳门特色的博彩旅游业;第四,继续改善软硬投资环境;第

五,着力开拓金融、证券市场。此外,亦有人以珠海、深圳的发展为例,建议澳门实行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政策,以吸引投资。

## 二、澳门社会发展与社会科学研究

关于这个专题,内地学者多从我国社会发展与改革论证社会科学的功能,澳门学者则结合澳门的实践,介绍了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大势。

社会科学就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其目的不仅仅是认识社会现象,而是透过研究社会现象,寻找和阐明其内在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性。因此,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有四大功能,即认识功能、导向功能、经济功能和决策功能,“要在现代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全面地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这些功能。

在发挥社会科学的功能问题上,张磊教授指出,当前有两种不足取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自我感觉良好’,对剧变的现实生活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未能理解‘左’的教条主义流毒尚需进一步肃清,……于是我行我素,固步自封,难免沦于保守、僵化。另一种倾向则似乎相反,要求‘总体反思’和‘彻底抛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专业人员‘下海’,让社会科学‘进入’市场”。因此他强调必须确认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根本方针,以此推进社会科学的改革。

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广东省社会科学大学张江明教授强调社会发展与人类发展是互相联系、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因此,“研究社会发展与人类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学课题,也是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现实性。”

澳门学者在研讨中对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了回顾,指出澳门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集中以澳门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在80年代中期兴起的,这是澳门历史发展的必然。澳门70年代以后开始的经济腾飞,带动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被誉为“亚洲瑰宝”。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推行,澳门又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桥梁”。1987年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澳门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到21世纪前夕,澳门便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正是这种历史的大势,触发了澳门人研究澳门的学术活动。1985年9月1日,以“研究社会,服务澳门”为宗旨的澳门社会科学学会

便应运而生。可以说,这是澳门当代社会科学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澳门大学前身的东亚大学,亦于“中葡联合声明”签署两个月后开办澳门研究所(后改为澳门研究中心),其宗旨是“立足澳门,研究澳门社会,为澳门的安定、繁荣和发展服务”。社会科学研究亦从民间学术团体提升到高等学府的层面。此后,澳门各类不同学科的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填补了法律、经济、历史、文化、教育、语言、哲学、社会、公共行政等领域的空白。社会科学学会10年前设想的成立按学科分类的小组或分会,实际上已由这些新团体所取代、实现和发展。

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除了受到人才和研究资源的限制外,开始之时很多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而且普遍不受社会重视。社会科学学会为借助外力,首先同内地研究澳门的机构和专家建立广泛的联系,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发展同香港、台湾、日本、东南亚、葡国、欧洲、美国等学者的学术往来,邀请他们来澳门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澳门社会科学的兴起和发展有以下特点:

1. 虽然起步晚,但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而且明确是为澳门社会服务,具有强烈的自觉性、目的性和时代感。
2. 专注对澳门的社会现象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焦点对准澳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实践性。
3. 民间学术研究为主,不受官方及政治因素的约束,学术自由原则得以发挥,同时重视同外界交流,学术思想活跃。

亦有学者指出,澳门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还存在困难和不足。人才和资源缺乏,社会重视不够仍然是个障碍;研究质素和学术水平有待提高;有的研究领域如文化、社会等仍然薄弱;有的研究课题缺乏实际调查和微观的分析;不少学科的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

在讨论会上还有学者对粤澳两地学术交流合作提出了建议,要求改进交流的方式,开拓交流新空间,注入新活力等,都是值得思考和改进的。

作者系澳门社会科学学会监事长  
责任编辑:郭林

# 美国刊物上的中国改革开放

□梅仁毅

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世界的关注,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美国刊物上有什么反映呢?笔者对美国三家销路较广的刊物《时代》(Time)、《新闻周刊》(Newsweek)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近三年(1992-1994年)的报导作了一翻调查,并进一步对四份学术刊物《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亚洲研究》(Asia Survey)及《当代历史》(Current History)同一时期有关中国的文章作了调查、比较。所以选择

1992—1994年,是因为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并发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号召,中国开始了又一高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阶段的报导与分析,可以反映国外,特别是美国的新闻媒介及学术、政界人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看法与分析。

—

我们常说中国的开放“世界瞩目”,“受到广泛赞扬”,那末,美国刊物的报导实际是什么呢?以每年刊登的篇数为例:

1992年:

	中国	日本	印度	前苏联	中东	波黑	南非	排列名次
时代	29	21	9	39	26	25	11	2
新闻周刊	24	48	12	60	38	31	16	5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0	14	2	50	23	13	10	5

1993年:

	中国	日本	印度	前苏联	中东	波黑	南非	排列名次
时代	52	23	13	31	34	28	11	1
新闻周刊	39	65	20	57	41	51	21	5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3	13	1	52	26	28	12	4

1994年:

	中国	日本	印度	前苏联	中东	波黑	南非	排列名次
时代	30	24	11	32	41	25	23	3
新闻周刊	55	50	10	44	43	35	27	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9	15	2	32	42	23	14	4

统计数字表明,有关中国的报导的数量,在三家刊物中,只是偶尔居于首位,

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新闻的焦点，在《时代周刊》的报导中：

1992年中国名列第二居于前苏联之后；

1993年居首位；

1994年名列第三，居于中东及前苏联之后。

在《新闻周刊》的报导中，1992年中国居于第五位，在前苏联、日本、中东及波黑之后；

1993年居于第五位，在日本、前苏联、波黑及中东之后；

1994年居首位。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文章中，1992年有关中国的报导居于第五位，在前苏联、中东、日本、波黑之后，与有关南非的报导数量相同；

1993年居于第四位，在前苏联、波黑及中东之后；

1994年居于第四位，在中东、前苏联及波黑之后。

也就是说，在九年刊物的报导数量中，只有两年刊物有关中国的报导居于有关对美国之外的报导之首，占22%，而有关中国经济的报导，则只占对中国报导的1/2左右。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时代	29	8	27.58%	52	25	48%	30	12	40%
新闻周刊	24	10	41.67%	39	25	64.1%	55	23	41.8%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0	4	40%	13	6	46.15%	19	9	47%
合计	63	22	34.92%	104	56	53.85%	104	44	42.3%

这些数字说明了几个问题：

1. 中国的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并不是这三家刊物编辑们关注的重点。理由很简单，经济发展并不能成为吸引读者的“新闻”，因为它缺乏“轰动性”。

2. 既使有关中国的报导，经济方面的报导也不是占压倒多数。这说明刊物编辑、记者关注中国的其他问题，特别是人权问题

和领导班子问题，1993年经济方面的报导超过50%，究其原因是对两大问题的关注：最惠国待遇问题及整顿金融秩序问题。这两方面的文章约占有关经济方面报导的40%。

3. 四家学术刊物关于中国的报导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分析：

1992-1994年发表文章的篇数及论述的地区：

	中国	日本	亚洲其他国家	前苏联	欧洲	中东	排列名次
外交季刊	11	8	17	25	26	18	5
外交政策	6	4	8	16	19	11	5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合计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有美国 中的报 导	其关于 关经方 于济面	百分比
四家学术刊物	26	9	34.6%	24	6	25%	32	11	34.38%	82	26	31.7%

学者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在《外交季刊》与《外交政策》上，从篇数讲，只占地区性文章的第五位，而有关中国的文章中，经济方面的只占四家刊物的1/3，这也说明中国经济问题还不是刊物关注的焦点。

4. 这些情况使我们看到，不能因为出现了几篇赞扬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导，就笼统地说世界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要从刊物报导的整体、全局来进行分析。此外，第三世界某几家报纸刊物的重视，也不等于西方报刊的重视，更不能说是世界的重视，只有这样看问题，头脑才能清醒。

## 二

在有关经济的报导中，三家新闻刊物关注的是哪些问题呢？

单位：篇

	时代			新闻周刊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		
	1992	1993	1994	1992	1993	1994	1992	1993	1994
南巡	2			2			2		
经济综述	1	7	2	1	8	3		1	1
金融治理		4		5				1	
农业		2	1		3	2			
流动人口			2			3			
最惠国待遇		3	2			4			5
高科技			1		1	3		1	
证券市场	1	2	1	3	1				
知识产权		1	1	1					
边贸				1		2	1		
反腐		2		1	1				
地方发展	2			1		2	2	3	

1.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南巡讲话，三家刊物都作了分析。

2. 1993年年中，中国开始整顿金融秩序，朱镕基出任中行行长，三家刊物也作了报导，有的还作了多次报导。

3. 最惠国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在1993—1994年报导较多，因为1993年是克林顿就任总统后，头一次就此问题作出决定，在竞选中，克林顿批评布什对待中国手太软，宣称要突出人权问题，因此人

们对克林顿政府的决策十分关注，1993年克林顿把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因此到了1994年，人们就要看美国政府如何动作。

4. 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城市工人失业、半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

5. 对发展较快的广东、上海的报导。

通过这些报导，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的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像呢？

1. 比较客观、全面的报导中国经济情况,肯定成就,基调比较乐观,不超过七家刊物 148 篇文章的 20%。1993 年 5 月 10 日《时代周刊》以“下一个超级大国”为总标题,发表了一组关于中国的专题报导,一共 14 篇长、短文章,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人物、科技、生活、文化、与港、台关系等方面,在“发行人的话”一栏中,朗(Long)谈到了发表专题报导的原由,他写道,这是《时代周刊》北京办事处主任的建议。“席卷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变革浪潮使他相信一般的新闻报导不足以反映事态的规模和重要性,一种震撼地球的变化在出现,需要专题报导来叙述其各个不同的方面。”我们希望进入记者记事本和摄影记者胶卷的东西“会使我们的读者对世界上最重要国家之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有更广泛的了解。”①第一篇文章开头就定下了专题报导的基调:“一个古老、自豪的文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坚决地从其茧缚中摆脱出来,参与到黑格尔所说的‘世界历史’中去,现在已经很清楚,中国造就了一大批关键人物,能成功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并引导他们的祖国取得阳光底下重要的地位……并能与曾经蚕食中国边沿地带,使帝皇低头的西方列强平起平坐。”文章说重大变化来自邓小平的南方之行,文章讲到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发区的发展、海外华人的投资、证券交易、开放程度等等。当然作者们也承认中国的变化还是零散、有限的,但却是根本的,文章引用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的话:“在经济生活方面,中国人正经历着‘个人自由的巨大扩展’”。文章结束时写道,艾默生称中国为木乃伊,并于 1824 年写道:中国本身就是一座碑。“如果真是这样”,作者们写道,“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②在学术性刊物中,《当代历史》发表了几篇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发展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反映。尽管我们可以不同意作者们对改革开放目的和实质的分析,但我们仍应看到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许多看法是客观的、有根

据的,美国宾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简·普赖比拉 1992 年 9 月的文章“中国的经济动力”的第一部分叙述了外国投资的增长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然后文章分析了这种蓬勃发展的原因:第一,这种发展带有周期性,即发展——收缩——发展;第二,逐步扩大农业中的产权以及非计划私营部门的惊人发展;第三,向世界市场开放,“这种开放”不是“敞开大门”,而是“出口的门开得比进口大”,并且“门也不是永远开着的”。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情况。“这种国内部分自由化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双管经济政策在经济特区首次汇合在一起”。建立经济特区原来的目的是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更为重要的是特区是经济改革的实验室,“尽管经济特区并不是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岛屿,但它们——特别是深圳——却是中国境内最接近市场体系的东西。”文章第四部分是“特区之外”,讲了海南、上海浦东及其他地方的开发区并触及到中国沿海与内地差距拉大的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是“向市场体系过渡”。作者在这一部分谈到了两点,一是“改革开放”使很大数量的人民,主要是南方和东南沿海各省人民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二是“特区经验的传播并不是一种燎原之火的现象,也不是把(特区)加起来,就是连贯一致的全国性的、地区性甚至全省性的市场体系”,不能把“仍然是整体中的部分当成整体”。作者最后认为 1989 年东欧与前苏联的经验表明,市场体系的建立需要一个自由选举的、主张市场经济的政府,经验也表明“……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或劳动者管理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些半截子的努力都不能长远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也许会更糟”。因此结论是:“中国要过渡到市场体系,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放弃或使其放弃独掌政权。”③美国《外交季刊》1993 年第五期发表了前《纽约时报》北京办事处主任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的文章“中国的兴起”。文章不仅涉及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涉及中国的军费增长、环境污染以及在国际上

的政治抱负，文章的基调是客观的、理解的，在许多方面是为中国说话，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兴起，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是下一世纪世界最重要的趋势。”历史上中国比西方更发达、更繁荣、更先进、更文明。只是在近五百年，欧洲才发展起来。到了19世纪，我们才认为中国的落后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现在已走上了可能恢复过去那种宏伟的道路”。文章认为如果从世界贸易、市场规模、单纯的经济大小来看，中国应是美、日、欧共同体之外的第四极，如果从大陆、港、台合在一起的“大中华”来看，其重要性则更明显，作者认为1992年以来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这种速度是过热的，是很危险的，”因此，“经济在明年或更长一点时间里，要降温，”但即使如此“中国经济仍保留足够的发展动力”。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政治稳定，全球贸易体系继续向其出口开放，中国可以在年增长率7%或8%的基础上“至少发展几十年”。如果年增长率为8%，那末每21年其经济规模就会翻五番。作者接着对中国发展的环境的代价表示忧虑，特别是中国官员表示不会为了环境而牺牲经济增长，作者认为有一种处处指责中国的趋势，这是不公平的，作者写道：“中国所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很自然，甚至其领土及军事上的抱负也是合理的。”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要求，总的来说，是“相当合理的”。作者提出对待中国的第一步应是“了解它为何如此行事”并“确认我们之间的分歧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在利益方面还是观念方面”。他认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就是国际社会如何对待、适应新兴强国抱负，如果中国的经济奇迹能持续下去，那末这种调整将是国际社会今后几十年最重要的——也许是最危险的——任务之一。<sup>④</sup>

2. 但约占总数一半的报导，则是负面大于正面。这类文章或是集中讲述问题的严重性，或是表明由于体制问题，问题解决无望，前途未卜，或是二者兼而有之。

新闻刊物的文章，由于报导性强，较

多涉及经济生活中的严重问题。《时代周刊》1994年9月26日的文章“过热，不舒服”主要讲了中国城市中的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的原因，文章一开头引了北京一位数学家对物价上涨的抱怨：“我甚至买不起质量好一点的蔬菜，而其他一些人在吃龙虾和螃蟹，政府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文章接着讲了通货膨胀的情况，并指出原因有二：一是对大批的亏损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补贴，这要印钞票；二是各省、各大城市无视中央的调控政策，继续在高速往前发展，文章最后说：“目前，危险也许尚未达到危机程度，但很快就可能达到这个程度”。“通货膨胀的最大源泉是政权本身，只要政府继续垫付工资，过多提供信贷，过多发行货币，容忍对房地产项目的疯狂投机，那末就不是检验自由市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构成问题。”<sup>⑤</sup>《新闻周刊》则早在3月21日就刊登文章谈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中国的经济正以危险的高速度在发展，增长为13%，而过去两年一直是以两位数在增长，通货膨胀已达到天安门事件以来的最高点。外贸逆差是1985年以来最严重的，预算赤字接近国民总收入的8%，经济规律表明这一切最终都要结束，问题关键在于这种着陆究竟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情况今年就要见分晓”。文章接着描叙了国有企业的困境，指出这些工厂构成“中国的社会安全网；这就使关闭工厂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不仅不能关，还要继续提供补贴，因此，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一大难题，另一大难题是银行业的改革，第三个难题是税制改革，文章写道：伦敦战略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杰拉尔德·西格尔认为“北京没有能力在内陆强制建立财务秩序，这种无能为力已达到危险境地”。文章的结束语是：“目前看来，中国看上去像是一个几乎失控的国家——并在走向经济崩溃，这是可怕的前景。”<sup>⑥</sup>在同年12月19日的又一篇文章中，通货膨胀再次是报导的主题。文章写道，“今天，官方十分担心这种危险：高通货膨胀把市场改革的成就一扫



而光并制造上百万愤怒的工人。”但同时“保证工人平静”、“使农民高兴”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制止通货膨胀与这首要的任务有时又是矛盾的，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需要有更好的工具来对付通货膨胀”。而目前这点无法解决。<sup>⑦</sup>这几篇报导通货膨胀的文章所叙述的情况都是事实，许多分析也不无道理，但其结论都是让人感到解决无望，前途渺茫。而一些学术刊物上的文章，其基调则更趋于否定和悲观。最典型的是《外交季刊》1994年第三期理查德·昂内克的文章“戳破中国的泡沫”。作者在文章中批驳了用东亚四小龙的经验来观测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是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强调财政及货币稳定，而中国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仍然一团糟。作者写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短命的，是建立在游资基础上的。”因此他把中国的经济称作“泡沫经济”。尽管有的中国官员把经济上的这种混乱看作成熟过程的一部分，大陆一些更有经验的投资者宁可向国外投资。中国大量的资金外流恰恰发生在国内急需资金的时候，这使情况更为严重，资金缺乏，其结果是就业机会少。大批农村劳力外流，城市失业人口增加，这孕育着危机。作者接着谈到中国的开放，他认为中国人民的开放是最大的变化，这种开放性表现在各个方面，开放意味着政治控制削弱，意味着中央政府控制的削弱，文章最后一部分谈到了用人问题，作者的结论是“只要中国的统治者坚持完全的政治控制，他们就永远把忠诚放在精明能干之上。只要情况不变，鉴于其现在的政治体制，就很难说邻国经济上的成功会在中国重现”。<sup>⑧</sup>另一篇更为突出的是《外交政策》1995年夏季号上刊登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教授杰克·戈德斯通的文章，“中国即将到来的崩溃。”作者认为“中国今天面临着从人口增长、农业及国营工业生产能力衰退到失业扩大等一系列矛盾，这些压力很快就会使经济和政治矛盾达到爆发程度”。作者预言中国决定性的危机将在今后10到15

年内出现，而中国的前景则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历史的重演。<sup>⑨</sup>

### 三

美国的记者、编辑及专家们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1. 受1989年事件的影响。如果我们将1992—1994年的报导与这些刊物80年代中期的报导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基调有比较大的变化。这并不是因为近几年的经济情况比80年代糟。恰恰相反，这几年发展的速度、变化的广度与深度、改革的力度都大于80年代，究其原因，1989年的事件影响了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客观性，他们有一种相当牢固的看法：对现在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存有怀疑，认为中国人民不支持政府，政府害怕人民，失去对全局的控制，这种观点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强烈，这也就是为什么“学术刊物”上有关中国的文章基调趋于否定的比例很大，在分析通货膨胀、失业、人口流动以及改革开放的目的时，这种看法反复出现。

2. 把经济与接班人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接班人问题尚未解决，中国今后几年政治前途未定，因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部门主义、缺乏全局观念、地方保护主义等现象，统统解释为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对政局缺乏信心的表现，使一些经济现象政治化。

3. 对中国的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人民的心态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人们对物价上涨过快、分配不均的抱怨，失业、半失业工人的不满，这些都是事实，但是还有更深一层的情况，那就是中国人民拥护改革开放，不愿意再过改革开放前的那种生活，而且也确有不少人这几年生活有较大改善，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再加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忍”性，追求和谐、平稳的社会等等，也保证了社会不易出现分裂、内战。

4. 西方新闻观点的影响。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等等一般成不了新闻，也吸引不了读者，权力之争、泡沫爆炸、人民上街这些才能成为新闻、吸引读者。这就决定

了寻找黑暗面，暴露问题，成了新闻报导的主线，即使在一些基调比较肯定的文章中，讲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5. 价值观念的不同，使这些记者、分析家认为没有多元化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难以成功；没有彻底的私有化，经济改革也难以成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许多人才断言中国改革开放是短命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末，研究外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报导、分析，有什么实际价值呢？我认为至少有下列三个作用：

1. 通过这些报导，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对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这对决策是有好处。譬如从1993年初开始，三家新闻刊物对经济过热就有报导，他们提出的问题：房地产炒得过热、中央银行的作用、信贷过度等与我们后来整顿金融秩序所抓的问题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些记者抓问题还是抓得比较准的，又譬如，在报导中，记者们多次提到国有企业的效益问题、人浮于事，但精简人员又会造成失业、造成社会问题等等。这也是符合实际的，是我们在改革中面临的一大难题。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报导对我们会有启发作用，有些问题能引起我们的重视。

2. 对我们了解西方关注的是那些问题有帮助，这有利于我们在对外宣传中有的放矢，起到实际效果。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宣传中，我行我素，照搬国内宣传的一套，无的放矢，收效甚微。研究一下西方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他们关心的是那些问题，这样，我们的宣传目的性才比较强。例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2年8月3日发表了一篇报导大寨的文章，说大寨仍坚持走毛泽东的路，不少人访问大寨，认为大寨仍是典范。如果我们在此文的基础上，作一些追踪报导，反映大寨经济上的变化，人们思想上的变化，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不是很有意义吗？又

如在《外交政策》1995年夏季号那篇认为中国即将崩溃的文章之后，《外交政策》刊登了黄亚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驳了戈德斯通的断言，如果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也能组织一两篇，发表在同一杂志上，不是很有价值吗？

3. 新闻媒体的报导，不管如何客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念。美国媒介的文章，是研究美国在宣传报导中价值观念反映的现实素材。充分利用这种素材，有助于对东、西方价值观念及文化差异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他们为何这么看，而不是简单地贬为错误宣传、反动宣传，这样，对人、对事都能有较客观的分析，而不会流于简单化，不是正面就是反面，不是赞扬就是反对，把握住这种差异，就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加深相互了解，跨越历史文化的鸿沟。

---

① From the Publisher by Elizabeth Vaele Long, (Time, May 10, 1993)

② China: The World's Next……Superpower by James Walsh (Time, May 10, 1993, P15 - P19)

③ China's Economic Dynamis by Jan Prybyla (Current History, Sept. 1992, P262 - P267)

④ The Rise of China by Nicholas D. Kristof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1993, P59 - P74)

⑤ Too Hot for Comfort by James Walsh (Time, Sept. 26, 1994, P29)

⑥ A Make - or - Break Year by George Webrfritz (Newsweek, March 21, 1994, P9-P12)

⑦ Hoping and Praying by Steven Strasser (Newsweek, Dec. 19, 1994, P34 - P35)

⑧ Bursting China's Bubble by Richard Hornik (Foreign Affairs, Vol. 13, No. 3 1994, P28 - P42)

⑨ The Coming Chinese Collapse by Jack A. Goldston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5, NO. 99, P35 - P52)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童 轩**

# 注重基础与现代化转向

## ——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述评

□陶原珂

1995年12月23日,两年一次的国际粤方言研讨会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有80余人参加的第五届大型研讨会,会上宣读论文60余篇,展示了这种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汉语方言具有国际性的研究价值。

本次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整体看来,粤方言研究呈现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两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前者与电脑技术的应用或粤方言的教学密切相关,如香港蔺荪、洗景炬、邹嘉彦、郑定欧的《电脑辅助粤语速记方案》,就是在综合考虑粤方言音素系统与电脑键位合理安排的基础上,为法庭应用电脑辅助速记机实现粤方言速记而设计的;泰国包睿舜的《利用电脑化声谱仪 WINCECIL(软件)测量广州话调值》,通过调值的频谱记录来确定广州粤语阴上调的调值为25(而不是一般认为的35),进而推测广州的普通话对粤港两地粤语音调变化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美国林柏松则介绍了《广州话语音入门》利用IBM486多媒体电脑,进行粤语语音教学的、具有语音练习和校正功能的电脑程序。饶秉才、陈佩瑜推出的《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电脑教材》则是一套教学软件,以对比教学的方法,介绍粤方言和普通话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及词汇、语法的差异和各自的特点,并融入汉字偏旁类推的方式讲解普通话字音;曾子凡的《词语对译及其教学》则是运用较新的翻译理论,从教学需要出发,探析粤方言与普通话词语对译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问题;美国梁启昌的《从交际性教学原则谈几部海外常用的对外粤语教材》,则在评论中引入了语言交际教学法的思想。这些应用性的研究体现了方言研究的现代化趋向。

粤方言基础研究,在语音方面成绩尤为突出,大面积的田野调查继续有所拓展,继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成果之后,广州詹伯慧、邵宜、伍魏等又推出了新成果《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语音和广州语音比较》,另外,黄谷甘《粤语四九(佛冈)语的音系及其特点》、广西刘村汉《桂南平话——粤方言的一个分

支》、台山黄剑云《粤语系统中的台山方言》则分别描述了各自所在地区粤语变体系统音变的情况。就某个语音方面作更细致深入的研究,则有李如龙的《广州话常用词里的几种字音变读》,发掘出粤语中具有存古、同化、合音、类推别义和避讳等各种表现或功用的广州话字音变读;天津石峰《香港粤语的语调格局》,则考察了香港粤语快、中、慢速度不同句式的基本语调格局,对粤语教学有一定的应用价值;香港林建平的《香港粤语∅-ŋ变异研究》和广州何妙娣的《声母n-在香港年青人中的使用情况》,则分别对香港粤语中几个声母的变异分别作了社会分层描述,反映了现时香港粤语不同于广州粤语的语音变异发展。

粤语保留着较多古代汉语的成分,因此,另有一部分学者努力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勾通现代粤语诸变体与汉语古音的联系。如北京张振兴、张惠英的《广州话音系的分析和处理》从粤语和周围方言的历史联系的实际出发,重新探讨在广州话音系描述中声母、韵母的分析配置问题;广州麦耘《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比较了广府、高阳、钦廉、邕潯、勾漏、吴化和四邑诸片粤语次方言之间精组字的不同读法,证实粤语 \*tθ 和 \*θ 等声母的存在体现了它在形成期受到岭南土著民族语言的重大影响;罗伟豪的《中古全浊上声与现今广州话声调》,从《广韵》全浊声母的187个小韵中选取常用字加以比较,分析出他们在广州话中的变化规律;张晓山的《广宁话的h声母》,则通过分析粤语广宁话中298个带h声母的字与石声母逐一比较,以探讨广宁话h声母的形成;广西杨桢海的《广西粤语古心母字今读》,通过比较汉语古心母字今天在广西各地的不同读音,勾通各点粤语变体之间历史变化的内在联系;台湾吴叠彬《粤语 oe、oeng、oek 韵的演化》从广州话与周围方言的比较中,推求粤语音的演化过程,从而建立起粤音各地方变体的历史联系;澳门陈伯辉的《粤方言音系的特点与考本字的联系》则讨论粤语音变

的种种手段与考释本字的联系;广州何伟棠的《从汉语的声调系统说到“入声非声说”之不可取》,从广州话(以及其他南方方言)声调系统和北方部分地点方言的声调系统共同存在舒声和促声两大调类的事实分析,认为我国声调在历史上是从舒促二元调类向舒声一元调类发展,从而论定“入声非声说”(古入声不是调类)不符合事实。这些都是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相结合的成果。

拼写粤语的方式比较繁杂,为了结束目前杂乱不一的拼写状况,近年人们一直在努力设计出比较理想的粤语拼音方案。此次会议,广州高华年、植符兰的《粤语音位与粤语拼音方案》、饶秉才的《修订广州话拼音方案的初步设想》、香港熊怀苑的《成人口语教材编写体系探索——兼谈粤语拼音方案设计》、汕头大学黄大方《港版粤音字典在标音方面的一些问题》,分别提出了他们对以往粤语拼音方案的修正意见,为最终取得共识又迈进了一步。

由于这次会议之前二天已经在华南师大召开了二天有38位专家学者参加的“今日粤语”小型研讨会,有意侧重于粤语语法、词汇方面的研究(占26篇学术发言的80%),因此,在这次紧接着召开的粤方言国际研讨会中,粤语语法、词汇方面的研究占基础研究的比例相对少了一些。其基本特点是以描写为主:或者是在句子结构中描述词语的语义和功能,或者是描写它们在社会环境中的运用情况,而且往往都是与普通话的语法、词汇进行比较而得到说明的。如广州施其生的《广州方言的“量+名”组合》和周小兵的《广州话量词代词的定指功能》不约而同地深入分析了广州量词的定指功能;香港陆镜光《粤语名词组能否带后置修饰语?》则把国内汉语学界一般所说的一类兼语式看作名词组带后置修饰语;广州方小燕的《广州话里的反复问句形式》从未完成体、完成体、持续体、进行体、始续体等体范畴,分类探讨了粤语反复问句的形式变化;甘于恩的《略谈粤语的判断句式 and 判断词》比较深入地探讨了粤语判断句的类型以及使用或不使用判断词的语言条件;高然、张燕祥的《广州话的祈使句》全面描述了广州话祈使句,大别为八类,并且探讨了它们共同具有的表深层结构、句法结构、谓语句结构、否定结构、语气助词、语调结构、言语风格以及特别句式等特点;植符兰的《广州方言的语气词》把粤语的语气词分为肯定、完成、祈使、推测、提醒、轻视、重述、列举和疑问(或反诘)九类逐一分析,并且探讨了语气词连用的情况;潘小洛的《广州话中的强语势》则从语势的崭新角度,探讨了广州

话中“强语势”(emphasis)所采用的词汇、语法和修辞手段;邵慧君的《粤语小称变音与“儿”尾》在前人研究粤语小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入探讨了粤语小称的单纯变调、变调与变韵叠置、“儿”尾的使用,以及它们在粤语各地方变体中的大致分布及其历史来源。

这次会议词语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与社会语言生活联系比较密切。如广州陈慧英的《广州话的称呼语》就主要探讨了家庭以外的社会称呼语的构成、意义和变化、发展;香港钟岭崇的《香港足球比赛广播的运用词汇》按运动员身体不同部位的动作和球体的不同运行方式系统地收集、介绍了香港足球讲解使用的丰富词汇;日本千岛英一和樋口靖的《马来西亚粤语中的借词问题初探》在调查、比较的基础上,介绍了马来西亚粤语中分别来自马来语、英语和闽语不同来源的借词;五邑大学宋兴的《粤方言词流行态势管见》大致描述了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对目前粤方言流行态势的影响,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论述了语言运用与语言规范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广东社科联陶原珂《汉民族共同语语篇中使用粤方言变体的制约因素》则从文字、语义、语法和语境等多个层面系统讨论了共同语语篇对使用粤方言变体的各种制约因素;中山何科根的《粤港澳地区粤方言词语进入共同语书面语的现象》探讨了这种夹杂方言的现象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并对进入共同语书面语的粤方言词语作了分类描述。

除了要注意粤语和普通话的异同之外,研究粤语和其它相关的方言(或语言)的异同和相互影响,也有利于了解粤语的构造和变化发展。此次会议,刘叔新的《粤语壮语关系词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和黎意的《广州话与壮侗语的后修饰成分比较研究》,前者通过对比解决两语的词类区分问题,后者则以对比的方式讨论了广州话和壮侗语修饰句法成分的异同,从而揭示出历史上壮侗语对粤语的影响关系;日本吉川雅之的《粤北粤语和粤北客家话一些共同特征》,通过比较粤北地区两种强势方言的音位系统,整理出在某些地域里粤语和客家话在古喻母字的音值、三等精组与知章两组的分合、咸摄一等韵见系与非见系的分合、咸深二摄韵尾的音值这四个方面的共同特征;海丰谢立群的《从文化角度看海丰话接受粤语的影响》则反映了在闽、客、粤语杂处的海丰由于粤语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操粤语的人已经从宋明时期只有5%发展到今天达60%的方言文化现实。

# 全新的探索

——《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评介

□ 豫 夫

工业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先行一步，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终于以其惊人的速度，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所走的路程，在落后的农村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重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珠江三角洲的巨大成功远远超越了它的地域性，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深远的世界影响；其新工业化之路，对于中国内地乃至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已成为备受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专题探讨这一地区新工业化历程的著述迄今鲜于面世，由林洪任主编，戈晓宇、顾作义任副主编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的理论思考——开辟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工业化道路》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详尽阐述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历史轨迹，全面探讨和总结了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基本经验、特点及其经济学意义的普遍性，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 一、新视野

本书以一种新的视野、多角度、深层次地透视了珠江三角洲实现新工业化的历史轨迹。作者从工业化一般，从实现工业化的模式差异及其效果比较，从新中国“国家型工业化运动”的流产为发端，详细阐述了珠江三角洲工业化模式的个性特征及其巨大效应，作者进而以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的轮辙为主线，笔锋长驱直入，全面论述和探讨了地方政府主导新工业化这一历史选择所具有的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以及建立市场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和全方位对外开放、彻底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对实现新工业化所呈现的“推进”和“拉动”的“合力效应”，从深层次上揭示了珠江三角洲营造现代繁荣的基本经验及“广东之谜”的谜底所在。

## 二、新观点

本书不宥于成说，凭藉珠江三角洲15年来新工业化之旅丰富多彩的伟大实践，以敏锐的理性思考和果敢的理论勇气，对诸如工业化模式，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地位及其职能，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缺陷，思想观念对新工业化的先导作用以及社会主义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等重要问题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新观点。

世界各国登临工业化殿堂的道路各不相同，珠江三角洲新工业所表现的个性和特征表明，它汲取了人类历史上工业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是一次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的工业大飞跃。据此，本书认为，较之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变革，珠江三角洲新工业化之路独辟蹊径，它是以“对人们经济利益的满足为动力，以各种经济成分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机制，以外向型经济为‘火车头’，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一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

在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前景若明若暗的历史关隘，本书把珠江三角洲这条业已腾飞的“社会主义小龙”，放置于变幻莫测的历史长河之中，来求证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通过自身的不断变革和完善得以发展和巩固，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作者在对诸如“公有制”的概念、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内涵等一系列敏感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上都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

“三大差别”、“联合社会个人所有制”等判断和设想也均藉以珠江三角洲的丰富实践作出了新的注脚。比如，作者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已成为本来意义的“有产者”、“资产者”，否则社会财产的真正意义就会被架空，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失去意义。“社会所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是股份合作制。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地推动了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成为新工业成功的“体制载体”。因而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区稳定。

同样，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种种缺陷和弊端，但毕竟是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经济最发达的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本书深入剖析了被认为是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趋向灭亡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足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巨大能量，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被大大弱化；股权社会化和股份合作制取代古典资本主义的纯粹私有制，使资本主义在新的生产方式下获得了新生，并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趋同倾向”，二者可以“一球两制，和平相处，互相借鉴，公平竞争，共同发展”。作者鲜明地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好老师和好学校，闭关自守、拒绝接受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是愚蠢的，而耽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只能是作茧自缚和坐失良机。珠江三角洲的可贵经验，正在于不搞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大胆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 三、新思路

15年的改革开放，珠江三角洲取得了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但是，怎样才能实现珠江三角洲的持续繁荣，实现广东“跨世纪的冲刺”？这是理论界、经济界和各级政府共同思考和探讨的问题。作者提出，广东必须实现奔向现代化的“三三战略”，即：打好三个基础——农业基础，交通、通讯、电力、水利基础，教育、科技基础；实现三个优化——产业结构的优化、人口素质的

优化和生态环境的优化；建立三个机制——市场经济机制、外向型经济运行机制和民主法律的监督、保障机制。

作者还详尽阐述了广东迈向21世纪发展战略的新构思：第一，建立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作者认为，建立珠江三角洲大经济区是关乎广东经济命运的全新战略，唯此，才能形成综合优势，产生 $1+1>2$ 的聚合效应，促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再上新台阶，全面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第二，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走廊和大都会带经济。大珠江三角洲经济走廊由投资与生产走廊、贸易走廊、金融走廊、交通运输走廊、技术信息走廊构成，而珠江三角洲大都会带经济则囊括由广州、珠江三角洲、香港、澳门所构成的都市带，城市数目将超过30个。其中，香港是国际枢纽性特大港口城市，而珠江三角洲则有足够的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产业规模，因此，大珠江三角洲都会带经济将以香港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腹地，形成一体化的经济走廊关系，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智能型的大都会带经济，最终以华南经济圈的形式崛起在世界经济大舞台。第三，率先而有效实行全新的“国民待遇”政策，让市场，让股权，实现产权改革和引进外资的有机结合，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提高。第四，要把民营经济作为珠江三角洲增创辉煌的新支点来大力发展。作者认为，珠江三角洲要走向新的更大繁荣，不仅要在宏观管理上有所突破，而且仍须在体制架构的支撑上找到新的支点。加快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乃是其明智的选择，民营经济不仅是珠江三角洲集体经济改革的最佳取向，而且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再创“经济奇迹”的新的体制支点。为此，作者提出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即通过改造一批、转让一批、租赁一批、拍卖一批这种“大转制、大联合、大拍卖”的方式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重塑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新微观经济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经济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 探索现象学的非理性之路

——评涂成林《现象学的使命》

□魏敦友

现象学曾经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对20世纪西方哲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学术界对现象学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涂成林先生是我国较早致力于现象学研究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他所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论文在我国有相当影响。最近涂先生又推出了他苦心研究现象学的集成之作《现象学的使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版，下引此书，只注页码），给现象学研究园地增添了一页新色。

通读全书，我认为它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高屋建瓴，先得其大。

对现象学内在本质，国内国外一般有两种理解。其一，不少学人把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把现象学理解为非理性主义。这大概是海德格尔造成的印象。其二，一些学者回溯胡塞尔的现象学，试图厘清现象学的理性主义倾向。我以为，问题不在于停留在哪种理解上，而在于必须从现象学的理论本身去寻找自己理解的“根据”，而且关键在于理论上的疏解和说明。涂先生采取的基本上是第一种立场，但涂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高度对现象学的内在逻辑及其展开过程给予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明。他通过缜密的分析后指出，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具有迥异的思辨风格，讨论的主题也各有侧重，但是可以从学理上合乎逻辑地把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再到萨特的现象学

发展理解为一个不断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内在必然过程。

从胡塞尔的先验自我，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再到萨特的自为，一直走向非理性主义，这是现象学的内在逻辑和必然命运。这个结论对于作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框架，而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得出来的，因此，尽管你不一定同意作者的主张，但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研究的学理和逻辑。

第二，分析细腻，探幽阐微。

非理性主义在现象学创始之初并不是明显的，而是潜在的，因此需要通过细致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显示了自己的理论功力。

比如说胡塞尔，如果冒然说他是一个反科学的非理性主义者，一定会激起许多人的反对的，事实上也是这样，国外有，国内也不乏其人。的确，胡塞尔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出身的现象学家，应该说他的哲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色彩，但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胡塞尔现象学决不同于17、18世纪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毋宁说，它对后者持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立场，这一点贯穿在他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的批判之中，正是在这一批判中，一门全新的哲学即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得以出现。作者指出：“先验现象学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是讨论先验自我的构成性问题，胡塞尔正是基于这点把严密科学哲学、现象学本体论以及构成

的现象学三者等同使用”。(第72页)“先验自我及其构成性具有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第73页)“它为现象学本体论向非理性主义蜕变提供了一条内在的脉络。”(第104页)

胡塞尔晚期走向“生活世界”理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否走向非理性主义则颇多讨论。作者通过翔实的分析指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往往成为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理论源泉”。(第119页)这一点是站得住脚的。

至于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和萨特的自在自为本体论中的非理性主义更是在现象学方法的感召之下不断地显露出来。在这方面,作者的分析相当翔实,对各个具体问题的阐释也是有根有据的。

第三,贯彻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现象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发展是紧密相联的,它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性,对这种内在的亲缘性的深刻揭示也构成了《现象学的使命》一书的重要特征。

比如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生活的一个写照。从根本上讲乃是对其所处的时代矛盾困惑的一种回应,无论从其内容还是从其形式都是如此。作者指出:“他接受了科学主义思潮特别是罗素等人的哲学模式,却不能容忍他们对人生

与社会的漠视;他同意叔本华、尼采等人提出的问题,却不敢苟同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非理性主义解决方案”。“这同样决定了胡塞尔现象学本体论的基本思路,以现代数学与逻辑为模式建立严密科学哲学,借助现象学还原方法,确定先验自我的哲学出发点,而后返回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以理性开始而以非理性告终的逻辑历程”。(第29页)这就是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以哲学的方式对他所处的现代西方现实生活采取的一种“说”,这种“说”有自身的逻各斯,然而“所说”正是现实(历史),两者处在辩证的关系之中。再深奥的学问,再晦涩的道理,以此思路来疏解、廓清,也能使人明白一二。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运用于现象学研究,正是本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现象学的使命》一书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学人对现象学这门深奥学问解读的一种方式。也许我们还可采取其他的解读方式,但正如张慎女士在《哲学动态》1995年第6期《现象学研究在中国:从接受到自立》一文所评价的:“它的出版对于促使中国现象学研究跨过接受阶段,走上自立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冯生





优秀社会科学期刊奖  
获奖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

ISSN 1000-7326



ISSN1000—7326  
CN44—1070

每月 20 日出版 定价：3 元